

著名世界譯漢

# 未來的世界

(中)

著 斯 爾 威  
譯 熙 懿 揚

商務印書館發行



H. G. Wells 著  
楊懿熙 譯  
萬良炯 校

漢譯世界名著  
未  
來  
的  
世  
界  
中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第二集 明日之後 衰敗時期

### 一 倫敦會議舊制度的失敗狄克推多與法西斯蒂的蔓延

在前幾章中，我們已詳論十九世紀的資本制度，直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之間，因工業生產的不平衡，貨幣制度的繁雜錯亂，以及政治措施的不得其當，遂爾日趨沒落。既無恢復的潛勢力，又乏充分發展的新制度，可以取而代之；於是乎一幕幕的慘劇便接踵而至。

當時唯一的而實際上並不聯絡團體合作的工具，便是個別的主權國家，不是君主立憲，便是國會的民主共和國。國會是根據於全體人民或大部分基於無道理的選舉制度而選舉的。那時代便叫做民主政治時期。民主政治的解釋，昔與今異，並不是人類根據了各個的才能而享有平等的機會去服務及在團體事業中有發言權；也不是一個小團體享有平等權利之謂。牠乃表示一種特

殊的政治意見：國內每一個人人民都同樣地能作和團體決議一樣的決議。

再古一些的共和國，如迦太基、雅典、羅馬等國都是貴族階級的。所謂民主政治共和國，就是說在這種的國家內，每人都在政府裏享平等的權利的，這種少見的事例，祇在十八世紀末期，烏力（Uri）、安度拉（Andorra）那些窮鄉僻壤的地方是曾經有過的。此外使舉世無所聞了。牠們的政治是比較地簡易，而爲一般的人民所能够明瞭的。

到了歐洲的盛大時代，人事便作了一個分水線，十五世紀的書籍與討論的高潮，使當時成了一個紛亂的時代，對於時代的宗教信仰與忠君的學說都作破壞的抨擊。新經濟勢力的發生，促使舊的封建制度趨於崩潰。向外發展與貿易，新的經濟狀況，工業發展，創造了新的人物，不自知其勢力的大小，祇需要着、要求着新的自由。他們不能明晰地知道所需要的是甚麼，也不知道他們和舊制度中的人物，有何區別，更沒有具體改革人類關係的觀念，像柏拉圖於兩千年前所描寫的一樣。柏拉圖所主張的養成專心的與有訓練的統治階級的計畫，雖有莫爾（More）想試試看重新提倡，他們還是不知道的。他們祇是應付着當時的環境事物。他們祇是憤慨世襲的貴族階級，不置信

於一個專制的君王。

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運動的要點，是反對「身世」和「權利」，反對世襲的少數的階級，依據了傳統的經義而獲得統治和利益的壟斷。因為這種的革命是許多精悍而又懷仇的人們的革命，而精神上與社會上都沒有固定的組織，所以在運動的初期中，便採取了人民政治平等的形式。

十六七世紀的急進派，並不是想建立羣衆的政府；而實是因為他們痛心疾首於當時的統治階級。他們是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革命的少數分子，來激動那些慣於服從的多數人類，使跟着他們走。這便是歐洲盛大時代中民主政治運動的普通特質了。羣衆表面上似乎是在那裏要求着和決斷着——但實際上是不竭地被人利用和領導着。在這些世紀中，出類拔萃的個別領袖，其風靡一時，比較君王與主教，尤有過之，無不及。世襲的專制君主中，祇有一二人如阿蘭治的威廉太子（William Prince of Orange）、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是歷史上很彰明的人物，可以和那些新式人物如克林威爾（Cromwell）、福祿特爾（Voltaire）、彌拉坡（Mirabeau）、華盛頓、葛拉德士吞（Gladstone）、羅伯士比（Robespierre）、拿破崙或馬克思齊

名於史冊。

其後在英吉利、亞美利加、斯干的那維亞、德意志、芬蘭諸國之中，同樣地有少數不滿當時現象及好權慾的婦女，也起而替大多數不聞政治的婦女爭取選舉權。但是她們所成就的，不過如此而已，除了女性的擁護以外，當時的婦女對於世界問題的解決，甚少貢獻，其實可說並沒有甚麼貢獻。

社會心理的研究，仍是只在解釋那個曾經在全美洲與大部分歐洲中暗中支配人心幾十年的民主政治的信念。甚至當時著名的思想家，也有很深的隱藏。他們內心裏對於真實的暴露很是不害怕；他們本能上就想將他們的異端委曲求全以符合那些業已成立的偏見。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初步觀念是一種很遼遠的、很簡單的小共和國，就是有着強健的公民，在錢財及能力方面是一律平等的，以市民大會來處置國家的大事，可以自由發表和取捨意見。所有舊的民主政治，包括羅馬共和國在內，就學理上說來，都是爲這樣的市民會議所統治的。至於那些公民，便幻想着他們是在那裏靜中觀察，自由發言，而且充滿着智慧。

把這個思想伸張到替代封建制度而興起的新的大的社會裏去，便有很大的困難，而且如果

仍把公民視作社會的主權者，還未免顯得荒誕無稽。但是當時又有廣播的強烈的恐怖，如果不是這樣去維持權利，加以限制，則專制必有回復之一日，於是乎，他們便很勇敢地接受了這個神祕的解釋。無論用甚麼的代價，以前的不平等是不容復活的了，這是當時在萌芽中的資本家的心理，於是人們便由一個桎梏中掙扎出來，而走入另一個陷阱中去。

人們感覺盧梭所倡導的人類的本來德性論，特別有用，特別有效。普通的人，如果不爲牧師與君王所左右，他是永遠對的。於是乎普通人便成了一個神祕的、通達人情的人物，和上帝一樣，他的祭壇是選舉壇，他的神諭是投票箱。在歐洲盛大時代的這位上帝，雖然進展得似乎遲鈍一點，但人們相信他是絕對的。一切的事物便可以這樣進行着。卽如林肯所說，你可以長時的欺騙一些人，又可在有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但是你不能夠長時的欺騙所有的人。至於想達到引起戰爭或利用經濟情況的目的，欺蒙的手段，便更要利害了。

於是這種環境便產生了一個最高度的愚民政策的報紙。

這些秉命於天的人民，在緊急的政治與經濟的啞謎之下，顯得智力遲鈍了，破壞死亡近在目



前，隨着二十世紀的開展而壓迫到人類的身上來。一九三二與一九三三年的軍縮會議與經濟會議的經驗，各國國家立法所引起的重大反抗，獨獨捨去褊狹的自利外交政策不提的現象，以及整個世界不能協力拯救經濟崩潰的情形，遂暴露了國會制度的民主政治的最後的破產。

世界上的統治者的不能去掉他們畢生所有的對一班無知偏激的選民演說的習慣，以及他們那種固執的對於明白表示的嫌惡，就把一切可達到實際的功効都破壞了。他們藉口是一個純粹的代表機關而不敢擅自採納任何有效的提議或新奇的舉動。在他們的背後，讀者們覺得那些可憐的秉命於天的羣衆，——投票者，很容易便被鼓動，恐慌地拒絕奇的、勇敢的或急進的計劃，很容易跌入愛國的牢籠，很容易便受驚恐與瘋狂地捲入戰爭的漩渦，而且很容易爲顛倒黑白的流言所鼓動，至不能置信於其所當信仰的人。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報紙，不論是僱傭的或黨派的，祇顧在那裏煽動他們的下意識的情感，而並不向他們的智力與良心作一絲的感動。

投票者——羣衆既沒有教育來指導他們，亦無真誠領導的組織，便是這些會議毫無實力的根本原因。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是兩者之中較爲重要之一。軍備與軍縮是不着實際的虛浮的象徵，

但經濟生活卻是根本問題。這個倫敦會議供給今日的社會心理學家無上的研究資料，就中使我們大惑不解的事情很多。當時出席會議的人物，其智力並不減於今人，根據康拜（Moreton Canby）對於會議中提出種種條陳的詳細分析所得，證明他們深悉當時世界的所需，然而因為受到背後的羣衆與報紙的掣肘，以及這些人不可捉摸的衝動與怨恨，他們便鑄成了一個大錯，比較凡爾賽的冒昧，更是過無不及。

倫敦會議所以成立，是爲補充以前會議的遺漏，輔佐威爾遜的政治組織，將他所未能預見或故意避免的貨幣與經濟的錯亂問題，加以整理。在開會之初，迷離中，現着在卑爾的貨幣國聯的陳迹，以及其他關稅會議的事實。於是循環性的歷史，又使這個第二次的世界會議，爲一位美國總統而且同是隸屬於民主黨的，佔會議中一個中堅的地位。而且照樣，依其民主黨的禮法來虔誦哲斐孫（Jefferson）的名號，一如共產黨誦念馬克思的名號，回教徒誦念穆罕默德的名號一樣。這便是羅斯福第二。他比較他的前人所留的印象淺些，因爲他參加歐洲的事情不久，但當他被選爲美國總統的前後數月中，以及主持倫敦會議的時候，舉世交相傳語，一位真的『人』已經起來了，他將

清楚地觀察事物，明白地向人類進言，把舉世由困苦與不適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失敗的唯一事情，便是他沒有明白地說話。

由威爾遜個人的失敗中所得的教訓，便是他並不是到倫敦來出風頭的，並使他的談話，爲人們作密切的研究的。他寧可由他的船安波甲第二（Amberjack II），遠在喃塔刻特（Nantucket）的海港中，從傳遞者的手中交換訊息。安波甲第二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並不亞於福特的和平之船。其動機與缺點都是有同樣的重要。

會議開幕漸近，人們到處傳問：『這是不是我們最後的救主呢？還是再候第二位降臨呢？』歐洲每一家書店都出售着他的新出版的書前瞻（Looking Forward），去細細地研究他的心理。這本書很使一班懇切的人們紛亂。很明白地，這個人是很堅決、忠誠與可親的，這一切都由篇首的照片所表示的清澈坦白的眼光和闊大而且有堅決神氣的面部顯露出來，但是這本書卻是一本政客的讀本，充滿了好意，點綴着一些模糊的當代思想，但是缺乏了智力的理解。『他是好的，』他們說：『但僅僅乎好便够了嗎？』

雖然如此，希望仍在奮鬥中。除了羅斯福之外，簡直沒有第二個人肯答應驅除這個困壓人類經濟生活的鬼魅的。如果羅斯福不主持會議，便沒有這個會議了。雖然他的書，不免使人感覺失望，但人們仍存了些希望的理由。特別是因為羅氏有一個『智囊團』（Brain Trust）的諮議組織，包含許多知名的有才幹有新思想的人物，如特威爾（Tugwell）、摩利（Moley）和迪更生（Dickinson）等。他們後來對於改革法律與政治的工作都極為重要，這也是美國對於新式國家思想的一個大貢獻。羅氏和這班人過從甚密，而且樂於採納他們研究所得與運思成熟的意見。於是觀察者便認為如果他肯聽這顧問的話，事情尚有可為。羅氏比較其他歐洲的政客與執政者總算稍勝一籌，因為他們是專聽銀行家與大企業家的話的。

但他是否在那裏聽呢？他是否抓住了這個三角形的問題的重要性質呢？他似乎明白，減除債務與資本過剩的負擔，要在通貨膨脹，他也知道有擴張公共事業的必要；對於這些他都是很清楚。假使這並不十分明顯，他對於『公衆』及『公衆協助』這兩點之間，發生猶豫，那是又當別論，不過這是另一問題。但是他對於應否使這種計劃世界化也是同樣地精明呢？對於這些，他的態度

屢有變更。這種變更是反覆無常呢，抑或是外作虛飾，而內蘊堅定的目的呢？當舉世需要坦白言詞，簡捷思想的時候，而用這種虛飾的策略是否得當呢？他治病之方似乎很紛亂。無疑地他聽信他的顧問，但是他不是也聽信於任何人嗎？他是在那裏和複本位幣制賣弄風情。似乎沒有一樣藥餌不去嘗試一下的。

會議開幕之初，故示鋪張，煥赫一時；旅館有人滿之患，街道高懸旗幟，招待的秩序非常隆重，而且天公做美，風和日麗。英王與首相麥唐納 (Ramsay MacDonald) 的開會詞，成了今人很奇怪的一種讀物。他們表示對於人類危機有着深刻的認識。他們反覆申言這次會議如果失敗，便可以引起世界的禍亂。他們諄諄然於世界合作的必須，貨幣簡單化，與回復僱工的重要，一切我們都認為是很真實的事情。但他們卻沒有致力於使這些重要的目的如何地達到。如果他們不明白當時的環境大勢，便不會作這種呼號。但不久，他們便把精神移到旁的事情去了。這種既堅決而又不力行的混合心理，實使我們大惑不解。如果他們看見了當時環境的大勢，一定沒有整個的看清楚，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見前面有任何的世界舉動開展着。

侯爾 (Cordell Hull) 是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也是一位很偉大和高尚的人物。他的嚴肅而瑋麗的演說詞——具備了美國傳統虔誠的特質，成了歷史上的名言。其中有幾句話說：『自私之念必須擯除。如果——天日也不容許的——有那一個國家爲了本國的利益而破壞這個會議的，那個國家便要爲人類所咒詛。』

達拉地爾 (Daladier) 法國的國務總理開始也作極端寬大而穩健的言詞。他補充英國代表的兩個演說詞中省略了的事情，力言全世界有發展公共事業來吸收失業工人和恢復消費的重要。美國代表，在第二星期，也參加了這個戰線。但經過這些煊赫輝煌的情況之後，會議便轉去細小的事情上面了。很明顯地，牠不能把『真實』 (Reality) 的水平線提得太高。每個代表都感覺在他們背後的羣衆與報紙的威脅。於是國家主義的代表，開始很明顯地表示不能爲了普遍的利益而把國家的利益犧牲，不久，便連甚麼是普遍的利益，也有些莫名其妙起來。世界經濟會議無形中便變爲世界經濟衝突，即猶之乎國際聯盟變作一個外交交易市場一樣！所有開幕時一切的高談闊論都匿跡消聲，因爲世界的心理尚須顧慮這三重條件下的道德與教育的力量，與尚未願意去

接受他們所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合作。自私觀念，便成了當時出席代表的一個不可救藥的心理上的隔膜。如果實行起來，便非犧牲一切的現存狀況不可。被舉做國家代表的人物，怎能把國家的利益和別國混合呢？不錯，他們都準備來改革世界現狀，化愁苦作希望。但是有一個不可移易的條件，那就是他們自己不改變，而且凡與他們自己有重要的關係的都不能變。無疑地會議的開端思想是很對的，但是牠怎能敵得過出席者的各別勢力、黨派與國家的自利主義呢！

很不可解的，便是蘇俄的代表對於解決這個世界的啞謎，並沒有做一點事情。後世論者多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是今日的新式國家的前驅。但這卻沒有連接的關係。新式國家之發源，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樣，同是為社會的必要，與建設的動機所造成的，不過是比較獨立、成熟與精密一點的革命思想。蘇維埃的制度，的確具備了許多今日制度的特點，即如牠的國際思想，牠的真的社會主義，尤其是牠的專誠統治的共產黨的組織，替我們今日新式國家會友（Modern State Fellowship）開了先河。但在俄國，言論與實行是相差得很遠的，而李維諾夫（Litvinoff）代表那在實驗中的俄國的，是太過注意於他本國與西方各國相互間的事情，如貿易上的封鎖港口、信用

上的困難等等，而不知藉此機會去向全世界爲人類請願。他絕對沒有將共產主義的原則來應付世界狀況。世界需要計劃孔亟，而他沒有爲世界貢獻一個五年計劃或十年計劃。環境需要全體合作甚殷，而他絕不敦促世界的社會主義的實現。很明顯地，他已忘記了爲全世界打算和其他資本主義代表實無以異。他是把俄國的利益和其他國家作相對看，和普通的資本主義的愛國者並無兩樣。

其他各國的代表，便更顯得眼光淺狹，毫無感動。因爲演說時間的有規定，他們都是把人道主義的事情簡略的說幾句便提到他們本國的事情。祇有愛爾蘭的代表康腦利 (Connolly) 反對出席代表的模糊態度，而請求他們去思維一個可能的學說，不要管牠是如何的不合正統。但是他自己的演說詞也不見得有甚麼建設的思想。他正在對於英國對愛爾蘭出口的封鎖，深懷繫念，便把全副精神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據康拜的觀察，新式世界國家的思想，在會議中英、美、法、俄的代表發言中，都具了隱藏而不結實的形式。在美國的立論中，牠是被個人主義者的言詞與謹慎處所隱蒙着，在英國的，牠是爲帝國



主義的觀念所遮閉着，在俄國的，牠是爲馬克思主義的虛偽的心理粗糙的謔語弄得索然無味。第一、商人不肯改革不甘退讓；第二、帝國主義的統治者予以拒絕；第三、空論的黨人加以阻撓。愛國的情感，黨與人的關係，便橫梗着公共原則的實施。雖然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新式世界國家的觀念已於一九三三年的會議之中，略示梗概。差不多人人都覺着這未來的靈魂的出現，雖然衰敗時期的最慘淡的日子仍須降臨，雖然人類還須度過一二百年的痛苦生活，纔可以把這個思想成爲一個真實的人類政治生活。

康拜又說：這個靈魂並未成爲有形，因爲還沒有成形的質料。世界上每一個大國家，都感覺有趨向一個永久的進步的『世界國家』的必要，但是這種片面的與局部的了解是尙不能達到目的。他對於羅斯福緊迫眉睫地努力於改革美國的事情，特別注意。羅氏深知必須以通貨膨脹來解除債務，但他不能禁止自由投機的事業。他所應付的是一班老奸巨猾的投機人物，他向他們請求甚至威脅他們加以坦白的援助。他既缺乏適當的行政組織去管理大的公共事業；所以想把美國的技術人員，轉瞬間，由類似的經濟操縱者變作忠謹的公共僱用人員，是絕不可能的。所以他便

以社會主義來向圖利者恫嚇，欲使他們放棄私利，而把工業組織在『利他』的基礎上，至於社會主義，他又無管理的階級去實施牠。他對於歐洲人的心理的不明瞭，難於求互相的了解，和他以前的威爾遜一樣。所以便成了相互的誤會，而他的態度卻是自負和挑釁的。會議未終，他已作詬罵了。到了一九三五年，人們把美俄兩國作一個相反的平行比較。每一國都是向着一個組織比較科學化的國家的階段競爭，而每一國又都在初步的政治管理生產效能上感覺困難。技術家與政客尙有待於合而爲一。每一國的獨裁都是與投機者及圖利者相搏戰。大家對於大同的合作都存了一些很微薄的希望，但不久便實際的集中於國內繁榮的建設上去了。但是他們是由兩個相反的生產效能與社會觀念的出發點向同一的目標進發的。羅斯福的出發點是民主政治的個人主義，史他林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英國的制度與其他世界各國則在經濟破產的混亂狀況中偏向保守。於是乎便沒有找出一個貫通世界好感的解決方案。

倫敦會議絕對比不上簽訂凡爾賽和約時那麼有聲有色驚天動地。牠沒有一毫成績。牠是虎頭而蛇尾的。凡爾賽還產生了一個怪物，倫敦便甚麼東西都產生不出。這樣冠冕堂皇的開端而至

於這樣完全的失敗的事情，是亙古所未有的！

當時的報章滿載着關於這個會議的評論（見歷史文件集一七三至一九二頁，哈布列德（Habwright）一九三十四年危機之感想（The Sense of Catastrophe in the Nineteen Thirties）節略），深覺當時的政治經濟已經失敗，就使隨意選揀，也可以把像這次會議的人才挑選出來，去應付人類當頭的災難。因為，無論怎樣，這班人是已經有過試露鋒芒的機會，而顯得不稱其職了。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專門政治家中的優秀分子，在會議內是一位很特出的人才，尙盼望有甚麼偶然的倖運由困難中把他和他的同道者從天定的歷史事實中解救出來。當開會之初，他的言談舉止都爲人所注意，照相師爭先恐後的爲他攝影，播音機亦都傳播他的聲音，隨從如雲，外貌整肅，美國人更從而加以扶助，深信在他的指導之下，是有些魔力在進展着。他自己也一定覺到，不然他不會停在那裏說着的確，這是魔力使得他這樣的。靠着他雄厚的聲音，動人的指劃，他竟由寒微爬到世界聞名的最高峯上來。如果他不相信魔力，便沒有甚麼可以相信的了。他自始至終就憑藉着牠。但是，如果他的心理的確是這樣，幾個月後，受到各方的抨擊，也要使他一籌莫展，大概在那時他要度

過些失眠之夜，便是他自己的魔力也恐離開而去。

一個星期之後，世界經濟會議便失去了光芒。倫敦城，在開始的時候是充滿了希望的，一切的情形都露着興奮緊張，這時又復頹喪下去。不待會議的閉幕，世界不景氣的氣氛又重重地圍罩起來了。這種曇花一現的光榮，有如兒童所玩的輕氣球，當停止吹氣的時候，便收縮起來，帶着一個淒涼的最後呼聲！

據哈布列德 (Habwright) 的評論，以為到了一九三三年七月，到處知識階級的男女都是說着兩件事情。對於那些集會的支配者與代表們，他們說：「這些人不能為我們做一點事。他們比較不做事還要壞，他們使禍患愈為緊張起來。」其次便作很多充滿了不解的詢問：「何以歷史家、社會學家與經濟家沒有一點甚麼可以告訴我們呢？」「在民主政治情形之下，自然，政客們會為他們的失敗謀解釋，但是我們的大學也沒有做一些事情嗎？難道這些是沒有科學的，沒有知識的嗎？難道歷史不知道事之因果，而對這個毀滅我們的社會歷程是沒有分析的嗎？」

對於這些問題，大學教授們方忙於改歷史、社會學與政治學的卷子，沒有工夫回答！

一九三四年之間，舉世的人已經知道一個整個世界的社會崩潰，是在不可制止地進展着，知識階級最合理的工作，便是棹着『諾亞之舟』(Noah's Ark) 去把世界上文明可以撈獲的都撈了起來，這樣，經過洪水為患之後，纔來創造一個新的開始。具了前知的人們，倡着此說，已歷有年所，到了此時，撈獲的觀念如傳染病似的廣播起來。牠為吾人今日的新式國家的運動打開了一條道路。在當時，普遍的悲觀，並不因任何復興的希望而減少。有一個作者，據哈布列德所引，把人和豢養的猴子作一比較：『當冷的時候，牠知道，並且能夠，把草褥提去火邊，但牠沒有智慧與眼光去逃避火的燃燒。』哈布列德把在大破壞中期的經濟進行狀況很簡單地寫出來，給予我們一個和猴子十足相像的印象。

在那個時期中，相信國會式民主政治已到末日的觀念，已流播遐邇。在凡爾賽之後，國際狀況風雨飄搖，以迄於一九四〇年間的戰禍相尋，人們已經討論計劃些比較確當的政體。此時，他們更加努力。整個世界都瘋狂般去改變政府和行政人員。

在初步中，這種渴求確當的政府的慾望，產生了異常生硬的結果。大戰之後『狄克推多制』

(dictatorship) 迅即像洪濤一般，淹蓋了歐洲，由波蘭以至於西班牙。這種的冒險，大多數是根據了小南美共和國的宣言的形式而成立的，這種片斷的事迹，不容贅述。但是繼着世界上便有一種指導的，或者可成爲指導的政治聯合發展起來，這個便爲我們今日的新式國家會友的組織，建立了一個基礎。

墨索里尼 (Mussolini) 在意大利創設的法西斯蒂的獨裁，比較其他代替國會制度而興的制度爲有耐久性。這個制度的發生，並非爲一種個人的專權，而是表示一種標有自己的宗旨與學說的組織。就知識方面來講，牠是狹隘的，國家主義的，而且浪漫的；牠的方法，在開始的時候，是非常地強烈和恐怖；但至低限度，牠能使牠的會員得到訓練，與服務公衆。牠似乎是一個反勞工共產主義的運動，但是牠一方雖擁護着殘餘的專制與教會，而另一方面又大膽地處理教育與私有財產使爲公衆的利益。法西斯蒂並不是完全壞的；牠是一個壞的好東西；墨索里尼便在歷史上留名了。

在俄國，一九一七年之後，便有些比較透切與廣泛的運用。這便是共產黨。牠是列寧的創造物；他繼續地修改運用牠的組織與學說，直到一九二四年他死時爲止。當他生存的時候，俄國的試驗，

似乎真的在領導世界，由麻木無靈的國會制度中逃向一個新的制度裏去。關於這個初期的布爾什維克新制度，有許多地方是很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雖然馬克思的傳統觀念於進行方面，設了不少的阻礙，但是這些新制度在環境的急需與列寧的指導之下，居然獲得成效。馬克思永沒有把他自己時代內的民主政治情感看得透切。甚至在新式民主政治思想萌芽之時，已經有把特殊權利的階級由真的平民的民主政治內排除出來的趨向，他和他的同志們，乃在他們所特有的那種視為神聖的民主政治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解釋中，更把這種傾向，施以推進。無產階級便是純粹的羣衆，是非常地神祕不可解索的。

但實際上說起來；俄國的真正革命，是受了富於實際經驗與富於中產階級氣味的列寧的指導，他很小心地使他胸中的社會大改革的計劃得到穩固，不因羣衆的抵抗而停頓，不因羣衆的驚惶而推翻。牠的蘇維埃的「民主」政府，蘇維埃金字塔，是建築在分組的計劃上，這樣使到政治與那由各個有勢力的團體中精選出來的代表直接發生接觸。加之，他還建設了完全的教育統制與報紙機關，長時督察着主權的羣衆。爲了管理這個整個的機器，他便創造了共產黨。

共產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一樣，其普通概念都是由新式國家的萌芽思想中得來的，這種觀念，是蛻化於柏拉圖共和國的護國者的制度。人們中堪稱為新式國家的鼻祖的，就是柏拉圖。共產黨的會員極和那些護國者相類。早在一九〇〇年間，批評民主政治組織的人，已經建議設立一個制度，專致力於社會與政治的事業，而自己加以委任，與訓練的。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九〇九至一〇年之間已經在討論這項計劃（參看該年中的歷史文件的費邊新聞），但是還需要戰後的困厄危險，纔能夠產生一班工人與青年人，飽經患難，因而有力的團結起來成功一個永久的革命統治。

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雖然沒有分成「各部」而且是政治性質，不是技術性質的，卻有很多地方與今日的新式國家會友相彷彿，即如牠的終身不絕的受訓練，在黨的範圍內自由批評，在相當的限制下准願意服務的人加入，以及在不願負責的時候，可以將權利與責任交還等等皆是。但是創造俄國共產黨的環境使牠馬克思化了，共產主義本是十九世紀中葉急進主義的最後產物，雖然受過列寧的洗禮，仍舊保存了不少感情的老調。列寧死後，在忠謹而無原動思想、多疑善忌



的史他林統治之下，馬克思主義的顏色，便愈加濃厚起來。

在俄國制度的背後，有很嚴重的民主政治與平等的口頭禪，即猶之意大利的忠君信教的口頭禪一樣。甚至美國的憲法也沒有像新俄政府這樣地注重民治的平等與堅決地實行新的學說。雖然俄國的統治階級並非出身於農工階級，但是他們卻普遍地平民化。不事修飾，衣冠不整，他們作着漠不關心於資產階級的安舒享樂的樣子。在「階級戰爭」的言詞之下，誰都要俯首屈服的了。當共產黨領袖們互相交誼的時候，他們往往喜歡用「中流階級」與「小中流階級」的名詞來互相詆毀。直至許多年之後，趨向新式國家制度的運動，纔能夠擺脫了傳統的口頭禪。

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便是俄國的新試驗深惡痛嫉舊的制度，這樣使牠不能收羅利用勝任的技術、創辦與教育的人才，爲牠效力。在使國家新式化中，牠卻拒絕了社會上最新式的那一種人的協助。而這種特殊階級的人，既然受過特別的教育與具有專門的學識的，也便難於把他們當作無產階級一樣地看待。所以在俄國和在美國一樣，那些善於詞令，習於虛偽的政客們對於新經濟與社會秩序的科學發展，如果不是障礙物，也免不了加以干涉的了。

五年計劃的困苦艱難使史他林深喻技術才能受制於政治的惡果，所以一九三一年六月間所作關於新舊技術人才（Old and New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的一篇演說詞中（見歷史文件史他林主義 X M 三二七，七〇五），很坦白地承認在新式的社會裏『非黨員』（Non-party）的科學與特別技能的人才，是不可缺乏的。不幸得很，俄國的黨的政客的勢力，為一種叫做『國家政治保安局』的橫行無阻的活動，而弄得更加膨脹起來。所以自一九二八年五年計劃的時期中，雖然有無限的力量鼓吹熱誠的工作，俄國實際上是很遲滯地、嚴重地受制於政客的獨裁，祇尙宣傳不尙實用，使國外的同情者心灰意冷，國內最優秀的分子大遭挫折。當她的計劃因為缺乏物質的經驗與眼光而遭失敗時，她便將工程師與技術人員肆行監禁與槍殺。

又蘇維埃制度中的不可磨滅的玷污，便是牠和西方的創造能力劃了很闊的鴻溝，立於反對的地位。大西洋各國都現着社會分崩離析的大勢，很明白地便有一種希望，聚天下各國有智力有精力的人們共同協力去挽救頹運——去保存文明的必要。革命是必須的，但卻不是根據陳舊的方式，有巷戰、有壁壘、有級階戰爭的革命。戰爭式的革命已不適用，因為這種制度是一種自殘的方

法。勇敢的建設革命的時期已到，但在每一處地方，當建設的工作進行時，階級戰爭的仇讐觀念，都在那裏阻礙牠、分離牠。——欲窺此等事例，可閱沁克雷 (Upton Sinclair) 的出路 (The Way Out) 一書，一九三三年出版，附有此書在叢書中的重版本，就是歷史文件集中名叫評判的歷史 (History of Opinion) 的一書。

創造精力的耗費是很大的，不單是在俄國，而且全世界莫不皆然。無數在文明社會中的青年男女，人類的希望所寄的，都爲了一種玄虛的學說，斲喪了他們的青春與精力去做無謂的搏戰。國家主義的毒，使他們的反響更加複雜。很多居然反對進化，而想回復到古代的舊道德的理想世界中去。所以他們便做了古·格勒·格蘭黨 (即三K黨 Ku Klux Klansmen) 國家主義派與尼 (斯) (國社黨)。本來，青年的熱血，是向偉大的、有效的、激烈的舉動奔流。他們的本旨都是好的，他們的精神是一樣的，但是他們因爲方言的不同而感受痛苦。因爲有自相矛盾的俄國制度在裏邊作梗，新式國家的思想很久還不能使他們明白了解。

俄國似乎是在領導着，她欲由舉動與行事上來領導，但她卻說謊了！在這個時期間，大半因爲

此種創造力上的紊亂，舊式的議會的民主政治的方法，以及舊式的國家主義的外交，尚控制着西方的大部分地方，所以毫無力量去防止社會的崩潰。

## 二 舊式教育傳統的沒落

華勃爾 (Faber) 在他的歷史分析 (111—113) 中評論 1914 年以前百年間的戰禍、疫癘、饑饉、荒年爲自然的事實，且謂以當時富藏之豐，人類本可避免這種災害。他歸罪於傳統的障礙太深，所以在那個時期中人類的犧牲是不可倖免。就他之意，是以爲如果沒有這幾代的困苦顛連，人類的心目中便永遠不能廓除忠君、妬忌、恐慌、迷信的種種觀念；人類的理智力也永遠不會被激盪而至於爲新式國家去努力、訓練與犧牲，以求其理想的實現。

華氏的評論特別是集中於一九三〇年的所謂教育腐敗時期。當時的人們都把學校和上學的人的減少，當作教育的退化，此與普通生活程度的低落及公共衛生的廢弛，正復相同。但他找出了一些極好的理由，來設想，以爲這並不是一件壞的事情，舊式教育方法的絕滅，是趨向社會復興必

經的途徑。

他堅持普通的學校有根本改革的必要，在此時期未到以先，必須將原有的一下子拿來廢除。他絕對否認十九世紀爲一個教育的世紀之說。他認我們實爲今昔的學校表面的相同處所誤引。兩者都是教育青年的，但我們尙未仔細地考察牠們的教育方法是完全地不相同的。我們今日的教育是人生不斷地革命進展的楔子。但是二十一世紀以前的教育是保守的。這樣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非把牠完全廢除不能建立新世界的初步基礎。

教育兩個字的範圍，在今日除了專門研究與美術的創作之外，幾乎包括人生所有的智力活動。但牠的初意，並不是如此的。在以前，牠所指的祇是人生初步的準備，至多終止於二十三、四歲，而往往在十四歲便停止。我們今日卻沒有劃定何時是學習終止之時。所有公衆的輿論，公衆的討論與團體的議決案都歸入我們的教育範圍之內。但在二十世紀初期，這些都是例外的了。

當時人們所知道的知識，都是偶然中得來。私人創辦的報紙，是投讀者的嗜好的；傳播思想的電影與播音機都完全使之商業化，爲美國的貨物作告白，爲英國的強有力的政客所操縱；甚至出

版科學的書籍，也都是不免投機與競爭營業的，在當時，舉世尚不知有所謂知識的中樞這個東西。很可以令我們注意的，便是人類如果一直沒有知識的組織，到底能夠維持到多少時候？在十七世紀之前，沒有一部百科全書的存在，所稱爲中國百科全書（Chinese Encyclopaedia）的，不過是一種文學的雜文，就是有了百科全書之後，也沒有一個永久性的紀載組織。至於有系統學術的永久制度的觀念，是一直到了二十世紀末葉纔發生的。我們今日的縱橫連絡的研究，討論互通消息的關機，我們的基本知識制度（Fundamental Knowledge System），到處的特別分所，地方的分局在巴司郎那（Barcelona）的中樞機關，一千七百萬的實地工作人員，五百萬的通訊員與後備研究者，對於衰敗時期的人們，真是廣大到令人不易置信的了。縱令他們在當時那種普遍的困乏當中，所維持着的整個不生產的軍隊與軍事的建設，實際上也有這樣大的數目，而我們這種研究的組織，恐怕他們看來，還是大得不可相信。

人類的腦力是不絕地在進展與增進效能的。今昔相較，在衰敗時期中的人類，整個來說是沒有腦筋的；牠是一個無脊骨的集合體，有着一一些感應不靈的神經節，牠是冥頑無知的，牠須要貫通

了簡單的知識纔能去發展一些有系統的知識。

當時的普通知識，不祇是簡陋、錯誤而已，華勃爾對於舊制度的批評指謫，尤有甚焉。知識，是教育及普通學校以外的事情。吾人所需要的一個精明的普通理想，便是新式國家的思想。據華氏意見，舊制度的學校並不志在灌輸知識。他引證於康斯博士 (Dr. G. S. Counts) 所作的關於調查美國教育狀況的名叫美國到文化之路 (The American Road to Culture 1930) 的一書，很明白的表現當時美國的普通學校是革除新思想的，而且是故意的革除。所以華氏說，如果是就人民生活的紀載方面來說，那末，在教育崩潰時期中所摧毀的，並沒有甚麼可貴的東西，因為根本上這種制度便無可貴之處。歷史的課程，祇知鼓吹狹義的愛國觀念，生物學是不具體而太幼稚，關於性的教育，祇知道借用花來作譬解，經濟的學程，更無設備。十九世紀的教育並不是維新，而實是反對維新的。做父母的及政治的與宗教的機關，都極關心的留意着，以爲教育應當是這樣的。他引學校的課程表和公共討論爲證，並以所用的教科書幾種作樣本。

據華勃爾又以爲所傳科學研究也隨了這個時代沒落之說，則未免過甚其詞。雖然因私人給

助與所謂『經濟』的消滅，不免減少了相當的實際工作人員，雖然受了遲鈍的國際交換知識的牽制的影響，但是有系統的科學研究，雖在最惡劣的社會崩潰情況之下，也沒有完全的停頓過。科學研究的精神似乎是隨處相安，不被摧殘的。牠由鉅富者之卵翼下移到軍閥的餘蔭中來，俄國、西班牙、南美都接連着爲牠的逋逃藪；曾經試過一個時期的蟄伏，然後及時再起，躋於世界的最高峯。在個人資本主義的時期中，科學的研究從未獲得優容，在繁榮時期的初年，研究工作足糊口的生活。當牠得有報酬的時候，便如沁克雷劉惠士（Sinclair Lewis）在他的馬丁亞羅斯密（Martin Arrowsmith）書中所說，牠立刻便商業化與沒落了。當困苦的時期降臨，依附於科學以糊口的寄生蟲，日漸淘汰，所餘的真心工作之人，安貧茹苦，在偏僻的地方，不斷地繼續工作。

真正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五〇年間受到阻礙，不得不中道而斷的，便是自十九世紀以來，已漸臻發達的那有系統的羣衆教育。實際上此種教育，除了讀、講、算（reading speech and counting）以外，也不過是傳統的訓練。當中也有些改革，尤其是在方法方面，兒童教育也有相當的進步，（可惜在經濟破產初期便被犧牲，）還有幾間特別優良的學校成立，不過這也是依了當時的制



度而創辦的。這種的學校，也像雨後春筍一般遍於各國，一直到大戰的前夕。識字的人數漸增。其後則漸漸地降落，有江河日下之勢（祇有俄國自一九一七年起纔開始羣衆教育。）但實際上退化的並不是知識，而是舊社會中的傳統訓練。

「宗教與科學的衝突」的學說，是十九世紀的產物，我們也不必來贅述在此時期中因為地質學與生物學的新發現，使基督教的信念與訓練發生動搖的事情。一八五〇年之前，歐、美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深信宇宙的創造是始於紀元前四〇〇四年。他們的知識，久受傳統觀念所包圍，不敢有超越的思想。讀史者已經知當時的基督教傳道者在把「墮落」與「贖罪」作為象徵解說時，所遇的困難了。因為這種的歷史事實，既無可稽考，自然含渾不清。不絕的紛爭遂變而為微言譏諷，其影響於人們心理的，便是使世界無一道德的定義。新與舊的都革除了。

在基督教的外表看來，不論天主教與新教，都有一種雖然粗淺而具有實力的道德力。教會雖然因為紛爭而失去牠們的威勢，但是牠們仍操縱了教育組織的大權。牠們防止新思想的灌輸，比較內部紛爭尤為努力。而社會習慣又復使人歸依教會，以子女信託教會。除教會之外，沒有教師，沒

有學校，所以教會雖然失去了牠的舊日不可懷疑的威勢，仍然可以妨礙新倫理的發展，使牠不能與人類的新發現互相調和。

教會的餘威，也在普遍繁榮的初期中漸漸地消失，牠失去了理智的與道德的指導地位。大戰之後，受到經濟破產的影響，便連物質的根基都完全摧毀了。在這個時期中，所有大規模的組織，均受不利，其後雖謀復業，亦不能再獲如前的重要地位，所以教會的投資便化爲烏有了。民間的收復地產，使教會與其他的地主同蒙損失。到了一九六五年，一個普通的青年想以牧師的職位來維持他的生活的，是絕對不可能的了。教會的教育，顯得太陳腐了，是可以阻礙抱有奢望的教師們的前進的。爲了時勢的需要，牧師與傳道者便不得不放棄道袍，混在羣衆的當中去另尋生活。這樣，有組織的基督教便從歷史上消失。

通常以爲此時期的社會風紀的敗壞，是由於基督教的倫理破壞，新的道德與知識尚未建立的緣故。華勃爾很勇敢地解答這個問題。他承認西方的文明是大多數出於教會的培植，但是他否認教會能够維持牠，而認牠的消散，是因爲社會信念的破壞，這種又是經濟的不穩固，與貨幣的漲

落的自然結果。當人們覺悟社會是欺騙他們的時候，他們便對社會失去信仰了。

### 三 社會沈澱物的分解與結晶——匪黨與急進的政治團體

這個時期中，人類團結的分合，常引起社會學家的注意。普通人對於仁慈上帝的信念已經搖動，對於社會正義以及他的教育與社會的職務都感覺不能置信。他已嘗着失業與不滿足的痛苦。有工作有家庭的這種安舒生活，已為大多數人所享受不到的了。

我們所謂社會的核心，已漸漸陵替；家庭與工作的團體日呈散失，社會頓見騷動起來。十九世紀的社會信念與訓練，已迅速的趨於腐化。社會的安全便一落千丈。

人類歷史中雖有不少的騷動混亂，出入移民的事情，但在昔摧毀社會組織、擾亂社會秩序、多數源於食料缺乏，天災流行與強鄰的侵佔。而這個新的分崩雜析的原因是不相同的。首先，牠的分崩是原於社會上物質與精力的過剩，而不是因為缺乏；是一個過分膨脹的作用受了不適宜的傳統法律與政府的統治而走入歧途所生的惡果。

這些分崩的勢力，在十八世紀中，已顯現出來；其後在法國革命與其他的社會與政治的暴動中更爲顯著，但是到了大戰之後，纔成爲控制一切的大勢力。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人口稀少，不大遷移，所以一個鄉村巡警便可以維持治安，一個熟識本地風土人情的縣長與陪審員便可以審判作奸犯科的人。但是十八世紀的經濟發展，使得城市繁榮，商業交通便利，而沒有使維持秩序的勢力與之並進，於是乎便產生流氓、剪徑與盜賊種種妨害安寧的人物。地方的警察既力弱不勝防範，當地的縣長亦感覺不能充分應付，所以作奸犯科的事便日增月積起來。

經過了一個野蠻懲罰的制度失敗，經過了法國革命的過分殘殺，經過了歐洲每個首都的暴動現象以及各種有越法紀的事情，各國的政府也努力地來應付這種新環境。新式的警察見於各國，維持秩序安寧，在大戰之前，已登峯造極了。在一個時期內，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安寧景象，可以與我們今日的狀況媲美。通常一個不帶武裝的人，可以很安寧地在歐洲、印度、中國與美洲來往，不愁遇到有何危險及被搶劫的事情。甚至在西歐的警察也無須攜帶利器而祇持警棍已足以維持

秩序。

大戰爆發，使十九世紀苦心經營所以防閑暴亂與流血之藩籬，盡為撤去，而無數知識階級失業者，散處於交通大衢，茶樓酒館之間，感覺非法行為的機會開展在前，而其謀利之多，又往往為安分守己的制度所不能給予的，均趨之若鶩。世界不景氣使各國經濟凋殘，實無餘暇去擴展及改良現存的教育、法律及警備的組織。法庭與警署既不能應付當時紛亂複雜的案件，於是牠的勢力範圍一天一天削減，牠的威望也一天一天墮落。這便入了一個法紀破壞的狀況。犯罪者早使得由教區與反動的經濟下解放出來，而且深深地感覺着這是一個海闊天空的自由。作奸犯科之事日益增加，而法律受了傳統的束縛，竟瞠乎其後，不能為力！

在這個渾亂時期的犯罪紀載成了今日怪異的讀物。當時很可怕的事情照現在看起來，似乎很湮遠而不可置信。我們讀了，有如重讀中世紀的嚴刑，人肉享讌，人類犧牲一類故事，而笑說這是不可能的。很少人真的明白一個半世紀之前人類的確經過這麼的切膚之痛啊！

在普遍繁榮初期中，歐洲各國的犯罪者實佔人口中很少的數目，而且大多數是智能甚低，毫

無知識的人所犯的案件又多是出於一時的感情衝動與暴戾行爲。普通的盜竊與商業的棍騙雖時有所聞，然未足以擾亂整個社會秩序的安寧。自舊制度的道義精神散渙之後，事情便大不相同了。無數有知識有作爲的人物起而與社會衝突，其所持的理由便是社會欺騙了他們。愛國觀念也是欺人之語，牠給予他們的也祇有貧乏與戰爭。他們從來沒有得過一個公平的機會。於是他們便爲自己打算，而讓社會去爲牠自己打算。他們回復到很狹義的休戚相關的範圍裏來。你的同伴是和你很密切的，如果他對你不住，你可以抓住了他。這樣犯罪的小團體便組織起來，收容社會上被排擠與被侮辱之人，和失業的知識分子。

在一九〇〇年間歐洲的社會尙以家庭的組織作中心，很安分守己的。到了一九五〇年，人們如果不加入犯罪團體，或祕密會黨中，便溶解在游民羣中。所有好行爲的標準勢力都蕩然無存了。反社會的罪狀以搶劫首屈一指。以前祇有政府可以沒收他人財產的，強有力的政府，固不容任何人民享有此等權利，而理性的政府，且對於行使此種權利，格外出之審慎。在過去無紀律的私人財產的時期，偷取可以攜帶之物和強佔無主的產物是常見的事情。在英國，她的治安在普遍繁

榮初期已達了最高峯，偷竊（包含各種棍騙作弊）竟佔了犯罪的主要地位，其他是例外的事情。但是，這普遍的繁榮一旦減色，許多比較原來竊賊行爲更爲活動的強盜方法就發現了。施行搶劫的人乃開始來利用他的機會。夜間行竊的事業日漸增加。於是以攔路恐嚇或襲擊的手段來搶劫的事情亦發生了。向來戴珠寶攜金錢出遊的人，此時咸有戒心。在倫敦與巴黎近郊之處，亦常有伏莽爲患，而美國方面，則除大城市的中心區之外，便無時無地，得以絕對安全的了。大戰之後，此種現象更是流遍遐邇。

但漸漸地這種攔路搶劫的事情，也有了限制，已不若以前的盛行，因爲，這種搶劫之風所得蔓延，必定要普遍的意向上對牠不加防備，而且施行搶劫者，最要緊的是在有人可以供他搶劫，否則他亦無所施其技。搶劫之事並非社會上不可療治的鋼疾。剪徑之徒既明目張膽，於是人們亦不敢攜帶貴重物件出入，不經寂靜黑暗的街道，行必結伴，且攜帶武器自衛。攔路搶劫的案件便續漸減少了。

不久，作奸犯科之徒更知道團結勢力，向新的路徑發展。人們既比較上知道自衛的方法，於是

簡陋的犯罪行爲，爲應付環境也成爲有組織的犯罪行爲了。在各國，可怖的犯罪的團體，從而擴大蔓延，施行訓練來與法律相抵觸。在歐洲方面因爲關稅戰爭，使運私走稅之冒險事業從而增加，而在運私走稅的事業裏，便產生了下層社會的祕密的忠誠團結與祕密的幫規，而且應用靈敏，功效甚廣。在美洲方面因爲禁酒法令的施行，也產生了祕密團體的組織，橫行無忌，時時與政治腐敗的組織及恐怖主義的組織有密切關係。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間的經濟恐慌時期，美國的社會秩序比較歐洲尤顯不靖。但結黨作惡的事情，則到處一樣。向安分守己的人民施以攻擊的事情，更是到處皆然。

用強力搶劫的事情日新月異。十七十八世紀的攔路剪徑，此時就爲攻劫汽車、火車的劫案取而代之。設備優美的火車時常遇着武裝盜匪的搶劫，此種事實，起初發見於歐洲東部及美洲，後來乃遍及各處。此種案件，大抵是以十餘人來持槍行劫，並能安然逸去，且有傾消贓物的市場。往往當鄉間富人別墅，嘉賓雲集，享譙作樂之時，卽有不速之客降臨，囊括以去。又或在茶樓、飯館、賭博之窟，食客賭徒之豐囊亦時有被搶劫的危險。地方銀行，亦漸呈不穩固。一千九百三十年以前市銀行的



辦事處是寬敞講究的，有旋轉的門，櫃臺低而有玻璃的隔斷；十年以後，景象大變，辦事人員護以鋼甲，各持槍自衛，和顧客交易，都由那很小的、像鴿子籠門洞似的洞口出入，以便緊急時易於關閉。

搶劫的手段愈強烈，社會的防備也愈嚴。誨盜的華貴珍飾不敢公開炫耀。婦女之衣飾，雖然增進美術的質地，而價錢並不珍貴，到處奢華，鋪張的風氣爲之大減。民間住宅，沿街之窗，作狹長式，裝置鋼質之門，重重封鎖，迥非昔日的開敞安舒景象可比。商店的門面陳設，也小心翼翼地加以防範了。

爲自衛與不惹人注目起見，連汽車的式樣都改變了。在二十世紀中葉，普通的汽車的外表，有如一隻獍惡好鬪的野獸。車中的人和牠很相配。大戰之前，如在路上遇見道旁有斷輪的車輛，或其他事故時，過路的車輛，必停留下來，予以幫助。但在目前的狀況之下，人們都恐防有詐，黃昏的時候，他們便不肯停車，甚至在青天白日之下，雖然看見路旁有負傷的人或外表受傷的人睡在那裏，也是疾趨而去不敢稍事停頓。

因爲旅途艱阻，游客相將有戒心，旅行的游人數目，照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間的統計看來，

在歐陸方面的，減了百分之八十。雖然除了行旅的不安寧以外，尚有其他原故足以影響游人的數目，但是不安寧，可以算是最大的原因了。

道路，因行人既少，也漸漸地日久失修，路燈與路牌等景物，遂漸漸的消失。

搶劫的進步，是犯罪行為進展之一。更可怕的一種便是專以恐嚇敲詐爲業的組織。起初是向個人進攻，繼則及於社會上整個階級。因爲人們不走在路上來給強盜搶劫，強盜便要追蹤到人們的家裏來了。這裏又是美國的新發明，領導了全世界。漸漸地普通富庶的人民感覺他們的生命，時在恐怖和焦急之中。甚至在繁榮的時候，美國富人的生命，也不能泰然無憂，他們的安全是不可靠的，他們的位置是不能十分鞏固的。財產與入息，日見其不穩固，但倒貼恫嚇者的金錢卻大大地增加。在防禦不週，實力不充的警察目光之下，恐嚇者與綁票者竟明目張膽地橫行無忌。

最殘忍的行爲便是恐嚇與綁走幼小的兒童。偷竊寵愛的家畜以勒贖的事情，是更渺小不足道的了。在林伯——美國長途飛行的著名飛行家——的愛子被拐殺之前，無數的兒童曾經被拐騙而去，勒贖重價。林伯愛子的慘遇，引起了全世界對於此種禍害的注意，但是並沒有甚麼有實力

的方法去防止這種禍害的蔓延。一九三〇年之後，綁票與恫嚇的案件層出不窮，而且傳播及於歐洲各國。男女都是被綁幽囚，以各種殘忍的磨折，榨取鉅款。如果偵逐之過急，則永遠失蹤，不知去向。暗殺的事，也是司空見慣，而且公然有人民保護會（Citizens' Protection Society）或治安聯合會（Civil Order Association）等名目成立。如果一個人想保護他自己和他的家屬的平安，就不得不向這些匪幫納貢，不然，他便得不到安靜的日子。甚至他的特別的保護者不來騷擾他，還有其他的匪幫對他是不負責任的，這樣，他便不得不再與他們個別訂約了。

不獨富裕的人們感覺這種的壓迫，很多小商人和工作人員，也感覺有將他們所入的一部分去繳納以避免危害的必要。「煩擾」是美國特別的名詞。「你不要煩擾吧？」恫嚇者很溫柔地但很堅決地時時這樣向他們所攻擊的人說。

一個新的時代便在祕密妥協，暗中屈服的狀況下生長起來。一個普通人在充滿了煩擾的世界裏，小心翼翼地過着日子。沒有一個人敢不隸屬於一個甚麼會而可以安然生活的。這簡直回復到好些古代的習慣裏去，有如在中國、西西利、意大利南方往昔通行的情形一樣。但是到了十九世

紀末葉，人們已經失去自由與信念。人類的幸福都遭受了很大的打擊。

綁票並不祇限於擄人勒贖。他另外還有一種祕密的營業，就是專拐誘青年人去做賣淫的事。這種案件，大有增加。工人也有被拐的，與及在工廠中工人的威脅也更加勇敢與不合法起來。私人的鬭爭甚為兇猛，尋仇報復的事，尤其指不勝數。在信念與幸福搖動之時，有魄力的人們不再懼怕壓迫狀況下的慘酷結果，他們自有報復的方法，他們自相殘殺，法律的網不復能及他們了。

富人，金融界的鉅子，超羣的政治領袖，下流社會的「魁首」等，莫不廣樹爪牙以自衛。這些衛隊，使人回想到中世紀後半期意大利城市僱用的鏢客與日本貴族僱用的武士。經濟衰敗甫見的時候，凡可以僱用扈從的人家，都僱用護衛。他們保護僱主的身家性命。他們替代了警察的職守。

由保護的侍衛變而為侵犯的侍衛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美國走私漏稅的首領人物便是犯罪的首要，但是此風是有傳染性的。扈從們的角鬪是初次重現於美國、德國與愛爾蘭。這種的角鬪普通是小巷戰，或是在種族不同的會集中起衝突，或是向政治會議與巡行施以旁敲側擊。一九三八年之後，如果不是一个勇敢的政客，除非他知道他的扈從散佈在左右，守衛着各個要塞的地方，是

不敢向着聽衆說話，他的身畔尚須於要害處妥爲佩戴保護的東西。今日的博物院中尚保存着不少這種衣服。

一九四〇年後，沒有一個稍有地位的男人、女人或孩子在出行的時候沒有人隨從的。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婦女漸漸取得個人的自由。一九一二年之時，一個十幾歲的美麗少女可以攜了行篋，單身遊行於歐洲、美洲的北部，而絕對安全，不受凌辱的。但到了不安寧的時代，所有一切的自由都喪失了。甚至在城市中往來，女人也得有一個護從的人而後可。直到二〇一四年，纔回復了一點往昔的普通自由。據當時的小說所披露的，婦女時時有一種恐懼單獨出行的習慣，直至二十一世紀中葉還遺留着。

一九四五年之後，據紀載所傳，尚有一種新的不安靖的景象。路旁的黑店，罪惡之藪的街衢，區域或鄉村時時有殺人越貨的事情發生，而爲遊客們所裹足不敢前的。有些這一類的地方，數十年之後，尚不能洗滌污名。那些危險的黑店，有着祕密升降機、地道、機關與及可怕的私人房間的，到了現在還是我們的有名小說家描寫得很得意的地方，並不因爲事過境遷而失去了興味。

二十世紀的警察們的心理已經成爲研究歷史的一個問題。當時的警察與教育及醫學機關是毫無關係的。吾人今日認爲不可避免的聯合，恐怕在十八十九世紀中始創警察的人看來，要以爲瘋狂哩！據他們的意思，警察是一種路旁活動的標桿，遇見不合法規的小事，可以立刻出而干涉。除此之外，是不管帳的。他看守人家交給他的犯人。在他之上，有警官，往往屬於另外不同的階級，此外就是些研究刑事的專家們，這些專家，在敏捷的交通與大量生產未曾急激引進之前，是足以負責處理當地作奸犯科的案件而游刃有餘的。這種的警察制度，直至二十世紀初期，也尙足以維持治安。除了在娼寮林立的區域，警察都尙能很忠誠地施行職權。牠曾經於百年內維持了相當高度的人民的自由，財產的安全與及社會的秩序了。等到人們把道德與政治的管理責任放到牠的肩上的時，牠纔表現得不勝其繁重。

當新式國家這個較大的社會組織很難痛苦地由傳統觀念習慣中掙扎着出路的時候。警察的力量也顯得不能稱職。牠落後了，學生們一定會發爲疑問：『何以這種警察組織不能與新的禍亂並進呢？』『何以當時統治的人物不知所以因時制宜以應付新的環境需要呢？』我們已經

把大意說過了。正當世界急切需要根本上將警察制度重行整頓的時候，便有兩件事情作梗，第一、是鼓動國際敵愾的「祕探」制度，使國際難於共同處理這個問題，第二、是債權者把生命作無謂的犧牲，似乎是任何根據獲取利益的社會制度所不能避免的結果。

謀利的資本主義制度絕對不能處置其所造成的失業與其所激起的反抗。牠停滯不前。牠與通貨膨脹相搏戰，牠也與租稅相衝突。牠使經濟破產，牠使公衆承認的學校封閉。牠並且多少還限制僱工與失業救濟。甚至對於牠的警察保護問題，也是擲節經費。牠說：我們不能計劃一個新警察制度，我們甚至連警察的維持費都無所出處啊！

所以把一個十九世紀制度的警察組織，經費缺乏，設備不合，規模狹小，富於狹義的地方色彩，而且往往非常地腐化的，來應付一個因社會發展，過分膨脹所生的無組織的大勢力，徒使那充滿了千瘡百孔的時代增加一些衝突與混亂而已！

雖然內部充分的腐敗，但警察的普通宗旨，仍舊是很健全的。不過並不是全部如此。有很多組織，雖然日就渙散，但是牠們仍舊掙扎着去維持秩序。牠們堅守着與罪惡作戰的傳統精神，但是牠

們的方法卻漸漸地陵替，和當時的刑法一樣，遇着同一的命運。警察與執法人同樣地感覺着牠們的負擔過重，牠們是站在很不利的立場作戰。牠們與罪惡的戰爭浸假而成爲一種報復的械鬪，漸漸地不像是一種居高臨下的統治，而竟像兩黨的競爭。因此這種制度就爲一種證人易受威脅，同黨互相袒護的空氣所包圍。這樣使他們對於搜集與審查見證之事殊不謹慎。往往他們還會假造證據以使他們所認爲罪犯的人成爲犯罪。據作家威根孫 (Wilkinson) 所說，在二十世紀初年，無數的犯法者都爲假證實罪，而除此之外，便沒有旁的方法可以實罪的了。

中古時代的嚴刑峻法，與各種慘無人道的特別刑具，讀史者未有不爲之驚心動魄。二十世紀的警察，因爲環境的不利，四面八方，爲敵所困，便漸漸地恢復封建時代的私刑拷打去處置他們心目中以爲社會的危險分子。由這種的磨折虐待，去迫使被捕的人作供詞的事，更是風行一時。

這些不同的組織，性質上實在沒有真正的區別的。究竟那一種是結黨營私專與法律相牴觸的團體，那一種是藉非法手段來勉強維持安寧秩序的保護機關，是很難區別的；至於一個國家以內大規模的組織，如奧國各州中主張國家主義，後來造成捷克斯拉夫的蘇哥爾黨 (Sokolis)，愛爾



蘭的共和組織，美國的三K黨，印度、日本、中國內的各種秘密黨會，佔據俄羅斯的共產黨，在意大利稱雄的法西斯蒂黨，控制德意志的國社黨等，所有這些都是有着較勇敢的步驟，較廣泛的範圍，以改革經濟與政治爲目的。牠們的組織，不過把秘密會社的制度推而廣之，所不同的地方，祇是不從事於當時的恫嚇勒贖而去追求大一點的滿足而已。甚至當整個的組織是有廣闊的運用之時，而地方的分組也不免淪爲粗暴的統治。所有這些大小非法集團的源起，是因爲正式的統治、經濟的管理與教育的制度既不適當，又缺乏能力，且不能合作之故。因爲社會的組織不能充量地發展，於是便有不自然的生長，表示着不滿意的輿情，與需要一種較爲密切、活動與有效力的人類的聯合。

十九世紀的末葉與二十世紀初年的文明人類社會組織的崩潰，是急迫地需要把人類重行作一個比較富於動力的團結。新的聯合使把舊的制度弄得冰消瓦解。但是在那個完全的、滿意的與富於動力的『世界國家』組織未成熟之前，這種社會精力的散而復結的經過，是無可避免的。有如繭中的蠶蟲的官能必先經過改變，然後可以構成飛蛾。

甚至新式國家會友的組織，其出發點也是這個性質，各種的技術人員深覺着在社會不安寧的狀況下，他們的職業將消失，他們生命裏所珍貴的一切也將毀滅。他們乃以一種例外的世界合作的力量，組織了種種保護的與進取的集團。牠們的勢力便成爲新世界的準備。

至於世界上的海上生活，幸而有海軍勢力的保存，還不至於像陸地這樣的混亂。自從世界大戰末年海軍頻起變叛之後，海寇又復出沒無常，雖然如此，海上防範，對於盜船，尚可施行警備，且較城市中的冷僻街道、僻巷易於防備。在一九三〇年間，商船雖曾爲海盜所搶劫，但海盜終於就獲不能免脫以去。一九三三年中國的海軍曾散爲各組派別，各分電當時南北政府請其收用。但這些流浪的戰艦在牠們爲日本人所購買或搶奪沈毀以前，所幹的惡作劇是很少的。

有一隻加拿大的游覽船叫做大西洋之王 (The King of the Atlantic) 的，曾於一九三九年在大海中爲一羣武装海寇所襲，且欲架去船上搭客以勒贖。但終究因美國海空兩軍的攻擊，精疲力盡而俯首投降。

一向都沒有超過九〇〇噸以上的船隻爲海寇所奪獲的情事。這種海上的治安得有相當

維持，全靠當時所發明的無線電交通。其後到了四十年間製船之業停頓與世界航業緊縮之時，這個秩序還能維持着。

在第三次的歐戰之前，空中是沒有甚麼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的，即使後來不免，也不是不可制止的。這又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力，很簡單而且易於管理的事實。的確有一個時期，飛機是最安全和最敏捷的交通方法。其後當陸上的交通停頓的時代，飛行家仍然在碧空中飛翔低徊，經過危險的城池，荒蕪的大道，經過斷瓦頽垣的屋宇，人煙絕迹的農莊，過去紀律的回憶與一個有秩序的未來的希望，都縈繞於心中。

飛機的數量漸少，與船隻的減少正復相同，又因為冒險營業的得不到鼓勵，所以飛機的形式也沒有多大的改變。然而天空卻和大海一樣，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尚沒有被捲入普遍社會崩潰的漩渦裏去。因為需要飛機場為修理與加油之用，使散播各地的飛行團體互相聯絡起來。在最壞的局面空中暴亂的事情仍是有的。而一個新制度的戰爭，就在空中及航空的路線上發見起來。

#### 四 世界大戰後戰術的改革

在這個衰敗的時期中，戰爭的科學與實際沒有充分的指導與管理的能力來控制牠，讓牠在一個可怖的邏輯中自由生長。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爆發，軍事科學已經是很落伍的了。各國的軍事機關，固然任軍事工業者將大量軍械交付他們而不加節制，卻不知道怎樣去應付這個變遷的時勢需要。所有當時的陸軍統領，仍舊墨守十九世紀戰爭的傳統方法，很蠢笨地在那裏應戰。他們腦中還充滿着前線進攻，側翼襲擊，沖破重圍那一類的戰術哩！這次戰爭收獲的恐怖，姑不詳述。海軍大將或者事先得了工程師們的警告，所以顯得處置靈活一點，把他們值錢的艦隊藏在嚴防的海口內，不使牠們冒戰爭的危險，而只使牠們應付一兩次緊急的情態。所以他們的勝負，戰後的幾年來，一直爲爭辯的問題，直到現在尙不能有定論。潛水艇、地雷、飛機、坦克車、擾亂軍心的宣傳隊、毒瓦斯的試用、引用新的軍長種種，也曾經使陸地戰爭改良一點，但是到了最後，因普通的鬪志消沈，而至於停戰之時，軍人

們尙堅不承認他們的舊方法有了甚麼根本的改變。

凡爾賽和會以後，一切都改變了。軍政部與外交部都入了一個騷動的狀態，牠們感覺有不因遲延累積而失去效力的變遷在向牠們進攻。年輕一點的大將經過了此次的戰爭，腦海內不能泯除那些空中襲擊，毒瓦斯與坦克車的運用，尤其是不能忘懷於那些有實際能力無軍事習慣的同道軍官的粗野的批評。這些年輕的軍官也漸漸地上了年紀了，而他們的權力也跟了他們的年紀而增進了。他們日躋要津，而且繼續地說：『我們必須與時間並進。』

時間又轉入一個絕度革新的時代。到處的軍政部都爲新的發明，祕密的奇事，與不公開的有系統的研究所鼓動着。到處偵探與間諜們的曖昧的報告，受了軍械商人的培植，便鼓吹殺人利器的發明。

人們已經感覺到舊的戰爭已經在戰壕中消失。舊的『以戰爭終止戰爭』的戰事已經過去了，一種新的戰爭必須很快地替代牠。各國的外交部也需要牠。各國的外交部是非依賴戰爭不行的。主權便是戰爭。一個傳統的國家便是懷着敵愾反對外人的組織。牠們並不想像其他的事態，因

爲自始便幻想牠們是不存在的。一九三四年之間有無限的祕密可怖的研究以求發展新戰爭的方法。因爲欲消弭戰禍，唯一方法便是放棄個別的國家主權，而對於這個思想，人們的心目中卻並未成熟啊！

一九〇〇與一九五〇年間戰術的變史，除了十二與十六世紀引用火器的時代，實爲人類歷史中第一次聚族而戰以來最大的事跡。經過無數的時代，人類最大的衝突，是爲作戰，是爲步兵與騎兵的相接觸。步兵已成爲軍隊中傳統的脊骨，其次便是騎兵。礮兵是祇用於準備進攻的時候。古來的英雄如拉美斯（Rameses）、亞歷山大（Alexander）、愷撒（Caesar）與拿破崙都這樣地布置軍隊。在那個浪漫的時代，所有的人類戰爭的光榮勝利，都是模仿了這種方式而行，始而集中長矛、短劍、長鎗、鐵錘與其他的武器，繼而推擁刺擊，互相射擊，歷時最多幾點鐘，使爾潰圍敗北，馬隊追逐，繼以屠殺。這種公開的戰爭不久便易爲長期圍困，被圍者不肯公然應戰，祇在城墜之後暗放冷槍，彼此互相攻擊相持不下，至到久困之下，軍紀蕩然，飢饉癘疫，民窮財盡，然後城陷圍解。在戰爭期中居民備受塗炭，姦淫擄掠在所不免，其餘如焚毀積糧，強迫作工，搜捕間諜種種犯罪之事，真是紙不

勝書。整個地方的摧毀有如蒙古人的斷絕米索不達尼亞的灌溉，英國的威廉第一（William the Conqueror）使那深不拉（Northumbria）長爲不毛之地，當發生之時，是一種政策而並非戰爭的計劃。還須經過好幾十年，纔能够產生拜占庭（Byzantium）與波斯在小亞細亞間作戰的混亂情形。回教徒的侵略，因爲宗教的宣傳，起初即令人異常不滿，但不久，便爲分別的稅項所替代而引起人們的反感。羅馬、匈奴、蒙古人的遠征，使一處的傳染癘疫隨着大軍蔓延他處；但是舊式戰爭對於人類運命的影響，是爲舊制度中國家主義的歷史家所張大其詞的。牠卻不比移民爲重要。農民的生活，繼續前進。毫無更改，一樣地居處穢濁，血汗勤勞，這是自農業時代以來，大部分人類的生活了。世界上各種決勝負的戰爭，不過爲腐儒的幻想，所謂偉大的『帝國事業』不過蒙蔽人類心靈，使其不能由農業的生活漸進而至於一個清靜與有秩序的生活而已。

自拿破崙戰爭以後，軍人對於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爲亘古所未有，如徵兵、抽稅、賠款是有礙於經濟的進展的；但相反的，而且爲軍人初料所不及的，便是工業主義權力的增長，羣衆操縱力量的猛進，均隨了新聞紙與其他宣傳的鼓吹而侵入於軍事與普通生活的範圍以內。戰爭先

不過像在我們祖先的時候的淺耕，後來遂成爲墾土走犂。愈掘愈深，侵及地心水泉，而等着地陷的來臨。

大戰中的將領，對於管理鉅量的利器，實爲門外漢。向來只是在前方作戰的戰爭，陡然的變成不止是敵對的兩軍在前方作戰，而不讓一個人站在戰爭圈子以外。新的戰爭在一九一八年已開始表明，是一個全人口的戰爭，而沒有不參加戰爭的人。此時舉世的軍事家，及有些尙滿身佩戴戰爭的珍飾，以紀念其舊日的光榮的人，又復勇敢地聚精會神去研究新戰術了。

勇敢，是軍事傳統的要件，而這班人的勇敢是更無以復加的，觀其在這個時期中去努力工作，以求與發明並進，如統制機器與工程師，鼓勵化學與化學家，羅致戰爭的通訊員與報館的主筆，研究生物學與醫學，甚至操縱金融來保存互相作戰的主權國的觀念等。據我們所知他們是得着學校的擁護的，軍械工業的協助的，舊宗教與舊式忠君愛國的分子的贊成的。他們的動機，是非常地愚蠢的，但是他們工作的可怖，人類三代的痛苦流離，都是受牠們的荒唐的性格之所賜。這些都是很近的事情。



關於這個時期的軍事學的書籍是汗牛充棟，其中調查得最清楚的厥爲孚拉·麥切（Fuller, Metsch）所著的二十世紀中葉新戰爭的思想（The Ideas of the New Warfare in the Middle Twentieth Century 11001）作者提出三個問題：『他們爲甚麼而戰爭？』『他們如何地去戰爭？』與及『他們將認如何的狀況纔可以終止戰爭？』

他的答案是很複雜的。沒有一個人可以抓住了新戰爭的全意。那些很迂腐與虛偽的『專家』，祇注意他自己研究部門以內的事情，而讓命運之神去把零碎的事跡湊成一個整個的事實。一、二、三、四、五年的軍人的思想，似乎是這樣的：他認爲整個世界是爲各別不同的政府所分據着。這便是一、六、四、二年的威斯特斐利條約內所舉的主權國了。所有的列強都是互相競爭與彼此仇視的。當仇視達到極點的時候，便是戰爭。當恢復元氣準備應戰的時候，便是和平。戰爭不過是停止敵國的休戰，發源於不可解決的糾紛，與利益的衝突，而每一強國的目的便是去屈服牠的敵人。在二十世紀以前，強硬的主張大多數由政府與軍隊施行。不是這個，便是那個國家主攻，大兵過境，直向敵人的首都前進。經過交戰之後，或者是首都被陷，或者是進攻者的被擊退，於是立約講和，以戰勝國的意

志爲主體，邊界的劃分，殖民地的改隸，賠款的處置都以此爲依歸；戰勝的國家，勢力益張，戰敗的國家，聲勢萎縮，而其國內的人民便感覺奇恥大辱。到了十九世紀末葉都逃不脫這個方式。

到了世界大戰的時候，不獨前敵後方漸漸不易區分，與不參戰者的糾紛漸漸激增，而且列強也失去了牠們固定的地位，於是乎便發生了一個問題，甚麼纔是一個負責的政府，可以行使意志的呢？即如在俄國，新的共產政府是否負起舊政府的義務呢？在德國，是否整個德國民族須負起德皇威廉武主義的責任呢？君士但丁堡的蘇丹，安哥拉的基馬爾是否正當的權威，可使土耳其瓦解呢？又如美國自動地參加戰爭，但不肯參加威爾遜總統的處置辦法。似乎他不是一位全權委員一樣。這是不是一個國家所應有的行爲呢？

更有其他種種糾紛發生於戰爭法中，如果把前線廢除，使民衆被空中襲擊，則以軍人爲職業的人向義勇軍施行槍殺及摧毀其房屋的權利又將如何？這種現象，有如足球場爲旁觀者所混入，搶踢足球，追逐公證人，不肯照原來雙方的數目計算一樣地混亂。

軍事當局不肯相信這新時代的啞謎。這種主張是他們所不贊成的。戰爭從來是兩方面的，當

然現在仍然有雙方面的存在。這是由政客們去給牠一個定義。他保持着一個強國有向其他的一國施行意志的觀念，而在舊式的戰術中，加以新的宣傳方法，封鎖與攻擊後方的戰術以及利用最新的化學與空中利器來威脅敵人民衆，使其喪失鬪志，敦促政府讓步。到末了，便有一個結束的進兵，經過失敗那一方的首都。他不肯和一個不是讓步而祇是崩潰的，沒有負責的繼任人的政府開任何談判。這樣，戰爭便無定期的繼續下去。

對於財政方面，他也絕對不理會，到底新式戰爭的糜費與戰勝者達到目的後所獲得的物質利益兩兩相較如何？對於這一點，他們太過謙虛而不敢表示意見，其實人們也不希望他四方八面都想得這麼週到。他的所事，便是盡力地準備戰爭，利用最新的改良，不計所費而為國家。至於所費多少，如何地來利用他所準備的戰爭，便是政府的事情了。他的工作，是祇限於戰爭，而他非所計。

研究最新的改良，使病態前進的軍事家的心，有了很多可怖的發明。有些與此有關的軍人深切懷懼這新戰爭的可怖性質，時時在他們的言詞上與著作上流露出來。但是他們仍舊繼續備戰，一個牢不可破的傳統觀念支配着他們，而且還有一個原因支配他們，猶如基督教的牧師主教，雖

然對於宗教失去了信仰，但不能不堅守着他們的教堂——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職業啊！於是凡爾賽會議後三十年間，千千萬萬智力最高的人，專門的、航空的、機械的、化學與醫學的軍人，人才濟濟，勤於任事，比較解決當前金融之謎的人才，尤為豐富。這班人，得了人民的贊助，聚精會神，堅苦卓絕，無微不至的在那裏發明新奇的摧殘人類的利器！

這些專門家都不是甚麼超人的人才；此時是一個智力與道德的平庸時代，除了上述的短處，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似乎把新戰爭整個步驟計劃出來的。有些團體是在祕密中工作，以避免外界的抨擊，很自然地，不祇與外國人作對，而且內部也互相競爭，而大多數高居首要的人物，與其說是有天才的專門家。不如說是善於保持祿位圖謀升擢的人。在他們的計劃中，便有不少滯笨的性質。

在英國，一個這種專門的團體很忙碌地肆力於所謂機械的戰爭。在大戰之時，坦克車是英人首先發明的，而且他們是固執己見的人民。當局竭力維持之，雖在財政週轉不靈絕端拮据的時候，軍政部也不減省這一個部分的費用。所有這種的軍事發明品，由機關槍的車輛，到流動的礮車，都

和其他奇異的戰爭器具成了我們今日博物院中的點綴品。

在英人的夢想中，第二次大戰是和這種鐵甲的軍器耀武揚威地橫過歐洲有關的。用了些很神怪的法子，這些鐵製怪物是可以避免陷阱、毒瓦斯帶、地雷與礮火的。還有可以入水的坦克車，而且有些還會浮上來的。漢生 (Hansen) 在他的前次戰爭的準備 (The Last War Preparation) 中說他還找着了些可以升天入地的坦克車的計劃而未被接受。大多數這些發明都未經實用，所以我們今日的戰爭器具的博物院，便缺少這種收藏。

英、法、德三國的專門家都盡力於戰鬥飛機的工作，就中以英、德兩國最有成效；航空魚雷，可以由遠距離操縱自如的，也同時爲日、意兩國研究甚精。法人雖有夙慧，然爲他們不肯捨舊取新的特性所阻撓，是以並無甚麼大進展。在化學戰爭中得盡窺堂奧的厥爲德、美、俄三國的專門家。德國的被迫裁軍，不得不使她的軍事當局專注於一種可以研究，而且可以在暗中準備不爲外界所聞的軍器。俄國方面因爲工業的貧乏，也不得不同此進行。在大戰中首用毒瓦斯的是德國人，所以在一個時期中德人便成了毒瓦斯的先導者。但大戰之後美國因了化學工業的發達也非常注意這種

利器。至於生物學之戰爭，換言之，就是分播傳染病菌的方法，也大爲時人所研究，首先從事的便是美國與歐洲中部國家。

甚至在一九四〇年中歐戰爭之前及其後數年間，分播病菌並不祇是一種理論了。微小的，有如自來墨水筆的管子，方在製造之中。用時把管蓋移去，讓溶化質出來，以之投入水塔與溪流中。毒瓦斯炸彈可以由飛機擲下，由火車窗口擲出，一遇捶擊，立卽爆炸。今日博物院中尙存此項標本。自一九三二年後，醫學界爲受威脅的人民打預防針的組織，也日益增加。

但是對於使用病菌的事情，仍然不能無所遲疑。分播牠們的時候容易，而欲限制牠們的活動範圍卻很困難，如果仍舊捕獲俘虜，佔據城池，則深重的癘疫必將傳染及於施放毒菌的軍隊。所以微菌學的戰爭，甚至在精於此道的專門家的眼光看來，除了一個被陷的城池，人民取了一種富於英雄色彩的報復的手段，纔可以利用牠，此外是不大合用的。除了一九三六年日本想廓清中國北部時，曾經在甘肅與陝西放播強烈的流行症，牠的用處是向來未經正式承認的。照歷史局 (Historical Bureau) 調查所得，其他列強利用之者，多出於牠的下級軍官們的過度熱心，或是那些一

九四五年後所通行的宗教狂者的活動。一九五〇年由蚊蟲傳帶黃熱症至印度，使該地人口喪亡甚多的事情，向來沒有明白的解析理由，人們都以為這是一種偶然的事哩！

在新發明中，毒瓦斯戰爭與微菌學戰爭是平行的。牠的開始與終結是人類知識理智的歷史的結束。牠是最奇異的一種。由這個時代中的衣服與城市建築物的外表，尚有蛛絲馬跡可尋。牠的可怖處，簡直可與古昔殘刑酷法，殺人祭神相比擬，但是牠的不人道處，因為去我們的時代相距不遠而更為顯著。牠使我們深感集中人類活動的普通觀念的必需。牠昭示我們有多少思路清楚見事明敏的人，為愛國義務與光榮的假觀念所蒙蔽，而去協力製造一個最可怖最殘忍的結果！

做這種工作的人，大多數是非常地嚴肅、勤勉和敏捷的人物。如果他們能夠重到這個世界裏來，我們可以見得他們都是可尊敬的、和藹可親的和有知識的人。但是在當時他們卻是一個危險的瘋人組織。他們使千百萬生靈由他們手中備受痛苦與遇到可怕的死亡！

大部分這種準備為毒瓦斯戰爭所用的致命物質，此時已為我們普通知識所不及知。現在牠們如不是永被禁製，便是製造得太少，祇供物理理論學的研究。舊日的傳播毒氣的方法，與我們今

日在大規模的農業與衛生事宜上所施行者甚為相像。即如由天空襲擊大隊蝗蟲，廓除森林中的樹病，定期的清理和刺激穀物的生長，一切的設施是由衰敗時期中蟬蛻而來的。後來便合理化了。華勃爾所持的論調是：不好的開端，是引到好的結果的途徑。他認為這種大規模的方法，是受了戰爭時期中的發明熱狂所鼓勵。他還說，如果沒有戰爭的鼓勵，飛機的應用必定沒有這樣地通行。我們不能不說他這種由愚得智的學說是過事虛張，牠染上了拉斯蒲丁主義 (Rasputinism) 的色彩，這種左道旁門，是主張人們必須惡貫滿盈，然後纔可得到拯救的。

後世仿效毒瓦斯戰爭的運用的便是：二〇三三至二〇三五年的勦滅鼠類，永遠廓清中世紀時代可怖的鼠疫，二〇六〇年的放播『節筵瓦斯』 (Festivity gas)，二〇八〇年的利用溫和的瓦斯來助抗天文的毒質，以及使屋宇、工廠、遊戲場的充滿養氣，喜馬拉耶山谷的利用路透瓦斯 (Lotus gas) 等等。

有一兩種專為戰爭而用的毒質，現在已經在嚴密保管之下，應用於工業之上。預備毒質是大大逆不道的事情。牠們是有種種的不同，因為每一個的化學原質有異。這些毒質並不盡是氣體。許多



是飛化的流質或是可以溶化的，用時把牠散播於敵人居處地方之上。窩克爾博士 (Dr. Gertrud Woker) 於一九三一年曾作一篇關於毒瓦斯的論文，列舉當時對於毒瓦斯的知識。同時她的同事們又出了一本叫做新戰爭的性質將爲如何 (What W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見歷史文件九三七及二〇五) 的，兩相參考，我們便可瞭然於當時軍事專家實際所知的多少。除了一個重要的例外以外，她已列舉了一切已經存在的毒瓦斯的種類。到了一九三八年，此種研究已經登峯造極而無所不至。後此雖有改良，但並沒有甚麼大的新發明。

一九四〇年後，因爲經濟恐慌，便連軍事研究也受到限制。到了一九六〇年，簡直沒有一個化學工廠能夠出產大規模的原料，足供毒瓦斯戰爭用途的。

大戰時所施用過的毒瓦斯，以綠氣與及各種的綠氣混合物爲大宗。這種都是攻擊與毀害肺管的東西。一九一五年四月德人在烏拉斯 (Ypres) 地方施用綠氣，死六千人；不久即棄而不用，因牠的刺激性太大，立刻可被人們發覺而施防禦。其他毒瓦斯，施用時並沒有這樣明顯。先是被害者發爲咳嗽，當肺中氣管與氣房繼續被摧毀之時，他嘔吐大作，呼吸窒息，把血和筋絡都咳出來。死時

身作深藍浮腫的顏色，口唇留些血泡。如果幸而不即死，但肺部受傷過劇，亦易於爲肺病菌或其他  
的病菌所襲擊。這類的毒瓦斯，各有各的特質的。有一種專侵害人的神經系，使人狂癩、恐怖、拘攣、銳  
呼與麻木。在大戰中，整千整萬的人都喪失生命於青十字氣 (Green cross gas) 之中，有些專門  
家計劃着照這個方法可把整個人口來屠殺。青十字氣的應用，一九四〇年五月波蘭人轟擊柏林  
時會稍用之，然未盡全力；而從德國輸送到華沙的飛機炸彈中所含該氣，成分便較爲濃厚。又一九  
三五年日本人曾以此種毒氣攻擊南京，而中國人亦用牠在大阪報仇。

黃十字氣 (Yellow cross gas)，或叫做辣氣，是比較更陰沈、殘忍與致命的毒氣的一種。牠並  
不真是氣體，而是一種飛化的流質。當牠冷了之後，便變成很薄的一層氣，分散於地上，附在人的鞋  
襪和衣服上，被帶到各處。慢慢地，當牠散氣的時候，人們便感覺很不自然，疑懼交併，咳嗽作嘔，痛苦  
萬狀。凡是與牠接觸的人，無一倖免；牠燃燒着，牠潰爛着，牠腐化着。祇要空氣中有五百萬分之一的  
辣氣，立刻便侵及人的肺部。牠蝕人皮膚，灼人眼目；牠使人的筋絡腐潰；牠使人身體各部都失去功  
用。被害的人，幾乎沒有可以完全療治好的。最高限度，牠可以立刻致死；最低限度，也使人延長痛苦，

促短生命。一九三四—三七年中國北部戰爭，以及中國人的向日本回擊，都是用這種毒氣。一九四六年柏林全城的撤退，也是受了黃十字氣炸彈的威脅。

「這種炸彈的確是投擲下來，不知道是出於偶然，抑或是出於波蘭僱用的化學家的不肯效力，所以爆炸得並不利害。這是和平主義的怠工幫助中歐停止戰爭的一個明顯的事情。五個有關係的化學師是被槍斃了，十七個是長期監禁了，但他們審判的紀錄並沒有留存下來。」

和青十字黃十字毒氣同時並用的，窩克爾博士尙舉出一種藍十字毒氣 (Blue cross gas)，這種是直接侵襲神經的質地，細微如塵。牠可以通過當時的防毒氣面具，使人感受痛苦，噴嚏惡心，失去自制能力，並使被害人會自己撕去面具，這樣，青十字氣與黃十字氣便乘機侵入，制其死命。

所有這些毒氣在大戰的時候已經肆虐過了，戰後更暗中活動，極力培植。幾乎經過二十年的工夫，纔分別專門。其中有一種很著名的叫做路易絲蒂 (Lewistite) 爲芝加哥一位大學教授叫做路易的所發明。這是一種砒質的混合物，一千萬分的空氣中祇要有一點，便可以使人失去常態。牠是嗅不到氣味，試不到味道的東西；但當牠在人們的身上開始襲擊之時，人們便立刻感覺到牠的

毒力有如辣氣，可以產生一種很強烈的病症。

其他毒氣也接踵發明，有仁慈一點而立刻致人死命的，有殘酷慢性，侵蝕腦筋的。有些使筋絡拘攣作結，比以前人們所恐怖的筋肉強直病尤其厲害。當試驗的時候，毒斃羊羣的慘狀，便可以明白牠的厲害：『所有的羊都爲這樣毒氣所殺，祇有三隻是頭撞圍籬腦裂而死的。』在協助窩克爾博士所稱爲『大屠殺』的工作，還有高度炸藥的研究以炸毀防備毒氣的托庇所，那裏往往有驚膽亡魂的羣衆躲藏着！

還有一種叫做永遠死亡毒氣 (Permanent Death Gas)，是一九三四年科瓦德 (Kovacs) 所發明的，不在窩氏所列舉的名單之內。牠的混合尙祕而不宣，牠的繁雜的準備，尙是犯法的。這種混合物雖然不能說是永遠的，但是溶化得極慢。牠本身並不是氣，也不是毒物，而是一種粗重的粉質。牠的飛散像樟腦一樣，和養氣混合之後，便成了一種毒質。如果爲五千萬倍的空氣量所稀薄化，仍是有效。牠的功用和路易絲蒂的種類相同，第一次波蘭戰爭中斷普魯士的東部的聯絡，便是用牠。在全邊境三哩之長的人民都退卻，而整個地方都滿灑了永遠死亡的毒氣。東普魯士便成了一

個半島，唯一出口是由立陶宛或者是由海道了。雖然這種粉質很粗，但風力把牠帶到十五哩的闊度，一直把牠的毒力傳播到但澤附近地方。

這個大屠場是人跡不復到的，直至一九六〇年後，纔有些蒙了特殊毒氣罩的探險家到來盤桓。舉目所見的，不但是人類及入於毒氣範圍中的牲畜的殘骸，並且還有鼠與鳥類等小動物的羽毛皮骨。有些地方，這些殘骸的堆積，幾乎有一公尺深。戰爭圖畫中有兩幀就是此類景物的寫真。至於植物卻未曾完全毀壞，樹木是留着枯幹，草類有些亦受影響，有些反轉為繁茂，遍地毒草如茵，唯一有生氣者祇此而已！

永遠死亡毒氣的附帶產物，是一種偶然發現的絕種呼吸氣。一九三五年間日本肆行用青十字氣向中國南京施以攻擊之後，是年中國的雪恥團便組織空中長征隊飛往大阪東京作報復。原欲使日本人心受到震恐，於是遂用永遠死亡毒氣作攻具，但因爲準備的倉促與危險，或者是出於偶然的錯誤，那個公式似乎是弄錯了。結果當襲擊的時候，——所有的飛機在歸途中都被迫降落——除了雜有吐瀉的暫時寒熱以外，並沒有旁的可怕現象。

日本方面對於這班不幸的飛行家自然予以嘲笑。直至數月之後，歐西方面纔知道大阪東京兩個地方的醫界報告全城的孕育完全停止了。貓犬也不生育，牛羊亦無種類，鼠類亦爲絕跡。而且都是永遠性質的。祇有鳥類不受影響，在這兩個絕嗣的城裏，麻雀和雞是依然繁殖，這個理由赫斯利 (Crayford-Huxley) 已經告訴我們了。

中國的化學師一定從錯誤中發現了那稀有的，一種叫做 Pabst's Kinetogens 的氣質，這個可以影響生育的。現在的生理學家得了巴布斯 (Pabst)和他的助理人的努力研究，用花類與獸類來作實驗，因而明白這種的毒氣的內容，在此之前人們所知道的，祇是絕種呼吸料的一個名詞而已。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四十年間，剷除傳染鼠類，使大大地利用這種毒氣於人跡所不到的地方。把這種毒氣試用到優生學上來，恐怕是不久的事情了吧？

日本此次經驗，給予世界的恐慌，比較真的大批屠殺還要利害。日本軍人和西方軍人一樣，都是很情感化的，他們不獨主張人民爲國效死命，而且還須爲國家生產大批新的人肉礮彈。日本愛國者還未曾知道中國的絕種呼吸氣的原料有限以前，他們是極爲震恐。他們看着一個絕種的危

險將要降臨，當勝利的時候，他們已經剷除淨盡了。在以後戰爭更加兇猛的時期，舉世騷然，爭相提議欲大大地利用這種毒氣於巴力斯坦、亞拉伯、愛爾蘭、中國全部以及非洲的一部或全部。但人類幸而避免這個厄運，因為這種毒氣的初次製造是出於偶然的，準備在暗中進行，發明者無可追跡，而且正當的公式，一直到航空獨裁控制全個瘋狂的世界之後，始經研究出來。

所有這些新戰爭的可怕利器，如何地利用來屈服一個敵國的意志，是永沒有思維過的，即使有，這個計劃也是絕對的守祕密與創製者同歸於盡，無可考尋，千百萬人已經中毒了，無數的城池滿佈着屍骸了，此後還有甚麼呢？恐怕是，從事此等事業者技術上的興味，把久遠的事實忘懷了。我們對於毒瓦斯的戰爭所得來的印象不過是一些惡毒殘賊的計劃。這種過分的摧殘，和龍都·馬璧 (Loando-Mobi) 的雜種猿猴所表示的殘酷處，相差不多。

但是有些計劃已經異常地成熟，使人們對牠發為疑問的了。即如在海戰博物院中，那裏陳列着五六隻攻戰潛艇，是四個列強各別的所有物，都是為遠距離毒瓦斯戰爭而設的。牠們沒有裝載槍礮或其他的戰爭器具。牠們有着很長的海線，內中有由五架至九架滿載毒瓦斯炸彈的飛機。其

中之一，載着三十個長途航空水雷，一切的儀器具備。炸彈之中，有四種不同的毒氣，但牠們的性質與功用是無大差異的。最小的攻戰潛艇也可以足載攻擊八百方哩地方的材料。如果完全成功，大足以使當時的倫敦、紐約經過毀壞、拘攥、窒息之後，全城佈滿了可怖的屍體。這種戰艦使倫敦不能避免日本的侵害，使東京不能避免都柏林的進攻，牠們把世界上最後安全一角都廢除了！

這六隻像惡魔般的怪物在博物院中分開陳列着，牠們的毒齒去了，牠們的使命消失了，祇留了可怖的遺跡，象徵着衰敗時期中人類的腦筋爲痛惡絕忌的觀念所摧殘，這不過萬千事實中的一個夢囈而已！人類把牠們造成，有如古昔黑暗時代製造酷刑的器具一樣。甚至在吾人今日安居樂業的生活狀態之中，吾人不要忘記，設使環境不同，即使像我們這樣聰明，恐怕也會計劃與製造這種東西啊！

我們已經很詳細地敘述毒瓦斯戰爭的恐怖了。簡單說一句，自始至終，毒瓦斯戰爭已經損害了一百二十五萬本來是應該很繁榮與快樂的生靈。所造的罪孽是這樣，他們感受到痛苦，而且過去了。問題的中心便是，自從大戰使軍事家知道舊式戰爭的無濟於事而增進努力之後，戰爭科學



並沒有多大的進步，而祇注力於發明。可怖的利器接踵地一一發明來殘害人類，來傳播惡疫與憎恨的心，來摧毀工業生活，來使各國不能安居，來破壞有秩序的社會維繫，但牠無論怎樣，總沒有達到一個綿密而確定的安排。沒有將來的計劃，沒有把全世界作整個的觀察，這千千萬萬的祕密專門家，繼續地在這裏積聚可怖的炸藥，在那裏貯藏驚人的毒菌，而又收藏發展這樣那樣的殺人的毒氣。

沒有一個完全的計劃來把個別的罪惡中心集而為一個整個的組織，像霍亨索倫王朝的軍備，那樣以顯明而自動的戰爭來維持的樣子。一九一四年在德國王黨奸惡詭計之下，也有一個真實的計劃，根據了條頓的思想，以條頓民族來做核心重行改革世界文明的慾望。當中雖然有弱點，但牠是合理而完善的。自一九一四年之後，戰爭的計劃，便永遠沒有恢復牠的完善性；永遠不能重新達到同樣的合理點上去。自此以還，敵國喪失了理智。牠像其他的東西一樣，推動到那裏，便行到那裏。但牠已經沒有一點牠是做甚麼的觀念了。

雖然如此，在全世界內四處埋伏的地雷，如果同時併發，牠那爆炸之慘，有為人類想像所不及

的。牠大可以把人類毀滅，而且不須更改大勢，祇須將偶然的事件重加安排，即足促成那最後的大禍。

這種混亂的慘劫與無目的的殘忍，在無組織與無保護的世界內，延長了七十五年。自一九三五以至於一九六五的三十年中就是歷史家所稱爲最不穩固的時期（Period of Maximum Insecurity），時時在南京、北京、大阪、柏林、華沙這幾處地方發生重大事故，使人道主義的健全分子愈加堅決地去謀一個世界的和平。更可幸的，便是在新式國家孵化時期中，那兩個根本的傳統罪惡能互相牽制，債權者的貪婪與軍器商人的貪婪是平衡的。軍械的代價日高，購買者的力量日薄。如果經濟使人生陷於貧乏，至少牠剷除了發展新式戰爭的勇氣和信心。於是化學戰爭也隨着舊制度中其他的組織而歸於淘汰，使個人的資本主義淪於破產。

## 五 世界和平的消失——日本再啓爭端

國會制的民主政治廢除了真的政治領袖而代以虛有其表的領袖，這種人大都是選舉的結

果，不能創造勢力，不知應付艱鉅，一無所爲，而祇知居高位，享厚祿，攘權利。他們跟隨着舊制度的崩潰而不知道努力去防止牠的腐化。他們何必去努力呢？他們是公衆意志的代表，如果那裏沒有公衆的意志的時候，他們能努力甚麼呢？

關於這班力不勝任的人物如何地去應付那個扼殺人類經濟生活的金融混亂情態，吾人已  
有前言。恐怕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用過一個月的工夫去研究當時真實的情況。在凡爾賽  
處置不善所生的困難積累之下，這班受了人民信託來做領袖的棍徒的行爲，是很曖昧和無能的。  
沿意、德兩國的東、西，創痕潰爛，而沒有人想法子去醫治牠。在遠東方面中，日的衝突，不顧歐、洲的抗  
議，成了正式的戰爭。舉世都高呼着需要共同的行動，但是沒有共同的行動。國、聯委派調查團，祇將  
不可救藥的情形作了一個很好的分析。

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去防範大勢的進展。各國的領袖習於表演他們的傳統姿勢，似乎除此  
之外，他們是毫無爲力的了。但是歷史的成例也有不能因襲的一天。他們想去做手勢，但他們的四  
肢已經變成了雲石，週轉不靈了。

在列強之中，日本的態度是最強硬的。一九三一年日本內部革命，政權入於愛國軍人的掌握中，這個富有日本傳統思想，橫暴外交，任用情感的團體，非常地努力，而又非常地缺乏遠見，醉心於歐洲十九世紀的侵略帝國主義。這一班統治人的心理是仍舊很浪漫的，以發揚光大國土爲榮幸的。他們的軍事動機是拿破崙式的，他們的外交藉口與掩飾便摹倣歐洲最好的前例。現在是日本的機會來了。

研究日本帝國主義者幻想中的事實，費了吾人歷史研究股很多心思。其實，這也不過是當時任何一個自認爲有智力的強國，幻想牠的所爲而已。祇在一個半世紀之前，日人接連地入據中國的城池，使今日的心理學家大惑於何以當時的人類，會瘋狂地去做這樣的一件繁重而冒險的事情。何以這些聰亮的人們會有這種行爲呢？

問題的癥結便是人心把不愉快的真實性加以壓迫，因而反覺泰然，生活於空中樓閣之中。像西方的銀行家，經濟專門家，負責的政治家在經濟破產之前，是不知道他們的金融政策是趨向這個崩潰之途的，所以日本的軍閥也不能預測他們大陸冒險進展的自然結果是如何的。他們沒有

看見在他們背後，有困苦萬狀，農村破產的農民，身體道德日趨頹落的勞動階級；他們並不計較在工人受剝削受壓迫的工業中心中革命者的怨言；他們不明白國內知識分子的宣言反抗。

甚至外而金融信用日跌，內而經濟恐慌日增，尚不能使日人稍生恐懼之心。日本在勇往直追西方前例之中，便很快地想像西方革命那種種情形，一一重現。她的領袖人物沒有看見這些。他們所看見的，祇是中國是無組織的，她正在掙扎着找尋一個新的團體生活的法子去替代舊的弛緩的帝國主義，而且照國際的把戲看來，這是日本的機會了。他們腦海中橫着大莫臥爾帝國（Great Mogul）的瓦解，使印度爲歐洲海寇式逐鹿之場，而建設了一個毫無目的的英屬印度帝國的前例，命運之神現在給予他們一個同等光榮的機會，使日本雄霸於亞洲的大部分。誰能够說他們帝國主義的冒險在甚麼地方終結呢——抑或是否有終點的呢？在他們的前面開展着無限權力與光榮的迷景，這個迷景自世界開始的時候，便向創設帝國的人招展着了。

他們竟昧昧然於新的戰爭，現代的工業主義，與個人資本主義的自殺，也不計及俄、美兩國的敵視，知識分子的反抗，與及中國人口的數目上占優勢，民族的傳統結合與固執的心理。他們祇知

作着帝國主義者的迷夢。這是一種自大的狂病，會引到喪失了三百萬的戰士，使中國社會完全解體，而至於日本帝制的崩潰。

關於這次戰爭的詳細歷史，讀者們可以研究由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漸進而正式侵佔中國內部的專史；上海的試奪，滿洲的佔據與傀儡的滿洲國的成立（一九三二），山海關之攻陷，進而深入長城，侵略中國內部，直入北平，這一段的戰爭是仿照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方式。中國既缺乏新式軍器，又無準備，日本人便毫不費力地達到他們的目的了。

在初期戰爭之中，在日內瓦的無力的國聯也曾提出抗議。國聯調查團所作的『李頓報告書』（Lytton Report）尙見於現在的歷史文件之中。但與這些諫議南轅而北轍的，便是英國外交部模稜兩可的言詞，法國軍械工業與報紙的贊助，美國一部分銀行家與輿論的公然鼓吹。有了這麼多的派別，難怪日本的軍閥要置歐西的批評於不聞不問了。

日本於一九三五年進佔中國的北平天津，且在北平建設第二個傀儡帝國。但他們很難於使中國就範，尤其是西南各部。滿洲、內蒙古與山西之間土匪與革命軍滿佈，而揚子江流域未被佔據

的省分在改組的國民黨領導之下，繼續應戰。在全中國境內日人不能安然獨自來去，一個強有力的、以恐怖的力量到處維持着的經濟絕交，依然繼續。國民黨為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所手創，經過各種的改革與共產黨及歐洲的各種法西斯蒂大同小異，抱有一種固定的宗旨。牠沒有中心，沒有正式的首領，牠是深入人心的組織，為軍事戰爭所不能剷除的。在抵抗的痛苦重負之下，牠竟狂熱地愛國起來。

到了一九三六年日本的軍隊，由滿洲以至於廣州的邊境已經達到一百五十萬人之衆，廣州是第三個被佔的地方，但是除了她礮火之力所達到的地方，日本是不能控制中國的。她曾經用黃十字氣兩次大炸南京、北平、武昌和漢口幾處地方。千千萬萬的人雖被屠殺，但是中國，這個可憐的無脊椎動物般的巨體仍然能够極力克制着忍受這種損失，為其他比較有組織的國家所不能及的。中國的雪恥團也一鳴驚人地飛渡向日本施行報復的轟炸，為了把毒氣混合弄錯了，使大阪與東京兩城永遠斷絕生殖的能力。

中國的空軍力量在未有舉動之前，是為人所不及料的。飛機是由瑞典取道俄國而來。但是差

不多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把軍用品供給中國。不知來蹤去跡的戰鬪機與炸彈在天空出現，噙然渡海直搗日本。一九三五年有日本船被炸沈於渤海灣。一九三六年三隻日本大艦在海口五十哩之內爲不知來源的地雷所毀。各種的戰爭原料，北方來自俄國，南方來自英、法屬地，而美國方面因爲日本的野心日益暴露，對中國遂大表同情。歐西的觀念自始便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日本的懷疑，二是想中國根據資本主義的立場恢復秩序，免至與共產黨攜手。其後日本的進展愈促，歐美的感情便都趨向中國。一九三七年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向華盛頓政府申請以合作保障替代帝國主義的聯繫。他們是倡議爲太平洋中的歐洲屬地作一個相互間的保障。在一個時期內，似乎因爲日本的火焰迫人，西方各國有取一個聯合的陣線的趨向。但是大戰所給予歐洲中部的奇恥大辱，還令人痛苦，竟中梗着這個計劃而不能見諸實現。

日本在實行計劃征服中國的野心企圖之前，內部已感到經濟的恐慌和社會的騷動。其後因不費一兵一卒而佔有滿洲，進據北平，中國又無精銳的軍械和她抵抗，這樣乃使日本野心愈熾；在戰爭過程中，日本曾三次大獲勝利，但不能使戰爭終止。沒有侵略者可以最後征服俄國的，也沒有



人可以把中國完全克服。一省雖陷，他省又起，繼續作敵。四川與南方各省以無窮盡的原料幫助國民黨的抵抗。最後情形，竟有日兵如不能進到西藏，在中國便永沒有和平的趨勢。

在日本，人心漸感征役之苦，厭惡戰爭。農人眼看着他們的兒子從軍一去而不復回，百物的缺乏，浸成饑荒。一九三五年間已有要求「停止戰爭」的呼聲，罷工風潮，繼以流血，不絕地在名古屋發生，其後竟如狂地向外國探探併政策，不獨須支付軍器費用，而且現在大宗入口的澳大利亞的肉食，加拿大與美國的穀類都成爲必需品了。戰爭使日本本國喪失耕地的農民，而毀壞中國大部面積的生產力。日本的社會組織又是這樣地古陋，不能像德國在大戰時期中施行經濟的奇跡。日本的信用日趨消沈。甚至欲以百分之十四與十五成來借貸外資亦不可得。而戰爭前途仍是一片渺茫不知伊於胡底！

日本軍閥已勢成騎虎。在他們的背後有着一班備受痛苦的人民隨時可以攜貳暴動，在他們的戰爭的週圍，又有俄、美、歐洲虎視眈眈地旁伺着。根據了他們傳統的思想，這些軍閥便立了一個以全力作一孤注的決心，大舉向中國中部湖北省進攻，壯了盡發，志在給予中國一個致命的打擊。

大軍分三路由南京、山東與廣州向湖北集中進攻。廣州與山東之間雖有鐵道相通，但難於保護，除此之外，其他運兵之路極形缺乏，當日兵進至湖北之時，由軍中挑出三分之一的士兵來做築路的工作，他們所能够攜帶轉運的重軍器並不優於中國人的，此時中國人藉四川的富藏作後盾，歐洲的同情爲鼓勵，不懈地與進攻者應戰。日本的三路軍隊在武昌的週圍作了一個鬆懈的，曾有一會兒慢慢地緊縮而不久即失去緊縮力的環圈，繼着便是雙方因爲精疲力竭而成了一種沈死的僵局。在揚子江的上下游戰圈是不完密的。一九三八年整個年度，日本徒然空候着武昌方面半圓形戰壕的好消息，而杳然無所聞。七月癘疫大作，日本軍中衛生與醫術，亦至力不能逮。一九三九年初便不得不向南京方面退卻，運輸混亂，兵變時時發生，四鄉義勇軍便蜂擁而起，向其襲擊。

關於此次總退卻的可怕景象書中並無詳細記載。日本三路軍隊原有二百萬強，而在退卻之時不及一百萬。日軍感覺糧食缺乏較中國的義勇軍尤甚，餓兵由隊伍中遺留下來，疲伏道旁，等候其末日到臨，俘虜甚少，中國人即使有仁慈之心，也沒有糧食去養他們，所以飢餓不能前進的日兵祇可以臥死道旁了。所餘殘餘的隊伍，到了南京，不能超過十萬的數目，而那些由交通路線，從南北

兩方面打開了一條血路回來的人數便更少了。其餘的二百萬人，或瘦骨嶙峋，或葬身河流，或在中國綿亙的山脈中匍匐而行，乏力墜地，互相枕藉。抵南京後，這班生還的戰士，纔知道日本在太平洋方面方與美國作戰，而大阪與名古屋已在共產黨掌握之中。

日本軍隊倦伏於南京以西的戰壕中，歷時數星期，便爾發生變亂，槍斃軍官，宣佈與在其眼前的杭州進展到南京的中國紅軍共同參加社會革命。

美國的參加東方戰爭，使黷武的日本完全喪失圖志，實因美向中國供給地雷潛艇，大遭日本之忌，自經日艦在渤海灣被擊沈沒之後，兩國衝突益趨尖銳化。

直到最近，日美海戰的歷史纔有詳細紀載。當時的紀載多有失實之處；即使不是完全疎漏亦未免張大其詞。最近事實證明不獨私人企業製造地雷與建築潛艇，而歐洲各國海軍因經濟恐慌亦以大批新式潛艇拆成零件出售於南美代買軍火的商人。此項潛艇，稍經改造以後就運到比魯與智利港口等候，飛機由太平洋輸往菲列濱。菲列濱羣島是準獨立的，但是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總統第二的宣言，實際上使牠受門羅主義的保護，而日本永遠沒有這樣的多餘精力去與這麼一個

不正式的保護國挑戰。此時菲列濱羣島便做了騷擾日本海外貿易與交通的根據地。

太平洋中海軍的情勢是非常地複雜的。菲列濱東面是拉都龍斯 (Ladrones) 一團分散的火山島嶼，其中最大的一個叫做關島 (Guam)，凡爾賽條約中已經把牠支配給美國，一向用爲美海軍港，而其餘的島嶼就爲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先是爲西班牙所有，一八九九年後爲德意志所有）。日本爲條約所約束不能在此處建築礮臺，但在情勢日急的狀態下，遂不顧一切，建立潛艇根據地。此時情勢愈趨緊急，而介於拉都龍斯、菲列濱與亞洲大陸之間的風雲，也日呈險惡。美國艦隊威脅着集中於拉非之間以保障菲列濱的中立。日本亦在中國海岸集中游弋，而從事私掠的潛艇與來歷不明的船隻亦大肆活動，私運軍火與軍需，以及攻擊日本交通上的弱點。

在水面上，一隻潛艇可以和其他的船隻一樣懸掛國旗以示區別，但地雷是沒有旗幟的，在水底，一隻潛艇要認清本國潛艇的信號尙易，但沒有方法可以分別孰是中立的，和孰是敵人的潛艇。所以錯誤與假錯誤之事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三六年美國有兩隻潛艇失蹤。不久，幾隻日本潛艇在拉都龍海峽也不見了。在中立地的紛爭，便引至海底的屠殺。美國海軍便挺身而出任其事。到了一九

三七年不正式的海戰，已經在太平洋西邊發生了。

日、美兩國都不急急於正式宣戰。美國方面雖然有羅斯福第二的大膽試驗，或者是因了這個原故，反而使得國內經濟與政治更顯得不靖；日本方面卻是正在集中全力向中國作致命一擊的時候，無暇及此。但是很多美國的保守分子認太平洋戰爭是使國內精力目光分注的唯一方法。有鼓吹重行吞併菲列濱的呼聲，自日本在武昌失敗之後，日、美公開作戰的趨勢，便如水潰堤，不可復制了。

此次海上戰爭的詳情，不庸贅述。兩國戰艦遇戰於太平洋西面，經過兩日的礮擊與嚴重的損失，便爾分離。日本方面似乎把軍火用罄了，因為她的戰艦在一個黃昏的時候，用煙幕彈掩護着退卻了。美國人自稱得勝，則因為他們可以達到馬尼拉，而日本人則退保他們的地雷與潛艇，而且因為原料的缺乏，不能捲土重來。兩國此時都感受內部的混亂壓迫，而他們的戰爭，就專門的眼光來看，是永遠沒有終結。那便是說，因為兩國都在崩潰之中，他們之間並沒有簽訂一個最後的條約。他們都崩潰了。社會革命結束了這個戰爭的一幕。

〔此處讀者們可以把這次戰爭和那個無終結的、厭倦延長的拜占庭與沙散聶的戰爭比較。小亞細亞因此荒廢了三百年，直到回教徒把這個痛苦由歷史上拭去，也不能算是結束啊！〕

日本的社會崩潰急激地進行着。大多數的人民與農民都沒有受着歐化的影響，他們很快地便接受了共產主義，一如和他們同道者，在廣東、浙江與福建所採用的方法。有一小部分受了歐西文明洗禮的知識分子，便在較大的城市將這個作亂的共產主義根據莫斯科的模型來建立一個新式的建設的組織。舊制度瓦解之後，黷武主義便淪為盜匪行為與地方割據間舊貴族的遺裔，率領他們的門客衛隊組織非法的機關，以魚肉鄉里的。

數年之間，整個亞洲由太平洋直到波斯已重復跌入政治與社會的混亂狀態裏，耕種祇以糊口，民貧如洗，災疫頻仍。印度的大部分又復淪於野蠻時代。共產主義的名詞，——並不是牠的精神與方法——使很多一向未受其他歐洲思想所薰陶的人民，深入彀中。牠不是一個有五年計劃的共產主義，牠沒有一些計劃的觀念。牠祇是絕端殘酷的階級戰爭。牠大量地屠殺借貸人和收稅者。牠造成了一種奇特的宗教性的熱狂，廢絕養生之道，認為惡事。印度的皇室勢力並不推翻，不過牠

的權勢已經被剝削。王公們表面上似乎很忠順，但他們暗中把鄰近的「擾亂區域」竟行併吞。地方上行險徼倖之徒創設低度的社會秩序，完全脫離任何中央權威的統轄。

## 六 西方在亞洲的失勢

半新式的歐洲帝國主義的影響，漸漸地在亞洲消失。甚至早在一九二九年時與深入中國人心的共產主義相同的農民共產主義的蔓延，使印度政府大為震恐。英印反動者在米勒地方的被捕審判，以及一九三三年判決他們的嚴刑，大可以表現政府恐慌的嚴重性和當時應付環境的政策如何地不智。

英帝國的失敗，並不像羅馬帝國那樣的崩潰。牠是慢慢地廢弛的直到無可收拾為止。不幸得很，當牠在印度失勢以前，像牠在愛爾蘭一樣，牠曾經有一次緊縮的堅決心……

（註：此處雷汾博士的遺稿有數頁遺失。）

## 七 新式國家與德意志

在人類歷史中一個基本重要問題便是：何以大戰所給予的教訓以及繼此而來的經濟與社會的混亂狀況，以我們的眼光看來，差不多瞭如指掌，爲什麼獨不能使當時天下各國的思想受到一絲影響呢？經我們的回想，覺得所有英、法、美、意、德、俄的思想，似乎都在想改變成見與愚昧的各種後果。何以威爾遜始創的世界統一，不能廢續呢？何以一九三二年後，當整個世界都高呼着要有一個中央的權威來統一幣制與經濟生活的時候，竟沒有一種力量來改造國聯呢？何以衰敗的時期延長得這麼久呢？吾人已經注意到那些重大的原因：便是唯利是圖的輿論機關，大規模的反社會的個人利益，以及傳統觀念的重重束縛，學校教師的保守觀念，以及經濟恐慌引起社會的分崩離析等等。但是綜集了所有上述的原因，也不能使人類對於當時情勢，矇然無所覩，漠然無所動啊！

除了上述的原因，尚有一個主因：那便是改造的勢力自身的弱點，一個根本上的缺陷。世界絕對不能渡過難關，因爲牠沒有一個固定完善的思想來策動牠去做甚麼。不錯，牠是有思想的，而且



恐怕太多了一點，但是都是些糾雜而且往往自相矛盾的思想。一個溺水的人除非他有點着實而可依靠的東西足以憑藉而游泳，是不能以游泳來拯救他的生命，所以這不是道德與物質的缺乏，而是智力的缺乏。有的是拯救的意志，拯救的材料，卻沒有拯救的計劃。世界是沒有一個固定的目標的。這目標還須世界自己去找。

仔細地去把那時一種模範的社會文化——德人——的心理與情感的內容加以研究，會使我們把事理看得清楚一點。和此大同小異的便是法、英、俄與西班牙的社會文化。牠們的共同點便是牠們見不到，除了一個整個完善的拯救便無可拯救的事實。牠們勾心鬪角地互爭雄長，而使統一成爲無上的困難。戰爭的恫嚇，經濟的極端不安定，不景氣金融狀況的無以應付，以及時常的勞心焦思，使到每一舉動都顯得不正確與不合時，這一切都爲每一個國家所感覺到的。

我們必先瞭然於大戰前那個使全世界歐洲化的雄圖野心的日趨沒落，然後可以知道衰敗時期所以延長。有幾個對於世界社會的健全有重大關係的事實，實不容忽視。世界渴望獲得統一，而歐洲不能肩起領導統一的責任，因爲歐洲內部方在極端的混亂着。世界大戰，只是自世界繁榮

初期以來，所潛伏的膨脹力的爆發。當歐洲人——一九二〇年已佔世界全人口四分之一——想繼續他們二百年來的向外發展操縱文化的首席地位，他們首宜廓除一種精神上的鋼疾——一種殘弱毀壞難於療治的鋼疾，那便是，互相憎恨之心。

雖然自一九三〇年以來，歐洲的國際空氣日趨緊張，然而直到一九四〇年，戰爭纔爆發起來。這個火藥庫在歐洲埋藏了十年之久，明知戰爭不可避免的心理，加增了牠的嚴重性。威爾遜總統所手創的波蘭走廊，波蘭的出口，便是此次戰爭的導火線。但牠也祇是摧毀那個無能的國際聯盟以及準備着炸毀不幸的凡爾賽和約及其附屬的「解決」而使不能重加調整的動力中的一種。

歐洲人的心理，可以用德國人來代表。自一九〇〇到一九五〇年間的歐洲史，單獨研究德國人的腦筋已足說明，牠的痛苦以及由牠引起周圍人們的反感，莫不為研究的好材料。牠是一種特出的強健而簡樸的腦子。牠使人仰慕牠，但又妬忌與恐懼牠。牠對於物質科學的造就是偉大的，牠對於工業的組織的精神是無與倫比的，牠那數學上與心理學上的缺點又有參加其中的猶太人的智力來補救。如與他國比較，牠沒有像盎格魯撒遜那樣委婉的政治思想，沒有法人的天生風慧，

沒有意人的勇敢，沒有西班牙與俄羅斯的詩意的權力。這些便是牠顯明的弱點。牠的頑鈍的專制組織以及牢不可破的種族觀念中梗着，至不能和其他的文化制度作同情的互助。牠欲把非德籍的人民捲進政治網中的計劃是整個失敗了。牠激起了法人自衛的愛國心，牠的海上擴張引起英人的顧忌，牠使美國都向牠表示不滿和敵視。牠永沒有勝過俄國，其實在革命前的俄國，也沒有甚麼可以勝過的地方。（革命前俄人缺乏真的國家自覺的觀念，所知者祇陀司託夫斯基（Dostoyevsky）與「沙」（Tsar）而已。）剛愎自用，是為德國陷於孤立與大戰失敗的最大原因。

雖經失敗以後，德人的智力仍舊是歐洲制度的真實與不可解索的重心。戰爭與災害並不能更改事實，歐洲的脊梁，最精巧勤奮，最可教聰慧的人民，仍是說德國語作德國思想。凡是聰亮的政治家，都應該想及將如何對付牠的一個大問題。因為如果德國沒有問題，便甚麼都不成問題。但是可惜卻沒有一個充分聰亮的政治家能夠想到這一層啊！德國是曾經富於自大狂的。一戰之挫，使牠大大地失望，牠已經棄擲帝國主義者光榮的牛耳，牠已經接受了軍事的失敗。牠甚至經過恥辱的時期。在開始，牠並無特著的憎惡。在絕大困難之中，新的共和國顯着有創造的勇氣、穩健、和對世

界政治重大的認識。

富於創造力與遠大思想的人們，都對德國表示同情的希望心。「現在我們且看德國能做甚麼，」「對德國稍爲忍耐一點吧！」他們這樣地說。全世界對於法國的不信任，都加以謾罵。外有同情的鼓勵，內有精明的領袖，這一大堆的條頓腦力似宜負起了新式國家的工作而與其他感覺失望重作生還的國家相互助。牠甚且應該領導改革的工作。一九一八年或者可以成爲世界復新的一個紀念日子哩！

但事情卻不是這樣的。世界尙須經過六十年的分裂慘劇！在國內，德國的領袖人才來得太遲。施德萊西曼 (Stresemann) 知道事情太慢而死得太速。卜魯寧 (Brining) 又爲興登堡的腐化心理所誤引。照德人看來，本國以外，沒有別的什麼，只是些疲於戰爭，立志復仇的敵人。他們想找親善的友國而只能看見各國的外交部。凡爾賽和會把德國看作大逆不道的罪人的事實，吾人前已言之。她是應該永遠受辱而一蹶不可復振的。尙在腹中的德國嬰孩是與戰爭的刑罰以俱來。他們是在一個不能饒恕的世界裏喘着他們第一次的呼吸啊！

德國的良善努力如何遭受挫折，各國的疑忌如何使她不振，關於這些詳情，可以另成一書。最後，這些世界大戰的失敗者使如困獸般強暴地與瘋狂地掙扎着了。凡可以扼制中歐死命的法子列強都做到了。在這些戰敗國裏的年青有爲的人，是不容許參加重建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的工作的。這是戰勝國的新時代的人的專利品啊！他們居住在懲罰、苦役、重稅的空氣之中，在他們有生之日是爲前進的文明所擯棄的。他們的恢復繁榮與創作大事就會給列強視爲大罪的。

壓迫過甚，必有反抗，很自然地，這種奇恥大辱的環境會使人們趨向罪惡和盲目的暴動。關於這一類的事情，在歷史文件集中有一部奇特的著作（即凱司納（Erich Kastner）所作的費邊（Fabian）一書，於一九三二年出版）描寫德人生活，異常生動活潑，感人極深。此外還有一部生動活潑的著作，便是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法拉達（Hans Fallad）所作的 Kleiner Mann, was nun 一書了。

這種心理，這種窒塞不舒的人生觀並不祇限於德人而已。凡是印度、埃及、非洲黑人中有思想有大志的青年，以及其他被壓迫的、被束縛的民族及階級中有爲的青年——人數佔全世界青年

三分之二——都是同感受一個與生俱來的卑賤與屈辱的痛苦。不過德國的青年對於已國光榮的日子，印象猶新，所以怨對與反抗的精神比較甚一點罷了。因為他們並沒有自覺不如人及甘於屈服的傳統觀念。

不幸得很，卻沒有領袖去指示他們去取得他們合法的地位，把新式世界國家來代替混亂的世界。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的朝代以及戰爭的困厄都阻礙他們向世界大同的路上走。德國的新的共和政府是有名無實的，而在中學大學之中，舊軍國主義的教師與領袖們仍舊生存，很活動地與很惡毒地工作着。社會的輿論，各種組織的意見都跳出了革命的圈子外，而渴望着恢復戰前的威風。他們不滿意於這個新的德國。『這個不是德國，回復到舊的帝國主義去罷，』『讓我們重試。』他們這樣地說。婦女們，不論是母親和愛人，對於這個新時代的精神，都是感覺無上的憤恨的。

當時一個很精密的觀察者叫做南米亞（L. B. Namier）指出歷史上有一個不移的定律，凡是經過戰爭失敗的國家，於戰後十二年至十五年之間必有強烈的愛國心顯現。他以為這個原

因一定是當戰後長成的青年，他們沒有身歷戰陣，只深深地感覺失敗的恥辱，與敵人的可恨。而這班青年便是一九三三年全人口中強有力的中堅人物。

歐洲歷史便在這個狀態之下產生了希特勒主義 (Hitlerism)。亞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是德國勞工階級的優秀產物，而且是歷史上一個最不可信的人物。我們由歷史圖像集 (Historical Portrait Gallery) 第1101-11卷中，從各方面審察他的外表，見得他是一個絕對平常的人，缺乏尊嚴，缺乏優美的特質。由留聲機片中，我們尚可以聽見他的演說詞，在那裏勸誘忠告。他的聲音沙啞而疾促，充滿了火氣，但不相連貫。很顯然這是一個很粗陋沒有學問的人的聲音，暴躁如雷，敲桌擲椅來遮蓋他的紊亂與失望。但他卻有極端簡樸與忠誠的特質，或者這便是他成功的祕訣了。他是飽經憂患不能復忍的德人代表，他是失去了自制力的德國的呼聲。

他一律地排斥外國人、猶太人、大同主義者、共產黨、共和黨、地主與金融鉅子，而排斥他人是一個被壓迫與不快樂的民族所歡迎的。這並不是他們的過失，他們是被賣了。希特勒的政策便是「屠殺猶太人，驅逐外國人，盡力擴充武裝，做一個真正的德國人，光榮與發大。」

人們總記得希特勒從未得着德國民衆的贊同，甚至絕對大多數的贊同也未曾得着。但是人民竟讓他攘奪權力，粉碎共和，過抑公衆談論，與摧毀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精力抵抗他。在他們抑鬱失望的心目中似乎沒有一個較爲完善的政策比得上希特勒所高唱的國家主義，以及他所標榜的政策。老朽的興登堡謀覆共和的陰謀，也幫助這個冒險者的成功。

希特勒的奪取德國政權和把德國開倒車是想模仿墨索里尼的前例。但在智力上他和墨氏相差是不可以道里計。他盡取了法西斯蒂的短處，而沒有費一點力量去重新建設牠。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他的不學無術天生魯鈍處，這就是他採取了一個卍字，來做國社黨的黨徽，這個符號的起源很古，我們在古代史中可以看出來，牠實在是初民時代一種飾物，是那爲古代文化淵源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形式中的一種。牠與『諾狄人』(Nordics)或黑人有無關係，尙不可知。更說不到是表現亞利安族(Aryan)的文化的。他採用這個符號簡直是和德人的文化毫不相關。古代的作者稱牠做『太陽的象徵』，實際上不過表示一點歡愉之意而已。但是國社黨卻視之如神明，把牠做了旗幟與衣服的徽號，見着牠都要歡呼鼓舞。愛森登(Arden Esenden)叫牠做『愚人的



商標」的確，牠對於第二流智力的人們是具有很大的號召能力的。

這樣有一個時候，德國在穿褐衫和佩卍字記號的青年黑衛隊的騷擾之下，脫離了人類的智慧的共同幸福。這正是當牠那頗爲沈重的、耐勞的和忠誠的心靈應當對於人類應付世界問題的鬭爭作極有價值的貢獻的時候。她的真的智力，此時卻徒流於英、美、瑞士之間，或失意遠引或消聲匿跡。她在二十世紀中失掉了爲聯合人類的正當一分子的資格，有如於十八九世紀時她失去了爲歐化世界的一分子的資格一樣。在國內，這個國家社會主義想由破壞去建設，想去恢復她以前的科學地位與工業的繁榮，但她的方法，祇有虛誇、勸勉、固執、強暴與強迫。這是一個很可憐的狀況，一個偉大國家的瘋狂。在這個時期中，德人的生活是很不愉快的，充滿了巷戰糾紛，充滿了專制與恫嚇的官員的複雜政治，最後便是一個毫沒準備，不能成功的戰爭，把條頓民族的天生有條不紊的特質辱沒淨盡。此外就是祕密罪惡與陰謀詭詐的日漸加多。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六年間，德國人民，因暴動、內亂、政治暗殺而致死傷的竟達三萬多人！

## 八 憎恨與殘暴

讀史者對於百年前政治生活的困難勢必難於了解，且亦不能區別今昔教育制度最大不同之點，除非他熟審當時支配人類關係直到擁護新式國家時為止的憎恨事實而後可。吾人對於德、波的爭執，已大致說過，但這亦不過歷史上重要事例之一而已。像這類事實，翻開一部歷史書來看，可有四五十章。差不多到處人類都爲羣衆的憎恨勢力所包圍，其互相痛心疾首的地方，頗爲人們所大惑不解。

憎恨的所由起，大都出於同樣重大的原因。民族間各有其不能相容的偏狹的文化，絕對相異的風俗方言，因人事的變遷，互相接觸便發生衝突。一種社會的狂病因之以生。既然缺乏一種融洽的普通思想，自然是本性上的仇視與一時的衝動來取文化的動機而代之。

到處種族不同雜居混處的人民，便有憎恨的因子存在，除了在巴斯克（Basque Country）、威爾斯（Wales）及拉帕蘭（Lapland）這幾處之外，這種憎恨的情感，大足以左右當時的政治，波

希米亞(Bohemia)的東南部似乎憎恨是無止境的。匈牙利人憎恨斯拉夫人，斯拉夫人憎恨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憎恨俄羅斯人。宗教的不同，牧師的作祟，甚至雖是同種，而亦彼此仇視，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和正教的斯拉夫人如冰炭不相容，在馬其頓的正教希臘人亦各有派別。仇視的觀念，滿佈於古之蘇丹(Sultan)國土與波斯、印度之間。回教亦為兩個夙仇的團體所分裂。這種羣衆的仇視，甚至最智慧的人們也不得不接受牠。牠們絕對的規定了政治家的政策。牠們是超乎人力的節制的。

遏抑與聰明地減輕仇視的觀念是最近纔有的事情。前人並不把這個視作可治的精神病。他們的不知道，人生可以沒有憎恨而安然過去這個原理，正和他們不知道怎樣地去防止傷風咳嗽與肺炎的侵襲一樣。

人類馴服地去聽任可以節制的事情來毀壞他們的生命，的確是一件很可詫異的事情。他們不單是對於憎恨與妬忌不知怎樣去消除。他們讓他們的腦筋去受無窮盡的人為痛楚的蹂躪。直到二〇一〇年他們居住在嘈雜不堪的鬧市，簡直無法可以制止這些擾人的聲音，而那些五光十

色耀人眼目的街道告白，也是到了航空獨裁成立一二十年之前，纔撤除的。那時也不過距有路燈一百年的光景。二十世紀以前，居於北方的人，到了冬季的時候，往往有經月不見太陽，在灰暗慘淡的天光下過生活的。

在十九世紀之前，人們的起居簡陋尤甚，祇要研究一下他們住宅與城市溝渠的缺乏，他們的洗濯設備，他們的不齊備的服裝，以及沒有正當的洗衣作與破舊物件的無法消除，便知道，如果不是習慣如此，便要感覺永遠的不適了。所以除了不良食物與惡劣烹飪之外，這種不斷的疲乏與互相的刺激是要使得人們百病叢生，成爲殘廢的。

這種的生活一幕一幕地過去。我們很少觀察到在幾百年前做人，生活是怎樣地不同。吾人祇要幻想着過去的一切，便可以知道這樣的人類集居，對於身體靈魂是多麼的有害。很自然地，因爲身心對於這種存在狀態發生反感，結果就是憎恨，在斯惠夫脫（Swift）所作伽利華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711）一書中，我們便看到有一個生於十八世紀而絕頂聰明與易於感觸的人，深感當時的生活的不滿，如置身牢獄，無可發洩，故作爲吶喊。但是一個中世紀城市溝渠的氣

味比起二十世紀的報紙的仇恨氣味來那簡直是不算甚麼了。二十世紀的報紙是煽動怒火的工具。每天早晨一個人便可以由報紙中得來無數新鮮的疑慮，不良的消息與陰險的謠言。

憎恨，是一種易傳染的和可以阻止的腦筋的疾病，凡是哺乳動物的腦子，尤以社會哺乳動物的腦子，易於傳染。牠是失去理智的節制，牠是由很少的，不斷的刺激而來的。在成年的前後便會染到這種病。病太深者會侵害腦筋，寢成一種時時懷着敵意的痼疾。

憎恨的因子種了，便很難剷除。患者往往喜歡侵犯別人，醞釀怨毒，尋隙報復，而他還要美其名曰「正當的自傲性。」他反對別人的所為，嫉視別人的快樂。我們現在的教育多求避免這種病態的傳染，但是當時的報紙，卻反而力事鼓吹與煽動。我們現在務使精神與身體上同得到清潔與流通的空氣。如果把兩個時代的人相比較，現代的羣衆與荷加爾 (Hogarth) 或拉發耳 (Raphael) 所描寫的羣衆，彼此所不同的地方，並不單是衣冠整齊，發育完全，營養豐富，訓練良好的身體，與既無襤褸的衣服，又無殘廢的人的一種現象而已，最可使我們注意的，便是那一團坦白可念的神氣與面目，替代了不幸時期人們的沈思疑懼，凜凜然如防大敵的那種表情。也祇有這個普遍的病症

把人類歷史的一切包羅在內。

於是乎這橫貫中歐的七千萬偉大的德國腦子，竟不能找得治療的方法，而坐令牠的病症蔓延了。沒有人明白解除痛苦的方法是不懷仇恨，更沒有人思維到世界國家的舉世互助的思想。這種深惡痛嫉的仇視比較法人因畏生恨的心理尤甚。在這兩個互相敵視的國家裏，大同思想是牠們所不歡迎的，尤其是在德國。

一九三〇年的數年中，德國的敵愾時而緊張，時而弛緩，是爲一種潛意識的顧慮所限制着。雖然德國的敵視精神是非常地猛烈，但是她的軍備卻遠不如鄰國，她的希特勒黨人雖叫囂怒罵，而他們攻擊最烈的卻是波蘭，而不是法國。當他們怒氣緊張，無可遏制的時候，他們便祇能以虐待共產黨、非戰者、與知識階級們、及加重處治那爲西方文化策動者的猶太人來洩憤。自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以來，不特劫掠屠殺，而且公然的危及在德國的猶太人的生命。

華勃爾在他的政治心理的研究中曾說及世界的『仇視圖』(Hate Map)以各種深淺不同的顏色來象徵各國仇視深淺的程度。用英國方言的國家(除了愛爾蘭，她在昔是『仇恨的長

青島』(Island of Evergreen Malice)，而今日已成一個最愉快的避暑區域，以及西班牙語的地方，比較歐洲大陸的民族，仇恨之心似乎輕了許多。牠們沒有這樣稠密，牠們不為外患所侵凌，牠們比較上有廣闊的地方轉動，敵視的傳染病，並不這樣地劇烈。有二十年的期間，西班牙與西班牙南美屬地曾經維持一個比較自由與創造的腦筋。西班牙的貢獻，始自恩那苗奴 (Uranano) 與加釋 (O. Y. Gasset) 以至於一個很長的名單，都是創設新式世界國家的重要分子。

俄羅斯並沒有西班牙那樣富於創造力。她沒有這樣多的思想自由與有動力的作家。她沒有剩餘的精力去哲學化。她是激動的、預言的和獨斷的。她就是以這種的腦力訓練用在她那散漫的技術上的努力上面。但她又不是一個懷藏敵愾的國家。新俄羅斯是受着憎恨的教育，但她所仇視的是一個正在衰敗的敵人惡毒的帝國主義者。甚至在這種仇視之中，不無撓雜談諧的意思。當那惡毒的帝國主義者自然而地衰敗而成了鬼的時候，他把俄國人心中的恨苗也帶了走。憎恨的觀念，在俄人的性情中，祇是作曇花的一現，而不是一種痼疾。

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明白世界上重大的政治擾亂，在幣制的弊害以外的，就是這種傳染病

的人是很少的，至於所謂要廓除這種疾病，應有嚴厲的推翻摧毀一切的傳染的社會組織與經濟利益的必要一層，是更沒有人想着過。此時沿歐洲中東兩部的交錯的邊境，創痕是潰爛了，火焰是增高起來了。

在那些更騷亂的政治社會所常用的洩憤的方法是用挑釁式的示威引起暴動向外國代表的機關如使館與領事館施行攻擊，侮辱國旗、石像與其他標幟（在印度例如在聖地屠殺聖品或禁品如牛、豬等類），在茶樓酒館間的毆打、暗殺，向仇視國人的集會投擲炸彈爆竹，或在不宜於爆炸的地方如法庭、教堂等處施行轟炸，及槍擊守兵、偷越國境等等。沿亞得里亞海岸（Adriatic Coast）有一個挑釁最易的方法，便是侮辱意大利人對於石像與圖畫的尊敬的特質。

這個是近代纔發生的。在凡爾賽和會中，意國為她的聯盟者英、法所騙，不允將三國秘約中餌意加入戰爭的達爾馬提亞（Dalmatia）海岸地方如約令其佔有，其實這個地方，無論英、法、意都不能享有任何權利。意國的愛國者，對於此事英、法的背約，怨憤不息，而佔有這些地方的南斯拉夫人也無時不恐懼一個強力的併吞。關於這個紛辯的宣傳甚多。意方的最大理由便是在昔威尼



共和國實霸有這個海岸（羅馬是牠的自然承繼人），他們所持的證據便是，在這些地方內，城市的公衆建築物都有意大利創業者的標誌，尤其是威尼斯的石獅子。這是法西斯蒂的幻想：凡是威尼斯之獅做過窠，羅馬之鷹投過影的地方，都要歸於他們統治之下的！

雖然英、法、西、土以及其他解放的民族不以此事爲意，但是與這個問題有切身關係的人民便非常地痛恨，尤其是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民族，更爲激昂。對於年輕與興奮的斯拉夫人，這種石獅鷹像，這種古式的建築，都失去了牠們的美術與歷史的美感。他們認這些是可鄙厭的東西，似乎向他們挑戰，所以他們的反響便是塗污與毀壞牠們。

一九三二年時羅馬與巴爾格里（Belgrade）之間已經爲了這個問題發生許多意見，其後在一九三五與一九三七年又發生新的糾紛。這並不單是摧毀破壞的事情，因爲此時竟把這些具了先鋒使命象徵的獸像繪畫起來，而且繪成可以引人鄙厭的樣子。侮辱洩憤的也不祇限於這種先鋒的獸類。對於墨索里尼的相片，亦常有在上面畫些鬚鬚紅鼻及其他含有詆毀人格意味的描畫等。

這種煩惱的表示遍於各地。就我們現在看來，這些舉動是一種無理取鬧，有同兒戲的事情；但在當時，牠們卻可以闖出大禍來的。

讀者們試一幻想，在這種充滿了仇恨的地方生長的青年腦中作何感想；環着他們的，是永遠煩惱的禁制，時時想向壓迫者做一些譏笑怒罵的表情的心理，而末了便是可憐的奸謀與更可憐的侮辱。我們還可想像，那時他們持扶梯，攜印桶，眼看着警察們的退去，與摧毀了可憎物的勝利與奮的神情。或者這是那個人腦海中最高光榮的事情了。跟着我們便看見衝突、奔逃、槍聲、受傷、污穢的監牢、毆打與刑罰，以及羣衆的堅決繼續抵抗。更是司空見慣的，便是受傷與死亡，屍體伏臥道旁，爲人踐踏，或者擱在牆上被槍決，一直到屍體腐化，把那天賦的腦力消滅。這便是千千萬萬的充滿了憎恨的人們的歷史了。這些有爲的腦子，便像花兒開放在污濁的泥濘中。

近人查斯伯 (Otto Jaspers, 110八五——) 著有一本書叫做殘忍的自然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Cruelty) 的，很詳細地把二十世紀的殘忍事實描寫出來成爲一本富於恐怖性的讀物。幸而探究人類心靈中那種以可怕的痛苦與傷害等不幸事實來解救不可容忍的心中苦痛

的心理作用，還不是普通教育的必須部分。雖然，心理學家對於一切這些事實，是應該熟知的，否則他便不能完全了解我們這種複雜的心理；因為我們今日的世界實際上沒有這種有意的殘忍現象，乃使世界大戰及世界經濟恐慌時期的可怕的文獻，成爲心理學家研究的寶藏。吾人已經使讀者見到一些影子。如果他是**有幻想的**，便可以由這些事跡中，想像出無限的殘殺酷刑與放恣的強暴來。

古代的心理學家多認殘忍是屬於性的暴虐行爲的，但後此的權威卻並不作如是觀。殘忍是超乎性的範圍的，猶之憎恨是一種恐慌和敵愾的**中結**，是可以傳染的。所以當恐防破壞的心理超過了某限制點的時候，殘忍也認爲是一種反對抵抗自然發展的力量，因此人類使用了極度的頑固手段來使他有生命的東西屈服於自己意志之下。

這個解釋使我們明白何以個人資本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崩潰，以及整個世界的不安，失望和缺乏是隨着一個個殘忍的波浪而來的。在一九〇〇年時，一個異方的人在歐美遇見一個人，他一定以爲此人是很仁慈大量的。到了一九四〇年，他便很確切地說此人是**非常地惡毒的**。實在就

是同一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之下的反響而已。

在一九三〇年以至於一九四〇年之間會有整千整萬的自殺案件，是那些易於發生感觸的男女，他們不能再忍受生活的卑賤與殘酷，故以死爲脫離苦海的唯一出路。但到了一九八〇年復蘇的時期，便絕對少有虐待人類與畜類的事情發生。這並不是天性的移易；這是環境狀態的變遷，千百萬的人們曾經參加殺戮毒刑的，此時仍然生存着，而且是非常合理與良善地生存着。大多數的人們都把他們以前的罪惡行爲淡然忘之。希望重復回到人類的生活裏。那些瘋狂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 九 最後的戰雲（一九四〇—一九五〇）

歐洲的戰機，因日、美不能加以干涉，英國方聚精會神於印度的禍亂，以及南非的反抗，乃愈趨於迫切。

戰爭終於一九四〇年爆發了。戰爭的導火線是一個波蘭的遊客商人，一個波籍的猶太人，當

火車停在但澤的時候，他口中那裝置不適的牙牀，忽然使他感覺很不方便起來。他的牙牀似乎內陷太緊，爲了把牠重整，他不得不大張其口，用兩手來掙扎，又爲了向着其他的乘客來安置牙牀，未免不合禮，便把面部向着窗口來工作。他是一個有黑鬚鬚，高長鼻子的人，無疑地他的這種張口吐舌的樣子是很難看的。他便是作夢也不知道由他的雙手，把由蒲連尼（Pyrenees）到西比利亞的大戰解放出來啊！

使得他牙牀感覺不適的原因，是把一粒子核兒或者是一片果實碎夾進去了。但不幸得很，站在月臺上的一個青年國社黨員，認這個人的面部怪異表情，是對他的制服表示敵意。很多這種青年人是天生面嫩的。愛國的觀念燃燒着他的心。他會同了三個守衛人與兩個警察——像意國的法西斯蒂黨人一樣，這班少年英雄是不會單獨行動的——登車作着搜查的樣子。使情形更壞的，便是那個開罪的波蘭人不懂一句德國話，弄得一天風雲莫名其妙。兩個乘客走來幫他的忙，其他的人也走上來勸好勸歹，半推半送的把那幾個國社黨人趕下了火車。

那個爲首的青年人汗流浹背，氣急敗壞，當他看見那不可饒恕的猶太人仍然向着窗口張口

吐舌手指足劃的，正如火上加油怒不可遏，拔出了手鎗便把他打死。其他的利器同時如電一般射擊起來。這次的戰鬪等到司機人把火車開出了站纔算停息。這件事情引起了政治的糾紛，因為但澤警權的問題仍在紛辯之中，而國社黨人在但澤的月臺上是沒有法律上的權威的。

單就這次事件本身來說，本來可以解決，不至引起歐洲的戰爭。甚至那氣息奄奄的國際聯盟，以及毫無生氣的海牙法庭尚可以做一些事情；無論國聯或海牙法庭，都還可以處理這個案件，把一個波蘭的牙醫，認作犯罪的人，研訊處罰，為歐洲的替罪羊。但必須與此有關的列強能有善意而後可。而在當時卻沒有這種善意的表示。

八年來，德人總是處心積慮，謀爭波蘭走廊，而且對於重整德國的武裝，不論是公然的或秘密的，都在進行中。法、波兩國對於德國的軍備恢復，都是深存戒心，而兩國的軍事當局都急切地欲在德國未十分準備之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發制人。危機一次兩次的併發，而每次都不久便沈靜下去，現在是忍無可忍的時候了。局勢已到了最後的尖銳化。似乎戰爭是唯一的出路，歐洲也已準備把自己撕成碎片了。

這是互相仇視的世界內「武裝和平」的局勢所不可避免的最高峯。當是就有着一種不可抵抗的「不要等到人家太強盛，先發制人」(Strike now before they get too strong)的邏輯觀念。這個觀念是一九一四年英國準備立即作戰的動機。他們急於想在德國海軍力量尙未能與其相頡頏的時候，先施攻擊。所以他們打破了那個緊張的局面。「德國人是自取其禍的，」他們說。「今日勝於明日啊！」

現在德國又再次自取其禍了，波蘭便趕快抓着了這個機會。各國的軍政部大事忙碌，巴黎、倫敦、紐約的報紙爭相傳載暗殺那商人旅客的事跡，而且以訛傳訛惑人視聽，此時德、波的空軍偵察隊都在生死關頭上發生衝突。一九四〇年正月五日下午一時，商人旅客的牙林甫覺不安，而次日下午三時已有一架波蘭的飛機在天空中和三架敵機應戰，着火下墮於但澤境內，使拉夫亞斯城 (Rathaus) 爲之燃燒。

波蘭空軍向柏林作第一次的襲擊，繼着便是兩百架法國的飛機在德國的領空作大示威的巡行。德國人對於這種的巨量與急促的準備，非常地驚訝。他們不知道這是法國所爲。但他們不敢

迎空接戰以寡敵衆，所以法機遂退。在德、波邊界的戰爭卻繼續地應戰。

巴黎的當局，還不知他們的夙仇的不抵抗態度是失望抑或是放心。以空軍戰勝德國，是法人所深願，但是這些飛機，還須留來對付國內有加無已的內亂。一種不能決勝的戰爭——空戰的常事——或者會使國內發生嚴重的影響。

年來各國外交中樞，雖眼看着德國的重整軍備與戰爭的潛伏，但沒有人設法去撓阻牠。現在倫敦、華盛頓、馬德里 (Madrid)、日內瓦，都忽然地騷動起來。各國的大使公使交相往還，徵求意見。日內瓦就說：『阻遲牠，』雖然這個戰爭已經遲了二十年了。

『限止戰爭區域』是當時最高的呼聲。不獨中立國表示贊成，即法、德也甚願意。實際上，『限止戰爭區域』的意思，便是巴黎應向波蘭破約，而讓波蘭去向德、俄之間取得一個安排的法子。因為俄國在不聲不響中，已很快地把紅軍調動，便在這次的國際把戲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了。巴黎方面也有絕大的原因不欲與柏林太走極端。在新戰爭中第一個法人已經被殺了。他是在亞爾卑斯爲意國的偵巡所槍殺的。



正月七日的晚上，當波蘭的飛機在柏林投擲毒瓦斯炸彈之時，意人也在巴爾格里施行同樣的攻擊。同時羅馬更馳書各國以明意國此舉的用意。似乎是在這兩三天之內，南斯拉夫的衝突復起。供給怨恨恥辱的材料，法西斯蒂使者，未免太過張大其詞。正月七日那一天，意大利全人口都爲了斯拉夫人將墨索里尼的照片染了紅色。將威尼斯的獅子及羅馬的飛鷹作了各種輕浮侮辱的塗抹，奮然而起，憤怒而善於詞令的法西斯蒂青年在街頭巷尾之間，宣言抗議，聲淚俱下，認這種行爲是奇恥大辱，極力鼓吹戰爭。南斯拉夫的酒杯已經斟滿了。後世讀者追本窮源纔知道這隻酒杯是如何地爲法西斯蒂所注滿以爲進攻的藉口的。

意、波兩國軍隊一旦越境接觸，其他東歐各國不待有何藉口即大舉進攻。凡爾賽所組成的整個瘋狂的組織，渙散無存，戰雲捲起——可悲的、狂暴的、充滿了憎恨與恐怖的人類競爭，盲目的引到任何人們所不能預知的結果。在兩年的苦戰中，『限止戰爭區域』這個理論，使俄、法兩國不捲入戰爭漩渦，牠們成立了一個『條約』，法國不加入她的舊聯盟國作戰，俄國爲抵償起見，也不作反對他們的舉動。再則軍火的貿易，是毫無偏倚地買賣。這個條約用作外交上背信的證明，力量是

很薄弱的。但牠卻使德國西線兩年內沒有發生戰爭。意人不斷地向法的邊境放槍是不可解釋的，祇有靜以處之。法國的航空隊時時成羣地翱翔天空作示威的舉動，使她近鄰深感不安，但總說起來，這是一種壓抑的勢力，一方面可以寒敵人的膽，一方面可以息國內狂熱者的氣。

就外面看起來，這種限制戰爭的呼聲在一九四〇年所表示的熱忱尚不如一九一四年時來得高。所表示熱忱的，都是一班沒有經驗的中上階級青年，是屬於那些法西斯蒂、國社黨、學生、童子軍一類的人。他們奔走呼號，恐怖萬狀。沒有一國是樂於爲戰的。普通的兵士紛紛棄隊逃走，而且很難加以懲罰，因爲這種逃伍的心理蔓延甚廣，尤以東歐的農軍爲最，所以很難把這些逃兵加以槍決。有一旅軍隊開去羅慈（Polis）應戰時祇剩有三十九個軍官五十七個士兵。

由行軍開始，便注重「節省」，在戰爭開始，便感覺財政拮据。所以對於軍火的運用都是非常地限制節省。

實際的戰爭，不論機械方面科學方面都比較日本在中國的戰爭爲高。軍事當局有好的道路、汽車、鐵軌、運輸車輛、電器各種的槍械與及充分的空軍。在後方也有工作很好的化學與軍器的大

工廠。現在不是步兵的短兵相接，而是技術人員鬪智的時候了。由德國中原，把東普魯士用永遠死亡氣從中隔斷是爲任何東方戰爭的技術所不逮的。這是一個戰略上的愚點，而是技術上的一個成功點。

第一次向柏林的進攻是曾經計劃着用新式的器具，與最高的軍事科學的。這又是一個集中一擊的計劃，波蘭軍官對於此舉的決心，猶之乎德人於一九一四年大舉進攻巴黎一樣。不幸的便是，波蘭人在準備進攻之時，須事先徵求很多專門家的意見；隙漏甚多，所有軍事的祕密，使由法國、捷克、瑞士的軍械製造人，俄國以及國內的奸細所傳出，使這個計劃的大綱爲柏林方面所熟悉。波蘭向柏林所施行的毒氣攻擊，的確是非常地可怕，而且大大地損害，但是波蘭的大隊坦克車，大批鎗礮，以及汽車轉運的隊伍，都在距德境六十哩的地方爲毒氣網——大多數是路易絲蒂與藍十字毒氣——所阻止而不得前進。有一隊騎兵，侵入北部，在柏林與海口之間，慘敗於電網毒氣及機槍之中；死傷及被俘的人數差不多有四萬之衆。加以波蘭軍隊中製造防毒面罩也有了錯誤。所以有許多隊的兵士都受了人家的游說，以爲他們是被賣了的。波蘭的主力軍，永未與德國軍隊正式

接戰，祇有憑她的飛機的力量，纔把軍隊由反攻中拯救出來。

波蘭的軍隊重整隊伍，依照次要計劃，以備不虞，在斯德丁（Stettin）與波希米亞之間的防線上以重兵駐守，而於後方西利西亞地方的防務，爲有系統的布置。每天晚上在柏林與華沙的天空中便有劇烈的戰爭。這樣戰爭是不分勝負的。波蘭的飛機以量勝，德國的飛機以功效運用勝。但是波蘭有多量的航空魚雷——可以去相距二百哩的地方投擲炸彈而回，速度力量都較德方爲勝。波希米亞，像法國一樣，已經動員，但不立即參加作戰。捷克的軍隊也在山上操練，或排列於匈牙利的前線，相機而動。奧大利也是非常地興奮，但仍守中立。

南方的戰爭，意大利的景象甚好，過了幾個星期都和波蘭的戰爭沒有正式的關係。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也向南斯拉夫宣戰，意大利的空軍黑沈沈地遮蓋了半天，在哥羅西亞（Croatia）與塞爾維亞（Serbia）的城市，是很少可以避免擊炸的。意海軍又擬佔領海口和達爾馬提亞海岸，但是她的進攻斯拉窩尼亞（Slavonia）和哥羅西亞的軍隊並不如期到達。過了六星期始能打開了一條路到紮格刺布（Zagreb）。

此地山路崎嶇，毒瓦斯與機械戰具都失其效用；而且沒有中心點可以決戰；此地居民是久習於山上戰爭。這些壯健的農民並不關懷於城市居民被炸與否。他們永遠不應戰，他們永遠不作團體的進攻，但是他們的子彈卻日夜飛向意國軍營中來。守衛者往來於戰場與前線之間，軍火是由羅馬尼亞方面輸入的，羅馬尼亞雖然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邊境上遭紅軍的虎視，內部復有農民的暴動，但在很不明晰，充分危險，間或有利益的狀況下，居然能夠站在戰爭的圈子外。匈牙利人橫過南斯拉夫的邊境，威脅巴爾格里，但他們的主力軍與捷克的軍隊互相對峙着，靜候事態的進展。

這一年年底，戰爭暫停。布拉格（Prague）、倫敦、巴黎三方面努力於停戰運動，暫時得到成功。德國與南斯拉夫的進攻者在他們的敵人境內停留着，但是中立區已經劃分了，而且停止敵對行為。最後的努力，便是想把和議調解來緩和這兩個大衝突。德、波兩方面對於繼續作戰都是三心兩意，現在波人的進展，已經被阻，意人希望把達爾馬提亞作為己有，不欲再作征戰。一時間，似乎文明的精神又有了覺悟，且似乎發為疑問，「何以吾人會有這種遭遇呢？」

英國內閣想着這是在維維（Vevay）地方召集會議修訂凡爾賽和約的好機會。古柏（Duff Cooper）、霍爾卑利沙（Hore-Belishu）、威根生（Ellen Wilkinson）及裘吉爾（Randolph Churchill）等人的和平言論爲全歐所響應，爲美國方面加魯蘇（Benito Caruso）與拉門德（Corliss Lamont）所極力贊成。教王、大主教、教會團體、瑞士的總統以及那雄才大略的邊尼斯（Benes）總統都雲集附和。法國自一九三四—三五年的社會糾紛發生後，也漸漸地和平起來，她的能幹的發言人魯錫里（Louchere）與沙瓦納（Chavonne）是當時和平的代表。我們在這兒，又可以看見同一鼓動福特與威爾遜的動機，在人類的幻想中，再來一次世界和平的閃爍。此次比較一九一六—一七年的呼聲更爲圓滿清晰。但是牠的效用卻不見有何進步。會議把停戰期延長，以迄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但不能解決甚麼問題。軍事當局，漸感不耐。懷了一個陰險的破壞心，在將有收穫之前，又把戰爭繼續下去。

會議的失敗，便是缺乏了新式國家的建設思想。牠不過又是一個外交人員的集合體，謀獲和平，而實際上堅持了傳統的主權國家觀念，這便是使戰爭復活的因子。他們的和平思想，最多也不

過想做成一個『均勢』的局面，來互相牽制。這種均勢是隨時可以搖動的。不計人民與知識分子的思想何若，這些軍事專家是決心使戰爭繼續下去的。『德人所受的挫折尙未足，』『意人尙握着南斯拉夫未放，』這便是法國與斯干狄那維亞的軍械商人與報紙所鼓吹煽動的材料。

英、美兩國自始便擬站在戰爭漩渦之外的，感覺得牠們由作戰各國中獲得很大的出口利潤。於是牠們的大鋼鐵廠便日夜加緊工作，製造殺人利器，像一隻沒有牙的老虎，把牠一分剩餘的精力，抖振起來去做牠唯一的吃人的工作！鋼鐵的用途，現在不是用來做鐵道、橋梁、屋宇，而是用來製殺人利器的了。有誰計及民不聊生，苦於征役的呢？唯一希望和平的國家便是捷克與奧大利，牠們介於兩個作戰團體之中，兩面都有敵人。總說一句，在維維會議中，人類希望和平的意志，仍然是很複雜與無實力的。

在波屬烏克蘭的戰爭也同時再起，那裏的農民發生暴動得着蘇維埃的軍官與軍器作後盾，在突然地向波蘭防線進攻之中，想把德國的土地由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來。德人在停戰時期日夜盡力工作以應付空戰；製造新的快的飛機與機關槍。幾個星期內的空中戰爭，其猛烈處是空前

絕後的。

漸漸地德人已能有充分的轟炸機與毒瓦斯作戰。羅茲 (Lodz) 與華沙的居民，鶴唳風聲，驚怖萬狀，紛紛退卻，所以把波蘭的防線衝破，西利西亞的交通得以恢復，戰爭的範圍更加擴張起來。立陶宛很明顯地，受了俄人的慫恿，奪取她的舊城威爾那 (Wilna)，奧大利也加入南北戰爭爲德、意兩國的同盟。德國聲明與奧國聯合。其他的歐洲國家也很快的接踵而參加戰爭。匈牙利亦向捷克進攻並不宣布爲收復她的法定疆界而戰的理由，而且引起羅馬尼亞的軍隊去作攻擊，與之對抗。在這種情形之下，俄國便宣言她絕對不能再和法國諒解，於是便進兵勒謨堡 (Lemberg)。馬其頓已成了一個大戰場，一村與他村相戰，保加利亞加入「南斯拉夫」 (South Slav) 聯盟，進攻阿爾巴尼亞，希臘也由意大利手中奪取羅德斯 (Rhodes)。

法國墨守她的傳統的「安全」政策，聯甲倒乙以維持均勢。她的商人與百姓本來很願意在嚴密防守的邊界後面與英、美平分中立與販賣軍火的利潤的，但是她卻爲條約所深深地束縛着了。在倫敦、華盛頓、日內瓦，聚謀避免戰爭方法一無成功之後，法國便於一九四三年向中歐聯盟國



宣戰。

在表面上看來，這次的戰爭與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甚為相像。牠似乎是一種去修改或確定凡爾賽的安排之嘗試。同是向中歐作戰。但是現在意國卻與條頓國家作密切的聯盟；比利士，因為絕端的工業凋敝，不能參戰，英國是站在超然的地位，所以在往昔的聯盟方面，法國不特得不到援助，而且還須幫助其他由『走廊』到黑海及巴爾幹的各國，是她費盡了精力來組織成的一個反德的聯盟 (Anti-German Alliance)。

俄國是中歐列強中一個不可靠的同盟國，她並不是和她們合作；她祇是幫助在波蘭東部與比薩拉比亞的新蘇維埃共和國。在這裏紅軍停止不前了。那世界革命的熱忱已經由俄人的幻想中消失。馬克斯主義已經俄國化了，牠怕廣泛地收羅西方的信徒。加李寧 (Krem lin) 對於集中於斯拉夫的同族，已經感覺滿足，不想再向前進了。日、中、美三國則各專注於她們內部的社會困難狀況，並不加入戰團。

一個膚淺的學生，一定以為這種的事實不過是將主權國家重新安排一過。但實際上，對抗的

勢力是絕對不相同的。法國雖有內部的社會不安，但仍是一個十九世紀式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着一個民主式的國會和一個週轉不靈的金融與工業制度。除了鼓吹訓導着愛國的熱情之外，她的青年人的智力，是沒有組織的。她的同盟國是農業國是屬於君主或屬於國會制度的國家，而且是比較舊式的。但是中歐的列強都是建設在新的法西斯蒂的制度上，組織較為究密，精神較為有朝氣，是前進的國家。

除了法西斯蒂的絕端國家主義的重要點以外，這種由自行委任自行訓練的統治是一個向新式國家組織的特殊階段。這些法西斯蒂國家的自趨沒落，是因為牠們的淺狹與情感的心理，牠們不能打破傳統的觀念；牠們和我們現在的教育與統治制度沒有相連的地方；但是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時候，卻沒有這種的組織，牠的令人注目處，和俄國的共產黨很相像，是一個真的向民主制度前進的組織。在溷亂之中，這些為我們今日社會組織的基礎的有組織的『青年的專一』（Devotion of the young），已經在中歐國家播下種子了。那個經過訓練然後參政的思想，已經在新時代的腦筋上刻印着。

在未有最可靠的組織出現之前，這種的核心，當然要受戲劇化的墨索里尼與神經質的希特勒的所運用。愛國是代表國家的唯一法子。但當這些集團在戰禍之中漸歸散渙之後，牠的思想仍然存在，這種為比較偉大的目的而協力的思想，漸漸地蓬勃起來。在所有的法西斯蒂的國家內的青年，都是富於感應力的了。

新舊戰爭的不同，就中歐各國而論，不獨不是民主派的羣衆的戰爭，而且戰爭的範圍與性質也是不同。我們已將新舊兩種戰爭不同的特點舉出。在作戰國彼此的邊境混雜不分的情形上，更足以見其不同的地方。當戰爭開始的時候，德、波之間的確有前線的區分，但一九四三年之後，便沒有前線，沒有大的目的，沒有猛烈摧毀的中心觀念了。

波蘭人在退卻於波森 (Posen) 以前，原試用永遠死亡氣橫過東勃蘭登堡 (East Brandenburg) 的，但因他們潰敗得太速，所以受毒的祇是三個很小範圍沒有軍事險要的地方。一九四三年後，便以空中戰爭為主體，而且毒瓦斯的運用，空中的襲擊，都變本加厲，奪取組織與佔據有利的地位，都不是用進攻而是借力於空中的襲擊。在地中海也有很劇烈的海戰去斷絕北非與法國間

的援軍與供給，但在大西洋方面的法國交通卻並沒有受到挫折。

空中的戰爭是沒有大戰的，因為牠不像陸海之間有險要的地方可攻可守，所以到今日我們尚不能決定誰是操着空軍勝利的牛耳。牠是一種襲擊與循環報復的戰爭，並沒有大決勝負的大戰。一大隊德國的步兵向波森進攻的，爲毒瓦斯與灣泥所中阻，而侵入意國的法軍，也不能超越過吐林（Turin）的界線。

使敵人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要素完全告竭，便是得勝的唯一的方法。受茶毒的人民，就一再被鞭策而支撐這個「磨折的戰爭」，各處的歐洲方言都有這麼一句說話「誰能够比較其他的人堅持得半點鐘的，便獲勝利。」因爲軍事的不能決勝負，對於社會秩序的攻擊，也日見增加。田禾與森林都被焚燬，防禦的地方被擊粉碎，低原被水淹沒，煤氣與水的供給都被摧毀。飛機師瞄準了人羣來投擲炸彈。這種殘忍狀態，正和獾鼠搜逐野兔一樣。

雖然歐洲經過十年的金融恐慌，工業蕭條，但仍舊有着大量的機器原料，到處都有大規模的工廠，具有很堅固的空防設備的。而且，所有的主要交戰國都有通行無阻的邊陲可以運入原料品，

他們的政府還能用捐稅形式由人民的身上榨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出來償付這些輸入品的。貨物在黑夜之中越境，或在晦暗無燈的海口上岸。每一個身體健全的成年人如不參加作戰，便被迫去建築炸彈防穴以及改建屋宇以防毒瓦斯與強烈的爆藥的攻擊。大多數是黑夜裏的工作。退縮不前的將受懲罰。讀者們可以看見當時一張可怕的圖畫叫做『最後的安全』（Security at Last）的，畫着一隊帶了鎖鍊的、面容枯槁、鶉衣百結的法人，在皮鞭笞打之下，在隧道中工作。稍遠一點，又畫着一個不勝苦役，暈倒於地的人正在施救，其他不能拯救的，就死在那兒沒人理會。

關於一九四〇年以後數年的戰爭，單就西線的戰事而言，牠的紀載，實及不上世界大戰時個人經驗紀載的豐富。空中襲擊似乎非常地可怕，比較大戰時的情形殘暴得多。先是一陣警告的尖銳的哨聲，繼着便是人民的奔走踐踏，驚惶失措的走避聲，最終便是被害者的慘痛情形。

關於這種的慘死，已有前述。每一次避難所的組織與毒瓦斯的面具都沒有效用。有許多地方，空防氣防的設備，祇是一種虛設，以為安定人民，保全鬪志的工具，其實是沒有多大效力的。當時的報紙絕對不敢披露這種空中襲擊的消息。甚至在美國，詳細的紀載也要被認為「反對徵兵的非

戰宣傳，』而受禁止的。

我們所得的一鱗鴻爪，便是當時有一次空中襲擊之後，有署名沁克雷（Sinclair）的人從柏林來的一封信，後人推想一定是當時的小說家沁克雷·路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60）的所作，裏頭有一段說：

『我們走下 Unter den Linden 沿 Siegeo Allee 而行，只見人的身體到處橫着，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小孩也有。並不是分散於各處，而是堆積起來，似乎他們最後的掙扎是想爬近來互相幫助似的。臨死時走近一堆，似乎是這種毒瓦斯致死者的特徵。一定心理上起了一種甚麼變化，每一個死者都是縮作一團，口吐鮮血，斑斑血點，狀殊可怖。而二十四小時之前，此等均是有生命的人啊！屍體立刻混亂縱橫。進口之門幾乎不能通過……』

由此我們對於一世紀半以前大城市內和平人民如何死亡的情形可見一斑。

關於戰爭的個人紀載也是非常地缺乏。以後數十年間從事於追述者也很少，原因便是這個時期沒有像大戰時的文人濟濟，而且對於週圍一切所發生的事實，也不感覺有何濃厚的興趣，所

以關於逃伍、放棄、酗酒、姦淫以及各種暴戾與陰險的事情，都沒有紀載下來。全世界人類的感應力都比較三十年前薄弱；他們雖然所受的痛苦較大，但是他們的感覺力卻較弱了。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間，許多英、德的軍士們逐日紀載日記，這個可使我們看出一種特有的個性還對於事物起反應，不是沈鬱的宿命主義，和一九四〇年以後的士兵們的心理祇充滿了原始人類的喜怒哀情感者大有不同。

在歷史文件中有一本日記的殘片是一個日本的軍官寫的，他在由武昌退卻之中，喪失了生命。因為缺乏歐洲方面的材料，所以把這片段的雪泥鴻爪引證出來，以見當時作戰者的心理如何。這本日記並不是很明顯的文件。這個軍官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非常崇拜國聯的，他的紀載大都是用暗碼來對他的上級軍官作敵對的抨擊，而所紀載的又都是他的日常生活和如何與疫癘病症相搏戰的斷片寫真。他似乎帶了一隊人，記着他們的糧食，計着他們死亡與失蹤的數目。還有數目字表示他的軍火的遞減。他在被殺之前，已經感覺着饑餓之苦了。當他的身體漸弱，腦力疲乏，他不能再運用暗碼作記，於是改用不純熟的英文，其後竟全書日文。最後的一段是

一首未完成的舊體詩，大意如下：

「春明開遍了櫻花，

富士山頭美女如麻，

有寶藏的可愛的島國啊！

我此生便和你永別了嗎……」

此詩不得完成，大約是死神先把他抓去了的緣故。他和他所帶的那一隊兵，一定是在開封附近爲追兵所襲，全軍覆沒的。

在一九一四——一八年時，出征的人，覺得雖然離別鄉井，從事遠征，如果命不該絕，仍可於罷戰時歸里，重慶安閒快樂的生活，這種出征者的心理，在這次戰爭的紀載中，我們是看不見了。在當時的心情，是非常地勇敢與溫柔的。但在後此的戰爭中，赴戰的人，都覺得他們是有去無歸。他們知道他們是向愁苦的道上走，而所留給他的家人的只是愁苦。他們的戰爭不是出征，而是一個永遠的轉變。關於航空人員的紀載尤少。他們間或述及戰爭，但對於在他們炸彈下血肉橫飛的生靈所受



的痛苦，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很多這些青年的航空人員尚能够生還，其後於一九六五年復在新式國家空海管理部之下服務。雖然他們之中有不少好的紀載，但都沒有甚麼實用的。歷史家使不能不從各方面搜尋當時千百萬飽經荼毒的生靈的事迹以完成他的著作。對於這種痛苦感情的煙消雲散，不留痕迹，歷史家看來，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悲的事情哩！

一九四五年之後，到處顯現着精疲力竭的象徵。人類已經墮入失望的深淵之中，甚至連抵抗的精神都消磨淨盡了。他們餓着肚皮躺在牀上，穴中，讓炸彈來轟炸。祇有毒瓦斯尚能够使他們發生恐怖。滿道上都是看見受苦的人們咳嗽吐涎。追奔逐北，爭先恐後地逃避於防毒地穴之下。一九四二年後特別增加人們苦痛的流行性感冒，一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又有霍亂大肆其虐。這些瘟疫，在當時雖認為非常嚴重，但其實不過為後來『微菌襲擊』(Raid of the Germs)的一個先鋒而已，這是瓦解人類的一個準備，似乎是試驗一下，到底人類的抵抗組織是如何的！

除了空中戰爭，英國與北歐的各中立國所受的禍害，幾乎和實地參戰各國一樣。牠們把軍器輸流到歐洲來，所得的祇是收不回的債務。英國的出口貨，向來是世界自由貿易的先鋒與大同思

想的倡導的，此時已經消沈下去，喪失了她原有的重要位置；以前的債權者一方面不能追繳債務，一方面又不能支付她的大量人口的糧食的所費。她往昔的衛生狀況，因為百端的掙節，竟弄得非常穢雜起來。在那個不佳的天氣中，房屋由擁擠而至於可怖的情形。當她方掙扎於饑荒及社會混亂之中，霍亂也乘機而入，竟使她的技術高明的用機器的軍隊與她習於秩序與服從的人民，也因此手足無措。自從中世紀黑死病之後，英倫三島是從來未遭過這樣的癘疫的。人們都以爲癘疫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呢！但是霍亂也祇不過爲以後十年間的大疫的一個媒介而已！

漸漸地反抗與叛亂的精神也分播全歐。那個曾經使一九一八年終止世界大戰的厭戰求和的心情，此時又重復湧現。但是現在的戰爭，並不再是步兵的事情，羣衆的叛亂；像一九一七年使法國的反攻不得逞，使俄國的脫離戰爭，使德人的崩潰的一切勢力，現在都失去了牠們的力量。現在沒有這樣的受了衝激訓練與破壞動機的羣衆。所有的權力已經爲一個特別的團體所操縱，就是，已入於航空人員與戰爭技術人員的掌握之中。藉了小炸彈、機關槍、比較淺量的毒瓦斯，他們可以制止和防禦羣衆的集會和暴亂，而且可以把像十八世紀在街衢中滿佈戰壘與政府爲敵的叛亂

地方平靖。

甚至軍器工廠中的罷工也失去了以前的效力，因為加增生產的力量，已經把不熟練的工人數目大加淘汰。同是因為這個理由，那個階級戰爭的共產主義，雖然佔據了歐洲十分之九的農工的思想，但是在奪取管理權的事實上，卻感覺有許多想不到的障礙。牠不能把俄國的社會革命重演一過，因為新的環境是完全不相同的。布爾什維克的得到成功，是緣於俄國的落後，及缺乏技術人才。在歐洲的中西兩部人民的不靖與反抗是可以發生很大的靜的抵抗與地方的革命運動的，但是與他們相對立的卻是有組織的飛機師、機械員、技術員、科學工作人員等等；這些人已經取法蘇俄，知道由黨的政客領導下的無產階的趨向與計劃是甚麼的。每當他們想及他們的政府的時候，他們已經向一種新穎與強有力的方式去着想，而這班科學與技術人員心目中的政府制度，卻並不是一個民主的共產主義。

雖然如此，藉了俄國方面共產黨的協助，人類反對新戰爭的延長，便由共產黨的暴動方式表現出來。在一九四七年中，在馬賽 (Marseilles)、聖德田 (St. Etienne)、巴黎、巴塞羅納 (Barcelona)

米蘭(Milan)、那不勒斯(Naples)、漢堡(Hamburg)、羅茲(Lodz)及格拉斯哥(Glasgow)之間都有武裝的暴動，很足以維持地方蘇維埃由一個星期至於數月之久。漢堡與格拉斯哥的蘇維埃組織最爲完善，維持的日子也最長，其後經過相當的流血纔失敗的。到處都有這種的事情發生。各國政府正式停止戰爭的動機，也是懼怕一個普遍的社會革命。物質組織，日就崩潰，技術人員的行爲，漸形不定，無產階級的攻擊，漸漸地集中於股票經紀人、戰爭製造者、金融鉅子與世襲的統治者身上來了。

經過三年之久，纔能够使戰爭終止。一九四七年時倫敦會議曾經仿照凡爾賽條約的方式，盡力地去謀一個穩固的解決，但是政客與外交家都不能開誠相見。對於這班人，保存面子，是比較拯救生命尤爲重要的，所以又讓戰爭於一九四八年繼續下去。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布拉格(Prague)地方，邊尼斯總統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做到了，那便是使此次的戰爭終止。他不用條約，而發明一個新的名詞叫做「遏止對敵行爲」(Suspension of hostilities)。每一國，都保留了她在現在所佔據的土地，在召集一個會議的時間內，彼此

不能再作戰爭。但是流行性感冒、霍亂、熱症、經濟生活的退化衰弱，與人類關係的新發展，都使這個會議不能永久維持。而邊尼斯這個「遏止對敵行爲」的提議，卻成了永久性的，牠一直維持到現在。

## 十 微菌的襲擊

關於癘疫的紀載，其缺乏處與其他戰爭的紀載正復相同。所有的日記、函信與描寫的文字都是不適合的；似乎人類的外務太多，腦中沒有剩餘的精力。像微生物是在仿倣外交機關，要在人類擾攘之中，尋找機會以恢復其早已失去的帝國。

這種的攻擊是沒有經過宣戰便雷厲風行了。第一次的進攻是各種的流行症、大熱症，都是易於傳染，而在戰爭情形之下是很難禁制的。作戰各國的人民因為食物不豐富與衛生狀況的退步，身體已甚形孱弱，所以傳染的迅速，更爲可怕。死於癘疫的人，不下數百萬，這樣使得原來生命力已低落的民衆越趨衰敗。普遍的生活力低降，比較實際的死亡還要利害。霍亂與鼠疫接踵而至，五年

之後，最可怖的時期方似乎過去，繼着便是斑點熱症的攻擊來了。

這種來歷不明的病症，從前是屬於被捕的狒狒的病，似乎突然變得能適應人體而生存；很像人體之中已經有了一種媒介，使其易於攻擊似的。或者以前的癘疫把人體的血液中的抵抗的原質已經變動了。對於這些，吾人都不能瞭然，原因便是當時的醫士與生物學家即使有暇作觀察，也無暇把所得結果紀錄下來。而且當時科學的出版物已經完全停止了。

這種斑點熱症的發源地，是在倫敦動物園附近，散播得非常地迅速。牠使面部與皮膚變色，發生劇烈的熱度，週身皮膚痛癢，精神極度不安，身不由主，往來走動不已。不久體力斃喪，受害者便倒斃。這種熱症，並不單是由飲水中傳染得來，由病人的瘡痂也會傳染。風、水與被害者把牠傳播到各處去。差不多一半的人類是可以被侵害，照我們所知，凡可以被侵害的人都傳染着牠，凡傳染牠的，一定死亡。

這樣，那個遍於世界的癘疫便從一九五五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凡延長十八個月，到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這個無情的卻有殺菌力的冬天，纔把殘餘的人類拯救出來。這種熱症，向未

有有效的醫治方法。牠橫掃過全世界，但是來無蹤去無跡的。到今日仍是醫學界中一個不可解的謎。甚至在生存的狍狍的身上也找不出一絲一毫的遺跡，這樣使到培養微菌和試驗工作都無從下手。牠降臨，牠毀壞，但是牠似乎爲牠自己所生的一種反抗質而至於滅亡。或者那個真的疫症並非斑點熱症，祇是發生一種可以感染這種熱症的狀況。這種的受侵襲性是在一八九〇年後戰爭期中不聲不響地散播於全世界的。那個真的癘疫並不是斑點熱症本身，而是一種孱弱的總收穫。

歷史和個人的記憶都是一樣地把不愉快的事情省略。有一句很不通的俚語便是沒有歷史的國家是最快樂的。但是事實上卻恰恰相反，一種足以成爲歷史的材料，只是安全與繁榮的局面所留下的。我們知道埃及最盛大時期的社會生活狀況；我們知道亞西利亞（Assyria）的偉大與戰功；亞古德（Ajanta）與中亞細亞的宮庭生活；但是戰禍所留的遺跡，不過是一堆劫灰，而癘疫之害幾爲記載的所不及書。笛福（Defoe，一六五九—一七三一）曾追述一六六五年倫敦的大疫，但讀者務須明白這種的紀載是事後搜尋斷簡零篇所成，作者並未身歷其境，祇憑想像而構成的。拉斐爾（Raphael）所畫的羅馬的大疫一畫，亦同是追溯想像之筆。歷史上的大疫往往殺人如麻，

而去無蹤跡。然與歷史有關的，祇是繼續下去的社會與經濟的混亂情形而已。已往不諫，來者可追，這便是作史者所取的態度了。

如花般茂盛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時代，曾留給我們許多很豐富的紀載，這些紀載所講到的人，是那些對於人類的恐怖經驗，除了得之傳聞以外，一無所知的人。這類的小說、信件、日記、傳記、圖畫真是汗牛充棟。但是關於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間人類所經的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的情形，卻找不到一本書、一張圖畫說及牠的。當時所寫的，又都被認為傳染病而被毀滅了。祇可以留給後代的人們如笛福與史梯芬·克朗納 (Stephen Crane) 等去憑虛幻想罷。

有些如凱勃勒 (Cable)、諾達司 (Nath Dass)、波得司哥 (Bodasco)、馬丁尼 (Martini) 等小說的描寫似乎是很可靠的。這些小說是描寫當時種種變狀，不但是鄉村，就是城鎮，也是除了死去的男人女人以外，沒有生人；這些死人，都是暴屍橫臥，為成羣的餓犬飢貓所食；在印度是老虎，在非洲是獅子，往來於荒涼的街巷，在巴西整個地方的死人都是為野豬所嚼，使其生殖大繁。鼠類成羣來去，甚至對於不受侵害的地方也加以恫嚇。



還有一件可怖的事情，便是被傳染者的到處遊蕩，絕對不能使他停留在牀褥之間，醫院之內，似乎他非是遊蕩不可的。無恐怖傳染的居民看見這些臨死的遊蕩者走近了，便加以槍殺，無數的這些受傳染的遊蕩者是死於此。這種慘酷的自衛方法，我們聽了真是膽寒。這種殘忍的自衛方法，和在一九一二年衝着冰山的鐵塔尼（Titanic）大船中的旅客，其已登救生船者，推拒溺水而攀援求救的男女那種自衛方法，沒有什麼兩樣。在這種無告與混亂的狀況下，人類已失去社會的感覺。那些抵抗傳染的人，到了生死的關頭，對於其他的患病污濁的人，不禁發生一種厭惡與憎恨之心。祇有那些醫生、軍士、牧師與警察們是稍為勉強遵守秩序的。大多數的人都是橫衝直撞。就可查考的證據來看女人的行為比較男人為善，但有些女人加入劫搶的，也是非常地可怕。

這個夢囈便這樣地自來自去。

到了一九五七年正月，人們便重復回到荒蕪的城市中來，走入空無居人的屋宇，街上堆滿了白骨或穿好衣服的骷髏，他們尚不能明白天降的鞠殃，已經過去，而開展在他們前面的，尙是生命的動力啊！

斑點熱症已經代替了毒瓦斯戰爭，牠摧殘了世界上人口的一半！

十一 一九六〇年的歐洲

凡欲進一步了解歷史的人，對於在歐洲盛大時期所建立的帝國與民族的國家的泯滅界線，失去其個別的文化與傳統的觀念，以及把各處志士的努力和忠誠的分水線不再分開的一切步驟，殊有詳細研究之必要。一九三三年這種制度，尙存空殼，一九六〇年便不復存在。牠粉碎了，牠崩潰了；牠的形式已經溶化而消滅了。

爲普通的教育起見，我們可以不必贅述當時的人格者與事件的詳情，有如我們忽略大戰時的詳細過程，拿破崙的個別武功。又如羅馬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於一七七六及一七八八年間出版（作者席朋（Gibbon），刪去拜占庭的千年王宮生活一樣。這種的歷史，是專供研究名人小傳之用的，尤其是當人們讀厭了純粹的浪漫小說，而想去轉換一種風味的時候。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去明白那些推動人事糾紛的大勢力。

人事的進展是不絕地增加的，羅馬制度的崩潰與二十世紀私有資本主義的崩潰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後者的瓦解的神速。第二個不同的地方便是對於羣衆的事情，較爲生動明顯。這兩次人類的慘淡時期都是緣於金融的破產，而這個禍源又是因爲金融的法律與實施，並不按照人類的所需，以及政治與教育制度的落伍，使社會上缺少正當的指導。但羅馬制度的分崩是按部就班，慢慢地演進的，而這次新的瓦解，卻如迅雷那樣迅速，瞬時即傳遍全球，而所召的思想與反動，也較前者爲大。所以兩者是不可以作平行的比較的。自羅馬帝國崩潰，以紀元後二百年之大瘟疫爲厲階，直到十三四世紀時，纔恢復工商各業，重整文化，爲期歷有千年之久，而自一九一四年德人進攻比利士起到二〇一〇年在航空獨裁統治之下恢復物質文明，爲期不過百年。

就心理方面說，後者是比較有連絡性的。第一次的世界崩潰，經過許多朝代，使後人茫然不知前人的事實，但第二次的急速崩潰，是不出一個壽命長的人的一生之外的。在一九二四及一九二八年間的青年男女，到了一九六〇不過祇到中年，腦中尙保存了昔年繁榮安全的景象。很多在經濟恐慌時代的兒童，後來在第一次的國際警察以及空海警察的事業上，非常努力地參加服務。把

一個整個的事實抓住，是比較易於了解明晰的。羅馬帝國的人民，有誰可以知道當時進行的事實，到是一個疑問哩。

雖然如此，兩者也自有其相類似的地方，如剷除舊思想，泯滅國界線，打破傳統觀念，停付戰債，摧毀宗教與教育機關，使特殊有利的階級趨於沒落，使不法之事滋生，與破除一切的幻想等等。兩者都是剷除一個破產的文明而準備一個嚴格的改革。

現在且讓我們把一九六〇年的民衆大勢予以分析一下。由所經過的事迹看來，在這世紀的中葉，情形已經有很大的變動。但當時是否已經表示得很明顯，卻是一個疑問。向那個目標趨走的大動力是到處一樣的，至於各別的特點，也會因為地理上、種族上與傳統上的環境不同，因而互異，各處的解釋，更不能一致。

我們認歐洲盛大時期的事實爲一種畸形的生長，爲政治文化的不健全所生的經濟的過度膨脹。人類社會的精力大加，牠的出路，一半是加增巨量的人口（自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雖有大批移民，歐洲人口的增進是由一千八百萬到四千二百萬），一半是從事於龐大的戰爭，而極

少注意於個人生活的豐富與便利。但據我們上面所說過的，保守的勢力與抵抗的精神深藏在債權人與法律制度上的，都可以防止新力量的發展。再次，金融與企業的不適宜的組織，使各事都發生窒礙與停頓起來。

十九世紀繁榮時代的金融與信用的組織比較羅馬時代的，大有區別，但牠的歷史卻非常相似。先是大量的擴張，與私人財產的增加，繼着便是摧殘的苛稅。歷史是循環式的。歐洲的制度，步了羅馬制度的後塵，把牠自己的精力濫用了而至於精疲力竭，頻於絕境。同是盲目地浪費，而後者且有科學的便利來幫助牠。很快地把牠的財信用完，幾十年之後便負了一身的債務了。最高的浪費時期是介於一九一四與一九五〇年之間。後此牠的速度便沒有這樣厲害了。

就是從破壞的觀點上說，這個新戰爭也是失敗了。當牠開始的時候，便爾瓦解。牠沒有殺戮到牠力量所能殺戮的人數。把此次歐洲戰爭在戰場上所喪失的人數，拿來和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戰殤相比較，不過四分之一。而此次的戰爭，卻是人類空前的科學戰爭呢！在亞洲方面的戰事，破壞性較大，因為殺人較多，然而牠的戰殤，也只在九百萬人以下，而其中五百萬是喪失於一九三八

年日本的最後一擊，中國中部的相持不下，國民黨在漢口以西的死戰，以及日兵的總退卻。

人類所想像的恐怖，並不照樣實現。他不能把戰爭提高到機械的水平線以上。在此兩大戰爭之後，社會與政治的混亂狀況，雖是比較一九一七—一八年時爲甚，但戰爭祇是牠的楔子而不是牠的原因。這個新戰爭，據預言家所說，終局必是科學的屠殺人類，但竟造成了政治的混亂，債務的欠贖，借款的中擱，機器的拆毀，反亂，野戰，盜賊充斥，普通的饑饉與大疫。毒瓦斯與空中戰爭已由人類的經驗中消失，人們受摧殘的，祇是恐慌、荒年與疫癘。橫行於二十世紀中葉，而獲得最大的勝利的乃是斑點熱症。世界上人口死亡之多（一九三〇年有二十萬萬到一九六〇年不及一半），其最大的原因是由經濟完全破產中直接所生的病症與饑饉。戰爭所屠殺者不過幾百萬，而殘忍的癘疫卻日夜肆行屠殺直到兩年之久，其所屠殺的人類，何止數萬萬。

據殷阿夫 (Imhof) 所說，在這次饑饉癘疫的五十年之後，沒有一個單獨的歐洲歷史是緊接着戰爭之年的。在這個時期中，凡爾賽條約所創立的國家都仍在法律上存在，但在貨幣停止以後，牠們已經消沈無力，對於日常生活，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大勢力了。像英、法兩國便把牠們的精神

努力於稅收，有如古希臘、臘丁帝國徵收稅餉一樣。牠們間或干涉地方行政，但大多數又讓其任意所之，牠們對於有動力的抵抗，不是不理，便是妥協。英政府似乎在一九五二年仍舊照付借款。關於這些事情是很難考究的。所付的款項似乎是一種沒有購買能力的紙幣。其他政府如意大利、西班牙就在有限制的區域範圍內繼續行政。例如羅馬控制着一個三角形的地勢，以熱那亞（Genoa）、佛羅稜薩（Florence）與地中海為界，而巴塞羅納及馬德里維持半島大部分的治安，祇除了蘇維埃化的西屬里維耶拉（Sovietized Spanish Riveera）、葡萄牙與安達盧西亞（Andalusia）不受統治。

美國方面情形亦略同。鐵道停止行駛以後，全國便分崩離析起來，其原因是人口的中心相距太遠，及人民地方自治的能力較大的原故。他們距離向西開闢新地的日子還不到一個世紀呢。自從大疫以後，鐵道便永不再續。合衆國聯邦政府便縮在華盛頓一隅之地，猶之東羅馬帝國縮在拜占庭一樣，但是華盛頓缺乏拜占庭的生活力，久已成爲一個歷史上的首都了。德意志於波蘭戰爭之後，已喪失她的統一，柏林祇在波蘭空中襲擊的劫灰中很快地分散成無數的小村落而已！

在幾年間實際把破產的政治制度革除，把普通的交通運輸斷絕，把金融的流通破壞，把軍事的組織腐化，因此便把維持秩序的責任放在地方的領導人肩膀上來。他們覺得他們有服務的機會了。在歐洲及世界上其他各地，所有的村鄉城鎮，都覺得牠們有自己繼續下去的必要。瘟疫使他們更明白了他們的需要。地方當局組織衛生役務與防止傳染，亦有讓其他救急的團體去代辦這種工作的。當疫癘過去之後，他們有如覆舟後，身處在一個人地生疎的島中的船員，他們不得不把這個頹敗的經濟重加整理。牠們用舊的權威來應付新的需要，以舊的名詞來稱呼新的事物。這裏有自稱市長或公爵的富於精力的領袖，那裏有一隊人自名為市議會，或者市民聯會的組織。這裏流行着很深的科學技術專門名詞，而為「工人的蘇維埃」所把持一切。這個組織與市民聯會甚相似。牠的最大分別點，便是牠的一種新社會狀況的自覺心理。

在這個混亂時期中政治的組織也有很大的區別，實際與合法的管理尤有很多的矛盾地方。橫過德國南部，波蘭與法國北部，流行的印象便是社會革命，都是採蘇維埃的形式的。但是牠們與原始俄國地方蘇維埃的組織卻又大相逕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做照莫斯科的共產鄉村與一個



由原來的地主僱主所統轄的鄉村並立毗鄰，而且往往仍與首都的政府通消息的。在這些言論上站在相對地位的制度之間，不能不維持一種不自然的妥協。代表將到各個紛爭的當局處——收稅的地方——如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巴黎、羅馬等處陳請，有若古昔中世紀初期的酋長晉覬拜占庭或羅馬一樣。地方的衝突與革命是常見的事情。首都對於此等事項，不過認為地方的暴動與市政的重整罷了。

散播於這個混亂的歐洲的，尚有舊軍閥的遺孽，那些缺乏軍餉，仍然保存了相當的利器與軍火的士兵。這些大都是以當兵為職業的軍人，及抗拒解散的隊伍，因為除了這門職業以外，他們是沒有噉飯地的。這些士兵站在軍官們的上風，因為他們隨時可以自由逃伍。有許多地方，這種不完全的軍隊尚和首都及舊有的合法政府通聲氣，而且替舊制度去做徵收稅項的工作。有些更流為土匪，而美其名為公共秩序保衛團（Public Order Guards of the Emergency Army）。大多數是和地方的跋扈市長與議會狼狽為奸的。在一九六〇的數年間，時時有小衝突發生。昔日的帝國與主權國更迭出現，不久即個別消滅，另採新制。一九六〇年後，甚至仍有半軍閥式的隊伍索織

稅項，維持秩序，而自稱爲新式國家的核心。他們佔據了舊時的壁壘與城堡爲根據地。

在一九四〇餘年間，這些軍人都是新徵入伍未經訓練的人，二十年之後他們已成爲中年的無賴，穿了檻樓的制度，游手好閒了。有些軍官佔據了本地的飛機場及軍工廠，但到處的軍人都覺得他們與技術人員的旨趣不相投。他們漸淪爲十九世紀的步兵，有很粗陋的火藥應用，已經非常地滿足。

人民既然感覺有爲自己做事的必須，所以他們便把以前一世紀交託給中央政府代辦的事情自己擔任起來。甚至在世界大戰以及其後混亂的時期，法國的商會也製造錢幣以補充兌換的不足。此時這種事情更傳播遐邇。今日的博物院中，陳設着許多的各式各項的地方貨幣，這些貨幣，往往是在一個地方可以通行，而在幾十里之外，卽成廢物的。地方的銀行家往往設立地方的信用制度與該地的律師合作，醫生們也想不經內政部註冊而設立診所。在人口稠密的中樞，仍有印刷公司，各種刊物在各種不同的粗陋紙張上印行，這便是歐洲報紙的殘餘。但是對於外國的新聞差不多是謠傳。大規模的報紙已經破產，電報的組織也失去了牠的功用。

除了在幾處特別的中心區的以外，用無線電傳播消息的事已經完全停頓了。製造收音器的工廠已全部解體。由一九五〇到一九七〇年之間，除了特別的空中轉運，所有的傳光熱精氣都停止工作了。歷史紀載中給予我們很多關於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郵務電訊的變遷衰替所經過的材料以作參考。很明顯地倫敦、巴黎與羅馬之間的電訊交通向未斷絕，在一九六八年間倫敦地陷的消息瞬即由電訊傳到馬德里，再由此電轉倍諾斯愛勒（Buenos Ayres）。但這種的復興，大概是和新的空海管理部（Sea and Air Control）有關係的。

世界貿易崩潰之後，不特無線電的機器不復存在，即其他較小的利便應用的物件，也蕩然無存。攝影機剷除淨盡，腳踏車竟成稀罕的東西，往昔的汽胎車輪已換了薄而硬的粗陋的改造橡皮胎。電燈亦因為缺乏正當的材料而時時閃熄不定。所有的電器都廢弛了，電車路有的是完全棄而不用，有的是回復到用馬拖車的狀態。

自世界大戰後，人民的普通生活程度已日趨低落。英、法兩國地方，在戰爭期中完全停止建築房屋，戰後亦難於恢復舊觀。除了柏林與維也納而外，戰後都還有充分的房屋供牠們的減縮的人

口居住的，其餘的歐洲人民的居處，且比較戰前更爲偪仄與穢濁，雖然沒有到中國與印度的城市那種地步，但與戰前狀況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一九三三年後，報紙已經注意到清潔的退化。此時已經對於街市的不潔，馬路的失修，嘖有煩言，但回顧到二十年前的清潔狀況，殊令人有無限今昔之感。

人們的衣著也大不如前了。差不多四十年之久，人民沒有充足的衣服。城市的居民，雖然制服日增，但失去了以前的整潔和光彩。敝衣襤褸的人隨處都有。鞋的供給也非常地缺乏。當戰爭開始之時，已採用大批製鞋制，徵調供給軍用。其後因爲經濟的完全破產，遂不能回復到商用。而在大批製鞋制度之前，舊式的鞋匠已被驅逐離去歐洲，所以在此荒年，歐洲人民都感覺無鞋之苦。西班牙有最好的靴子，英法是祇可穿着芒鞋。在波希米亞的某中心點，也有製造鞋襪的地方，除了西班牙之外，有豐富的鞋的供給的，當推歐洲中部了。至於帽子的供給，到處都同樣地感覺缺乏。

世人所慣常享受的一些生活上的安舒品與補助品，也普遍地消失了。除了幾個地方，煙草是完全沒有來源了。大批的紙煙出產已經停止，吸煙的人祇可以用煙桿來代替。茶葉成了不可多得

的珍品，糖亦是稀罕可貴。於是缺乏滋養料的疾病叢生。

當世界大戰的困厄時期中，歐洲人已經知道如何去找尋補助與代替的方法。現在他們有二十年的內部困難去料理掙扎。德人是曾經滄海的，他們自具有技術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在這不幸的時期中，他們能够比較世界其他各國的人，維持相當的安舒生活。他們製造替代的皮革、棉花、咖啡、茶葉、煙草、金雞納與鴉片，以及許多他種日常需用的藥物。

處在絕端相反的地位的，便是那些一成不變的愛爾蘭人。在未恢復生產之前，他們的物質缺乏是非常地可憐的。有人懷疑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間整個愛爾蘭未曾出產過一百萬碼的布。他們是在牛酪、馬鈴薯、威士忌酒與政治的刺激中生活着。他們織草爲衣，染以各種的顏色，而且居恆以此自豪。他們取暖的方法便以土煤與糞作燃料，更甚而出於互相辱罵，以增進身體的熱度。這似乎說得太過野蠻。然而正在這個時期，他們卻建立了一個雅觀而不甚堅固的赦罪教堂（Church of the Atonement），建在都柏林皇家科學院（Dublin Royal College of Science）舊址上，在一九三九年曾以教授生物學來使三位一體的聖教瓦解，即爲警察廳所封閉了。

讀者們由歷史圖畫百卷 (Historical Scenes in a Hundred Volumes) 中大概可窺見當時情形的梗概，有些想已讀過關於這個時期的小說傳記。在五十年之後，及六十年之初，圖畫是比較地稀少。當時世界上的攝影機並不缺乏，但軟片的供給似乎在一九五五年已經告乏。我們所得的祇是幾十張影片，其中絕對沒有歐洲的相片。所影的又掛一漏萬，所以編輯們不能不利用日後所追述的圖畫與相片來補充其材料。

有六張很有趣的里昂風景畫，是攝於一九五九年的。似乎有人設立了一家照相館而能把牠顯出影來。其中一張所影的是叫做『巴里哥』 (Place Bellecour) 的中心區的市集日子的情形。較早的一張照片，所影的地方原有路易十四的騎馬銅像的，而在這張照片之上，已不見銅像蹤跡，諒必爲了需要銅質的原故，把牠熔掉了。往昔大廈、酒店與醫院的窗戶的框椽均已蕩然無存，有如洗劫一空的屋宇。但是街道上似乎是很熱鬧的。那時大概是每月一次的市場吧？很多牲畜都排列待售。人民大多數是農民的裝束，頭戴草帽，或衣敞袍，或圍以項巾。城市的人，仍然穿三十年時的服裝，不過已經襤褸不堪了。其中有三個市場官員或者是縣知事，是戴了舊式的高帽子。在後面有

一個滿臉鬍子的男人牽着一駕牛車，車上坐了一個肥胖的女人，抱着一籠鴨子，後面放着一頭小牛。這個女人向着攝影機露齒地笑着，她那裏知道是向着後人笑呢！

另外一張照片是影的一所荒蕪的鐵道站。其景象也是一個熱鬧的日子，很多玩意的東西方在進行着。鐵軌已經不見了，參加遊戲的人的騾馬繫鏈在月臺上，列成長行。站內各辦公處的門戶都給人卸去了，只有門框上的字跡如『站長』、『待車室』、『食堂』等字樣尙隱約可辨。在月臺的當中排着兩張長桌子，上面有很簡單的茶點擺着。第三張照片影的是在福維爾 (Fourville) 市區有一堆閒人佇觀方纔由斜坡上倒塌下來的房屋的殘址。這裏有兩個有鬍鬚的穿了制服的男人在維持秩序。我們知道在當時里昂尙有三旅這種的軍士駐紮在兵房裏的。他們穿了芒鞋，用布繩子連腿綁住，他們所穿的外套也還整齊。

其他的三張照片是給予我們一幕停閉了的絲廠的景象。直到經濟破產的時候，里昂的絲業大多數是由蠶產，但是生的原料來源，似乎已經完全斷絕，其後貿易的緊縮，戰爭的影響，把人口的捲線也低減了。製造子彈需要絲的供給，當然會盡力地設法把供給維持到底的。這間工廠，似乎繼

續地作低度的出產，以迄於一九五一年里昂的公社（Commune）成立。無疑地牠是忽然的被放棄了。一張照片所見的是紡織機與火油桶的中間有一堆紙的引火把。很明顯地是曾經有人想在這裏放火的。又一張所照的是繞絲的機器，塵封滿面，蜘蛛絲縱橫。第三張所見的，是一隻野貓伏在紡織機的梭子上面，看見不速之客，露着咆哮的樣子。所有的機器都是有着二十世紀的粗笨的特色。照相之時，一定把窗戶開了，因為畫中現着無數的飛蛾，在那裏團團地打轉，似乎方纔把牠們驚動起來，到處亂飛，不進鏡頭似的。

這幾張照片的難能可貴，便是因為牠們是很可靠的。其他乾片的照片，也有斯德哥爾摩旅店（Grand Hotel of Stockholm）的大膳廳的遺址，雖然荒廢，建築依然完好，這種照片引起我們映想到百年前發現的那張羅馬加勒加拉浴場（Bath of Caracalla）殘跡的圖畫。其他還有一張是表現着布來屯（Brighton）地方的都會飯店（Hotel Metropole）食堂的殘跡。但其餘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三年的圖畫見於歷史圖畫集中的，都是安排過的。交通運輸的組織，飛機電訊的恢復，都遠在照相機件原料的重行製造之前。



還有幾張極有趣的關於倫敦復興的情形的畫片，表示大疫之後，沒有市面與人跡的街道和空虛的傾圮的堆棧等情景。那些表示海濱旅店的廊廡改作醫院的病房等圖畫，給人們以很深的印象。圖畫中有一張是攝取當時放牛人與種薯人在當地爲爭奪海德公園（Hyde Park）及甘生東花園（Kensington Garden）而鬪爭的情形，死亡的人數竟有三百。還有些圖畫，表現着患疫而死的人的屍體，飄浮於泰晤士河，堆積在倫敦池（Pool of London）中的情狀，現在說起來是有點鋪張揚厲的。

我們身處安全的時代，試一迴想幾千百萬的歐洲人經過二十世紀的安舒生活。經過戰爭時代的震恐刺激的過程以至於這個普遍的衰頹與貧乏的狀況下，心理上是多麼的惶惑、失望與不甘啊！貧乏的人們，對於危難的恐懼或許不像富有者那樣顯明。甚至在繁榮的日子，窮人們所過的，也不過是慘淡厭倦的生活。雖然他們可以不饑，但所有的糧食是極粗陋的。至於住居方面，便向來沒有整齊的房子。他們在此時不過是愈趨愈下，由苦役而至於失業與沈悶無聊而已。中等的人家便由好變壞，由可以勉強敷衍過去的生活，而淪爲像一般貧苦羣衆那樣的貧乏了。

在這個時期中，到處最感不快的人，以那些退休的，獨立生活的人們爲最。他們在普遍繁榮的時期是太興旺了。這些富庶的人們優游自得地散佈於各地，對於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寧的艱苦處，漠不關心。不知不覺中牠已取舊式的統治與指揮的貴族及鄉紳的地位而代之。於是這些人們大享其宮室、車馬、田園、別墅的幸福。世界大戰的時候，稍稍斂迹，其後二十年中，又恢復舊態。直至世界經濟破產時，這種閒逸的生活，方始消失。

『經濟現象』(Phase of Economy) 這個名詞，實在是不成立的。因爲實際上並無所謂經濟而祇是費用停頓中的困厄與不活動。除了機巧的投機者或者可以增進一些財富以外，是沒有人比較以前富裕的。唯一的利益便是銀行的利息了。不景氣散佈以後，貿易低落，企業倒閉，債務國與合股公司停止付款，而這些倖運兒，這些富裕的人們，一方面既不能收款，一方面請求他們施濟的事更多。他們的銀行與律師又陸續地通知他們，那一處的放款尙可以支持，那一處是已經拖欠或不履行債務。抵賴的風潮一高，安全的保障日落。如果他們賤售或窖藏，則兌換的起落對於他們的資本或有更大的妨礙。一九三三年的金融報紙有這麼一句說話道：『無論甚麼都低落，祇有失

眠之夜是增加的。』在別墅中輾轉反側不能成寐的人們與淒風苦雨中失業的人們，其痛苦情形，正復相同。

我們可以參看柯白的日記 (*Diary of Titus Cobbett*)，他在一九五八年曾由羅馬乘腳踏車沿里維耶拉 (*Riviera*) 去波爾多 (*Bordeaux*)。他是一個做美術用品商人的出身，曾在英國內地稅務處做估計傢私、圖畫等類的工作。他這次的旅行，似乎是出於好奇心。他對於由熱那亞到波爾多間的難於兌換銀錢深置不滿。他似乎還帶了些外交與領事館的使命的，但是他卻緘口不言。或者他是被派去做調查工作的。

他的描寫紀載是很有趣的。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涉足過蒙的加羅 (*Monte Carlo*)，他所遊行的地方，是當年他曾經做過座上客的。目今所見向之別墅名園，已是滿目荒蕪，塵封泥積，或留老僕看守或爲鄉民所劫掠。向之奇花異木，已變爲斷梗殘枝，苔痕封鎖，向之華麗的酒店，祇剩碎瓦頽垣，潰堤之水，淹沒人行道路。衰敗之象，想與羅馬崩潰時的城市一樣。道上行人稀少，祇有無數當年的路桿與路旁告白，臨風招展。向幻滅的運輸交通，默然憑弔！他一路走着，一路揣度夜裏不知能

否找着一個清潔一點的棲息所以度長夜。當他沈思的時候，他的油燈照出了幾行模糊剝落的字跡，是往昔一間大酒店的遺址。其字跡如左：

H TEL S LEN ID  
CU SINE RENOM  
TT LE C NFOR M RNE

但是主人與賓客向那裏去了呢？這些別墅與花園的主人又何往了呢？無疑地，很多已老死於此，因為此地的主人，大多數是中年與老年的退隱人士，其餘的想已回到他們的故鄉去度貧苦的生活，祇留着悵惘的迴憶了！

柯白再次探訪蒙的加羅的酒店與少年運動俱樂部的殘址。美國酒排間的天花板，在他未到的前數日已經倒塌下來了。他說：『牠們現在顯得很狹小了，在我年輕的時候，牠們似乎是非常地宏偉的！』

那個著名的賭徒常於此自殺的花園，現在也蓋滿了苔痕野草了！

在這個普遍的腐敗之中，他注意到有一個例外的事情，那便是航空的交通仍然繼續着。在羅馬與馬賽之間他看見向東或向西飛行的飛機有十三架，而且有兩架是當他清晨未起牀的時候飛過的。所以他寫道：『我懷疑在二十五年前，我會看見這麼多的飛機哩！』繼着他便發揮一段言論，說可以由這種的航空事業使商業與秩序藉以恢復舊觀。在尼斯（Nice）與馬賽他見到有船隻——『並不是漁船而是一千噸以上的大船啊！』在尼斯，人們方在建築大船——照他的估計是有三千噸的載量的。自一九四七至一九六二年來，我們不見有造船的紀載。在一九四〇年之前，大船的建築，因其不能獲利，早已停止，而自一九五〇年以後，無論大小的船都不見有所建築了。年復一年，這個破產的地球上的交通制度，已經廢棄。直到今日，學生們正企圖研究當時速度腐化的統計表，以明真相。

當柯白看見介於馬賽港口與幾處內地之間仍有火車交通，他顯得非常地驚訝。在他的印象中，他以爲世界上已經沒有鐵道的存在了。自從交通貿易的低落，不能繳納運費，來維護道路與應

付一切開支的時候，便是投機的人，也不能再做鐵道生意了。鐵道已經成爲破銅爛鐵一類的景物，生鏽的鐵軌已給野花野草蓋住。農民們把鐵道當做鐵鑛拆下來用，所留的實寥寥無幾。大部分的枕木都是被拿來作燃料用的！

在弗里居斯（Fréjus）地方有一座飛機場，他把他和一個西班牙亞美利加（Spanish-American）的飛機師的談話紀錄了下來。這個飛機師先服務波蘭，後來服務德國，最後在戰爭期中又服務法國。柯白對於貿易的復興深深地感覺訝異，此時由東方運來的有橡皮、香料、水銀等貨物，而運去交換的有鐘表、指南針、刀、針、鈕與玻璃等類。大多數的貿易都是以物易物的，所獲的利益甚豐，這種的貿易大有進展的可能。

柯白第一次知道這些航空商人集合力的發展，他們大多數是由戰爭中生還的。他們已經組織了一個組織不甚嚴密的世界聯盟，似乎由此保存了航空線與航空路燈的功用。

柯白對那個飛機師談及他所見的船業復興的事情。

「我們要守候着牠的進展，」那個飛機師很注意地說。

「你們載客人嗎？」柯白問。

「當他們可以買票的時候。」

「但這是回復文明了！」柯白很驚喜地說。

「不要相信牠！一個新的文明方開始哩。」

他似乎使柯白第一次見到一些思想，很久便在他的腦海內蘊藏着的。「世界帝國嗎？」他說。「這是一個很陳舊的思想啊！誰控制着空權與交通的便控制着世界。我們還需要帝國和這一類的言論做甚麼呢？」

這一段的談話，深深地刻在柯白的心上。他橫度法國，去到波爾多，把他腦中的思想紀錄了下來，他把這個新的世界運輸組織，與羅馬崩潰之後漢撒的商人使波羅的海與北歐的文明復活的前事，兩相比較。「總之，」柯白自己沈思着說：「我們向來都沒有把有組織的運輸與貿易在歷史上佔一個重要的地位啊！」

在波爾多他把腳踏車變賣了，取了錢乘飛機去勒部耳日（Le Bourget）在巴黎廢墟附近

一所舊飛機場，)然後飛往漢登(Hendon)。他所乘的飛機勒曼(Le Mans)會降落來交換貨物。御空而行比較乘了腳踏車在崎嶇的路上奔馳，苦樂真有天淵之別。

他由天空中，居高臨下，對底下的城鎮村落作了一次的鳥瞰。他用新的目光觀察飛機場的飛機師與機械員，由他們方面，他知道世界的交通是如何地進行，與冶金及電力的工程是如何地維持。他欣賞着勒曼的教堂的美，這是他學生時代的愛慕物，此時尚如魯靈光的巍然獨存，他描寫着在他下面的那些為飛行先驅者所樹立的碑碣。亞眠(Amiens)的教堂也尚完好，不失舊觀。

他的日記的終結處，露了很傷感的情調。似乎他許多年沒有涉足到英倫，此時目觀倫敦城外，的衰頹景象，不覺觸目驚心。他自孩提的時代便居住在倫敦，而且很愛牠的。海德公園的一部分，已經開闢為飛機場，城中區重建的房屋，是雜亂無章而不悅目。他很反對這些擁擠的房屋，當中有着廣闊的防空士敏土甲，往來交通很不便利，他說：『這簡直像一堆有疾病的菌，』『英國人幾時纔知道去計劃呢？』繼着他便作了一個像預言般的觀察，他很懷疑泰晤士的北岸，淤積既多，泥土又鬆，是否可以承載這些不堅固的新屋哩？



到十年以後，他所慮的，已成爲事實。泰晤士的河牀封鎖，而倫敦城許多街市和有名的偉大建築物，不是崩潰，也燬於火。凡是看過歷史圖畫百卷的人，都會記得舊滑脫廬橋的崩潰景象，與及那著名的（埃及皇后）的針的尖塔的倒折情形吧？

## 十二 清算中的美國

以上數段已將二十世紀中葉舊大陸的大勢概述一過。在歐洲方面，卻有幾處比較各大列強的遭遇較佳的地方，完全置身事外，專心致志於內部的發展。西班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九三一年產生的新西班牙，一向作着壁上觀，專注着她自己的事情。再次令人注意的，便是美洲中說拉丁語與英語的人民也不參加這些熱烈與兇猛的戰爭。牠們也同樣地受到經濟、政治與社會的混亂挫折，但都是在牠們自己範圍以內的。一九三〇初年的金融高潮過去之後，歐洲的禍亂對於牠們的影響愈少了。牠們有着牠們的私有資本主義衰落特殊現象，也有牠們特有的應付方法。

牠們所以同受着經濟破產的影響，有以下諸因；二十世紀世界崩潰的近因第一是幣制的不

適宜，第二是生產力的增進使社會的組織紊亂，第三是大疫爲害。戰爭並不是直接的原因。人的每日生活是經濟的，不是鬭爭的，牠是爲債權者所遏制着。就使世界在一九〇〇年已經成了一個單獨的國家，如果牠仍是建築在有着一個起落不常的幣制的個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也會同樣地淪於崩潰的。如果當時是劃分一百個好戰的國家，而是有一個金融制度，限制着債權者與允准工業無限量地發展的，牠會產生充分的精力。把戰爭再延長一世紀纔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經濟的崩潰，是世界瓦解，貧弱與饑饉的最大原因。沒有牠，人們或者再延長互相殘殺的慘劇。歸結說起來，或者在一九三〇的幾年間，便有經濟的恐慌。到是對於他有利的哩。

初期反對戰爭運動的失敗原因，要待我們把一個穩當的幣制連絡的重要點看清楚了，纔得明白。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由各方面把債權者與傳統的仇視的關係細細地解釋，把美國與歐洲的遭遇作一個平行的比較是最好的。一個方法了。

美國自脫離歐洲，宣佈獨立之後，已經向着他們自己的發展的路上走，和舊大陸是不協調的。名曰獨立，其實也不能完全獨立，因爲大家都是在一個地球上。整個十九世紀，南北的美人心理，都

是沈浸於「孤立」的思想。這種思想，見於學校、見於報章以及見於所有的政治宣言，都認新大陸的確是一個新的世界，脫離舊的傳統的專制，而走向和平、自由及一個新的機會與生活裏去。牠要避免與舊大陸中任何國家及政治作互相牽制的聯盟，不惜脫離親屬關係與共同文化，來忘記歐洲的相鬪與仇視，而自己創設一種新的生活。由華盛頓的日子以迄於威爾遜的時代，雖然內部有南北戰爭及經濟的困厄，美國人的心目中永沒有放棄他們所具特質的信念，深信牠對於世界其餘各國，是抱一種傳道的與人道的態度。牠覺得牠是很簡單地明白許多事情，但牠沒有懷疑牠知道得比較清楚。

整個十九世紀，歐、美兩洲在經濟上，生理上都大大地擴展。美洲深覺着她自己的生長，而不注意於歐洲的平行地進展。靠着歐洲大量的移民，美國的人口在百年間增進了八千萬。歐洲方面，雖有大批的出口移民，而在這個期間內也增加了二萬四千萬的人口。美國人懷着一個玄想，以為他是和歐人同樣地進展。他的生活的確和歐洲人的同時擴大了，由思想與發明的運用，以及由歐洲輸來人力的協助，的確進展得非常地速。在他的不被侵佔的大陸上，這擴展中的各個不同的分子

的增加，是和歐洲不相吻合的。他也是住在一個同樣的進步的制度裏，但是他漸漸地和橫過大西洋的發展發生隔膜了。

其後交通運輸的發明，竟成了縮地法，使向來相距數月的行程的，在幾小時之內可達。大西洋兩岸的或密接或疎遠的關係，便成了二十世紀特有的狀態。牠們很像兩個大的陀螺，各在一邊旋轉。彼此漸轉漸近到了接觸的時候互相碰撞一下，又復分離。牠們又像兩個複雜的機器，是生定了應該合而為一個世界的機器的，牠的車輪試試看欲相接近，但互相撞擊，火星四散，又復相離。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生活的統一勢力，是想把歐、美兩洲拉攏。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恐怕任何一位觀察者，必已給人們原恕了，這個結合是失敗了的結論。

我們對於歷史上有名人物如福特、威爾遜、羅斯福第二等的事績已有詳述，且已將這些人謀與歐洲接近而又退縮的過程一並談及。美國有一位公法家名叫做西門斯(Frank H. Simonds)的在一九三三年作了一本書名叫美國能安居不動嗎(Can America Stay at Home?)的，在經濟恐慌初年，個人資本主義沒落的時候，對於孤立問題作很明顯的研究。他列舉羅斯福第一初次

的帝國主義的企業以後，或即或離的景象，美國處於兩難的地位，既不能與歐洲的事情完全脫離，又不能公然地參加。牠表示了許多意見，但沒有言其必可行。牠堅持着道德上的制裁，但又不肯負起責任。據西門斯之意，在歐洲人的目光中看來，「美國人對於和平的主張，很透明地是把洗禮約翰的使命與潘蒂斯·派里（Pontius Pilate 即放任暴民害死耶穌的總督——譯者）的方法溶合起來。」那便是說美國人的智力，是一個新式的自由與純樸的簡陋二者的混合物。

美國自始便是與歷史相脫離的，她是一件新的東西，在那時代，她的新異處比較列寧的蘇維埃共和國，尤有過無不及。但是她不能繼續地使這個新思想發揚光大。她在獨立後一個世紀之後，便自成了高深的學府與教育的團體，來自己計劃着一切，但在當中的期間，她把羣衆的教育交給薪水微薄的教師與言語重複的女人手中了。她的體力是非常地發達，但在一個多世紀之中，她的智力的糧食卻是由外面輸入的結果，便是這種的不熟練，這種的自視使命的重大，以及這種的缺乏行爲能力。威爾遜的愚蠢的教訓與辦法，既愚昧而又沈浸於世界和平的智慧中，大概是當時美人心理的最高表示了。

美人的心理甚至在十九世紀時，也不是蠢然無知的，而是未經陶冶訓練的心理。如果牠是笨拙，牠也是很自由的。牠的宗教的復活與政治的變動是相平行的。我們在講確實的美國生活的故事及研究中，可以看見爲悔罪與歸教而設的野外集會及有組織的情感宣傳。我們可以想像火把的野景，嚴肅的訓誨與大聲的謳唱。這種公衆情感的高潮，這種集會，通常是在森林裏，唱詩、誥誡、高呼悔罪與高度的安慰，美國人的精神生活中這種沒有心思的趾高氣揚及過後的沒有心思的興闌意盡，是在美國世界使命的繁盛與凋敝中反映出來。祇有世界的經濟破產，纔使美國的真的社會與政治思想有力地長成。美國因經濟的不景氣日甚，而脫離參加歐洲複雜糾紛的政治，是顯明她有一種較新與較有力的決心去抓住社會生活的要素。

內部的環境，每件事物都是刺激思想的。經濟崩潰的迅速，且尤甚於歐洲。工業出產已達到最高點，牠的下墜也愈沈重。在一九二八年時，美國尙自信爲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在一九三三年她的失業狀況，比較其他各國，更是可驚。但是他們卻沒有有組織的反抗力；他們沒有一個革命的方式去團結起來。他們的反抗只是個人的與不法徒黨的反抗，結果成爲犯罪。社會並沒有被推倒，但

牠已很快地崩潰混亂了。犯罪的高潮、金融的混亂、如狂的努力去撙節、以及所有一切因此而來的摧殘公衆教育、渙散人心、秩序與交通的事態，都在這個廣大的比較無歷史的土地內爆發了。羅斯福第二曾很勇敢地奮鬥，但是他來得太遲了，阻止不了這種崩潰的趨勢。

在美洲有如在歐洲一樣，是慢慢地溶解的。並不是一日間的摧毀，而是每日中都有瓦解的趨向。政府形存實亡，收稅的力量日薄，華盛頓的聯邦政府，雖然不像國聯的完全崩潰，也日就衰替。社會裏亦同時湧現了那些市政府的自主、臨時的統治、市民聯會、法律與秩序的團體、工人保護會、與工人蘇維埃等各色各樣的名目。一九四五年間，在藍山 (Blue Mountains) 與太平洋岸的小共和國，已經自成孤立，各自爲政。或行美以美會主義 (Methodism)，或採「技術政治」或遵度格拉斯計劃 (Douglas Plan)，猶他 (Utah) 地方，實際上已成爲一個自主的採用單一稅制的國家，且奉馬門教 (Mormonism) 爲國教（馬門教徒抱一夫多妻主義的——譯者註）但牠們都沒有正式由聯邦退出。

我們現在尚可以找到一本紀載，是一個英國公使館昔日的隨員在一九五八年對於華盛頓

城的描寫（一九四六年間所有英國的公使都換了總領事）他敘述在白宮中卡魯左（Benito Caruso）總統款待他的情形。卡魯左總統任期已滿，但因為繼選之人在入都的途中忽爾失蹤，所以仍由他執行職務。在選舉的時候，曾有很大的紛亂，兩個分立的總統爲了永刻茲投票匣（Yonkers Ballot Boxes）問題發生爭端以後，又因紐約州管轄問題起衝突，竟將新英格蘭全部的交通阻斷了。

總統接待賓客，很有禮貌，並且對於歐洲情形，問了許多很富於同情及很有卓見的問題。他對於美國的將來，很表示有希望，而且說，不久便可恢復原狀了。密士失必（Mississippi）的汽船航業已經恢復，雖有政治的不靖，棉花仍是通運到北方。在一九五六一到一九五七年之間，一百四十輛汽車已運去南美，而在上年，是祇有七十二輛運去。新的金雞納、咖啡的交換制度也非常的好。在他的觀察中，營業是蒸蒸日上的。他承認胡佛的失敗其結果是延長得太久而且是出乎意外的惡劣，困苦人民到於極度，但人民卻能以開國先烈所崇尚的精神，敢當此種難局。他的結語是英語民族兩大國中間所常用的祝辭。



所用的膳食是很簡樸而很充足。有很美味的豬肉和各種的蔬菜。總統很平民化地說他的增高聲譽，是靠了在白宮後面的豬圈與花園中的黑人祕書的幫助。這種祕書的職務似乎是管理家內的事情而不是管理國家的事情。這些祕書的是爲了隱祕的政治原因而被任命的，有幾個還是目不識丁的呢。總統夫人是一位愛爾蘭籍的和藹可親的女人，她說及因爲聯邦稅收的難於徵收，在持家方面，也感覺許多困難的話，但是總統阻止她，自然他是認這種的家事是反映國家財政的散漫，而不堪爲外人道的了。

在當時，國會中所代表的，不過是三分之一的州。其餘的，不是感覺派遣代表的太耗費，便是感覺着沒有必要。在議院中，有一個議員在那裏說了一篇關於各處疾苦的狀況，但沒有看見新聞記者，也沒有傾耳而聽他的說話。顯然的，這個人是想以此來把有些立法上的提案岔開。但那位游客是找不出誰來正確地解釋當時的環境的。

第二天，這個游客與那位善於詞令、精神矍鑠、令人可敬、由愛達和 (Idaho) 來的參議員波拉 (Borah 一八六五—一九七〇) 同進膳，到終席尙詞鋒不倦，連客人預備了的幾個問題，都沒有

空隙去詢問他了。他對於他的國家也是充滿了希望的。他承認在他的一生裏，美國的景狀的確大不如前。他不同統計學家爭執。要是就煤鋼鐵的噸數、鐵道的里數、汽車的大批出產、與各種貨物的量數來說，當然是今非昔比。『但是人不是祇靠麵包生活的。』這位美國的元老說：『我們且嚴密的察究一下事物的奧竅吧。』

事物的奧竅似乎從沒有完全無疵的。癘疫，像上帝所降的其他的事物一樣，是很可觀的。生活程度，照高尚的方面說，是比較以前任何時期爲高。或者少了幾間浴室，但是人心卻比較清潔了。在他年輕的時候，美國的生活是非常地驕奢淫逸的，但現在一切都成了過去。美國現在，與舊日殖民地時代的淳樸、忠實與純潔的風氣的接近，比較向來尤爲密切了。

停了一會，這個參議員又繼續地批評歐洲的不忠實，對於英國的外交抨擊更甚。他好像是一時之間把很久的以前的演說詞重背起來，已經忘記英國的外交是完全過去了。大概他是聽聞了『隨員』這一個名詞，觸景傷情，引起了他的迴憶吧？他又把談鋒移到目前狀況來。他堅持着說，美國在初期的歷史是最黑暗的。一百五十四年前，華盛頓曾經爲一隊得勝的英軍所焚燬。但在目前

的經濟恐慌中，卻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甚至在這次恐慌最黑暗的時期，也沒有人想去焚燬華盛頓啊！

其後這個游客又去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以及其他的文化機關參觀。他的批評非常地精警，和我們研究美國人的心理反應，甚相符合，甚至在那時，已經有一種新而有力的美國自覺心理，在牠的文明劫灰中生長出來。

這種機關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去應付新的環境，並不是所有都是進步的。他對於哈佛的印象使他想起由書中所讀到的西藏喇嘛制度。沒有紙章作筆記與練習，教授方法完全是口授與心記。圖書館是嚴密地防守着以防毀壞，比較重要的書籍是封鎖在玻璃櫥內窺視，每天祇翻一百。教授地位的不一律是以他們的門徒人數多寡來決定的。他們如果不坐在課堂與樹下來講演，便是成羣地作旅行式的講述。不獨他們的地位有別，而且體力勞動也不一致。那裏的慣例，是由學生們在學校的園地上種植食物以供他們的教授和自己的需要，而在技術與美術的學校，須織製衣服與芒鞋。關於文藝的比較有天才的學生在石板上寫作詩句，如果為教師們所賞識贊許的，便許他

們把這些詩寫在牆壁和天花板上，那裏所表現的，是古代淳樸好學之風。那游客得到大學校長伊里阿（Eliot）的款待，校長是一位相貌堂皇的長者，他的職位是由祖父傳襲下來的。室中有一大的火炬，是點的牛脂蠟燭，兩個將要畢業的學生不停的鉗剪燭花。在簡單的湯，及他所選定的馬里蘭（Maryland）的紅酒，與一科尼科比亞（Cornucopia 意為角狀之器）的水果與乾果的筵席間，校長和游客開懷暢談，不知時間的遲晏。

據造訪的尼古生（Nicholson）隨員的印象，這種情形，是非常地不實際。不錯，這是一種很淳樸文雅的生活，但他以為這是不會有何效果的。他不讓校長知道他的意思，靜聆這位老人談論，如何地哈佛已經獲得盎格爾文化的清白與優點，是哲理與基督教的交融文化。那種忠謹之處，有如保皇黨的忠於其君。

「這裏有一位國王嗎？」游客問道。

「實際上並沒有一位國王，」那校長很抱憾地說：「我們已經決定獨立宣言是不能實施的，但我們已經是不能來位置那合法的英國國王，所以我們的態度是沒有確定。但我們有着一個忠

誠的態度。我們保存着牠。」

學校的功課似乎是希臘時代托勒密 (Ptolemy) 的宇宙論，荷馬 (Homer) 的詩，莎比亞的樂府與神道學之類。學生所餘無幾的空暇時間，也不從事於高尚的體育遊戲，他們似乎已經放棄了那些美國大學特有的遊戲如棒球、足球之類。校長稱這些遊戲為「後來的創物。」他們主要的戶外工作，似乎是伐木和割草。

這個理想化的拘泥制度的一瞥，是很令人感覺興趣的，因為後來這些遺跡都湮沒無聞了。維持這種制度的重心，似乎是祇靠校長的個人人格，自從他年老疾終以後，在一九八一年與一九八三年的酷寒的冬天裏，這種古樸的大學，似乎已人跡不到，自趨零落了。

哥倫比亞與芝加哥兩大學，便與哈佛處在絕端相反的地位。這兒新的特溫得 (De Windt) 學派思想的影響極為明顯。杜威 (Dewey)、魯濱孫 (Robinson)、白爾恩司 (Harry Elmer Barnes)、福司迪克 (Raymond Fosdick)、培爾德 (Beard) 夫婦及其同人的種種傳統學說，生命都還存續着。雖然紐約城因為牠的不鞏固的無人居住的摩天樓被人認為危險，而裹足不前，

但在哈得孫河 (Hudson River) 間仍然有相當的商業與工廠。那架大鐵橋尙堪供運貨的馬車和驢車行駛，使南北的交通不絕，使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商業的重心。這裏和芝加哥的工業工人與大學教職員是有密切的關係與接觸的，他們是同在努力去做他們所稱爲『復興的大問題』的工作。

照尼古生的紀載說：『他們不肯承認文明是崩潰了的。這處論及胡佛的失敗，其語調和華盛頓一樣。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有這樣地自信力的人們，相信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有辦法的。在英國便絕未曾見過有這樣的事情了。有一天夜裏忽然地震，且聞崩頹的聲音，聽說有一大排的房子叫做『無線電城』(Radio City) 的倒塌了。第二天曉色朦朧的時候，我走出來看。見一羣人圍在那裏守着煙塵蔽天的一角，靜聽着接連崩墮的聲音。他們有沒覺着頹喪呢？一點都不！又清除得多一點了。』站近我旁邊的一個人這樣地說：『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把這些東西清除了的。』

尼古生很詳細地列舉哥倫比亞與芝加哥兩大學的課程。他對於科學試驗室與實驗工作的重要很表示訝異。『我覺得幾乎回復到一九三〇年參觀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的化學試驗

室一樣，』他說。但使他更加驚訝的，便是社會工作的進步。『他們培植出一班不是訟師性質的律師人才，』他這樣地寫：『我以為他們這裏新立的法律是此處最有趣的一件事情了。這些法律，在我父親的時代一定不把牠當做法律的。牠是社會的物理學與病理學以及由此演繹出來的社會治療方法。這裏有些人，即如哈密爾敦 (Hooper Hamilton) 與林凱 (Kin Kay)，他們是談自由教育的。他們絕對不相信吾人在英國所談的人類到了末日的事情。』

這便是他的主要觀察點。但是，最可注意的是縮減基本英語以便實用的工作亦已開始。在二十一世紀初期，西班牙語和英語已經駸駸乎成了交換的方言。法文卻一落千丈，希臘文與拉丁文，就當時的完全沈默的狀態看來，是已經完全廢棄了。

我們的游客由芝加哥乘飛機去狄爾朋 (Dearborn) 的福特飛機場 (Ford Aerodrome)，看見舊工廠的頹址，與重建的新屋，而且在那裏的技術學校逗遛幾天，並參觀尙未完全的美國博物院。他很奇異地看見沿機場的週圍有許多方里的耕地，知道福特所主張的把工作時期分爲農業生產，與機械工作的觀念，仍然是有效而在施行。在底特律 (Detroit) 有聯合的紡織及靴鞋工

廠。那裏在一年之中尙可出產幾千輛的汽車與幾百駕的飛機！那裏還有一個範圍雖小，而設備完全的無線電臺。

那位總理說：「我們一向總是彼此很和睦的。我們並不去管人家的事，人家也不來管我們的事。我們把所遺留下來的營業負擔起來，在加拿大與墨西哥方面也是如此。現在沒有人把國界來麻煩我們，我們自己也不自尋煩惱。當營業最蕭條的時候，我們便安心地耕種土地與做實驗。」

福特的「和平之船」已經在歷史上作了一個轉換的關鍵，久已湮沒不聞，照這個游客的記載中所指的總理似乎是福特的兒子愛狄素 (Edsel)，來繼續他那思想簡單的先人的志向的。那個地方可以保守着來繼續工作，並不是誇大之詞。照尼古生所見，這裏比較其他各地的混亂，大有分別，每樣事情都是很秩序化的。愛迪生 (Edison)的工廠自福特重加修理之後，仍然不失舊觀，在博物院中陳設着的，有第一次做的照相機和電話，以及最初期試驗的汽車與飛機。

他禁不住說道：「這是新近的事情，在我們的一生以及在我們先人的時代，我們已經看見這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文明的開始，勝利與牠的崩潰。我們已經看見過整個機器大批出產的歷史



了。」

「一點都不是，」那位總理說：「那冊歷史還沒有開始哩。」

繼着便是很長的談話，那游客都把牠作問答式紀錄了下來。讀史者所感覺興趣的，便是我們可以找到證據，知道整個世界方在分崩離析，災饉頻仍，農村破產的時代，而機器運輸的制度仍然能够自己發展。我們可以把狄爾朋的總理的談話與柯白所遇見的歐洲飛機師的談話兩相參考。都是感覺舊制度已經死亡了的。

「所有國王的事情以及國會的事情都消滅淨盡了，」那總理說：「銀行的事情更已衰落到不堪問了。」

「將來的是甚麼？」游客問道。

「是這個，」那位總理說，他把手遙指着高飛天空，深隱雲際的飛機。